译者的话

波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事件是战后波兰发生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一。它使执政十四年的哥穆尔卡不得不离开政治舞台，它对此后的波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十二月转折》这本书，对于了解波兰十二月事件的过程、性质和根源，对于深入探讨这次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拉科夫斯基，长期以来担任波兰《政治》周刊主编，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一九八一年二月出任波兰政府副总理。他在《十二月转折》这本书中，引用了许多内部材料，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一九七一年八中全会关于十二月事件的评价和结论，以及与会者的不同的观点。同时，他还概括地阐述了一九五六年波兹南事件，简要地对比了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先后四位第一书记的生平。这本书的材料还是比较丰富的。

一九八〇年夏，波兰再次爆发政治经济危机，盖莱克被解除职务。这次危机持续时间之长，动荡规模之大，对波兰国内和国际生活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十二月事件。但这次危机同十二月事件有着不能割断的联系，因此《十二月转折》这本书，对于深

入了解和研究波兰当前所经历的危机，也提供了一些可资比较的观点和材料。

在一九七〇年和一九八〇年两次危机之间，波兰还发生过一九七六年六月事件。许多波兰学者认为，六月事件是一九八〇年危机的先兆。这里特摘译《政治》周刊编辑杜尔斯基撰写的《一九七六年的拉多姆》（《政治》周刊，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并供研究波兰问题的同志们参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北京

序　　言

波兰沿海地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发生的悲惨的流血事件震撼了波兰人民。它使波兰人民始则陷入绝望的境地，继而产生一种渺茫的希望。整个社会期待着新当选的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及其同志，期待着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能够宣布和贯彻执行一种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会再丧失共同语言的政策，渴望着有一种把沿海悲剧引以为戒的政策。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十二月事件刚过几年，当局的专横又开始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制造新的紧张。

这本书是一九七八年年中开始动手写作的，年底前即已完成。对于出版问题，当时是不敢想象的。促使我写作的原因有三：第一是我本人参与了摆脱危机的进程；作为政论家和编辑工作者，我积极地参与创造一种气氛，创造一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十二月事件后的纲领和对盖莱克本人的信任气氛。第二是一种日益深化的意识，我意识到十二月事件后的领导班子正在随着悲剧事件的时光流逝而力图忘却悲剧事件本身。更有甚者，还力图在实践中一笔勾销八中全会的一切决定，例如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决定，关于建立领导方法的保障制度的决定等等。我从近处观察了这一过程。对这种有害于人民，有害于党的倾向，要进行有效

的抵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走的方向错了"——当局最高层中同我交谈过的许多人，虽然不止一次地听到了这种警告，但他们只把它当作苍蝇的嗡嗡叫声而已。第三是看到了上述情况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把导致十二月悲剧的原因公诸于世，是我在道义上的义务。

这本书包括的时间是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到一九七一年二月七日，也就是从波兰人民共和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条约签订的日子到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结束的日子，这是短暂的然而充满着重大事件的时期。这本书用将近一半的篇幅介绍八中全会的过程，绝非偶然。因为全会的参加者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人民波兰的历史上第二次发生了当局和工人阶级的冲突，并流淌了鲜血？全会的进程忠实地反映了全会参加者当时的思想状况，并增加了我们对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在十二月事件后对十二月事件的态度的了解。

我知道，一旦决定发表这部作品，我就踏步在薄薄的冰层上，因为我写的题材不仅是现代的，而且是悲剧的，在人民的意识中又是活生生的。沿海悲剧十周年时，我发表了这部作品的一个片断（即《悲剧的一周》那一章的节缩）就是一个印证。我收到了许多信件，其中不乏批评之辞。一些来信人以为，全书都将涉及悲剧一周的过程，写这类信件的人往往是沿海各城市街头事件的参加者，他们的经历确实值得记载，但不属于本书的范围。另外一些人试图修改我提到的某些事实，可是遗憾的是，他们提出的事实往往是根据想象或道听途说的消息。而想象不能成为当代历史记事人的知识的源泉，它最多也只能是多少有些价值的一种启示。

一位读者向我提出了断然的要求：或者全部是真相，或者什

么也不是。这是一种不严肃的要求。首先，什么是真相？是提出这种要求的人的知识和想象，以及他对正式的消息来源的不信任？其次，如果接受这种要求，那就等于放弃了对现代的研究。因为每一个研究最新历史的作者只能接触到一定数量的消息来源和事实。

还有一些读者，不相信我在上述片断中提到的在十二月的一周中牺牲的人数。他们认为牺牲的人数更多。他们有怀疑，但是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他们只是听说牺牲的人数比正式公报中提到的要多。因为用不着掩饰什么，我决意把三联市和什切青报纸公布的牺牲者名单附于书后*，同时吁请本书的读者把能够修正那些为某些人所怀疑的正式材料的可靠消息邮寄给我。可以想象，我一旦得到这类消息，我一定同他们一道修改本书提到的数目字。

几位寄信人在谈到十二月事件十周年和报上就格但斯克纪念碑揭幕发表的文章时，还提到了另一方——即治安力量和波兰军队方面所遭到的牺牲。他们指出了因遵照命令而置身于街垒另一侧的人们在道义上发生的冲突。后备役上校翁索夫斯基硕士，当时曾任边防军旅长，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声音是十分重要的。翁索夫斯基上校在题为《一九七〇年格但斯克事件中战士的悲剧》一信中写道：

> “……我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悲惨事件的参与者（不仅仅是消极的观察员），我在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有必要谈一谈这些问题，特别在当前‘革新’时期，人们不止一次地询问这些事。因此，不仅要谈谈原因、过程，而且要谈谈那些起过或大或小积极作用（假如在这场民族悲剧中还可以讲积极

* 本书后原附有牺牲者名单，共四十四人，现删去。——译者注

作用的话）的人们。但是，我认为，要谈就必须有一个条件，即真相必须完整，任何细节也不必隐讳。这并不是要‘揭破已愈合了的伤口’，而是要把真相交给社会，交给往往只了解被歪曲了的事实的社会。

现在我想以战士——‘治安力量’的代表的观点，从战士的经历这个角度，来看看悲剧事件的整个问题。我认为，迄今为止的一切思索，都是以‘我们工人’的立场为出发点的。但我想从‘另一方面’，从治安机关方面来看看问题。我认为除了一些思索之外，任何一个人迄今也未具体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在谈论沿海地区十二月悲剧事件时，我认为也应该谈谈波兰人民军和边防军战士、值勤民警和公安部队所经历的悲剧。他们之中也有人牺牲。在事件过程中，当开枪的命令下达的时候，以及在事件过后，当社会上的全部怨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的时候，特别是集中在格但斯克和格丹尼亚卫戍区战士和军官身上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场悲剧。当各种人物在火车上或商店里带着挑衅的口吻议论着不光彩的绰号，什么刽子手啊，杀人犯啊，当军官们不得不把这类脏言秽语装进耳朵里的时候，任何人也没有写过和谈过民警、公安部队战士和军官的自我感觉，以及他们的情绪和怅惘。

值得强调一下，在此期间干部在教育战士的工作中遇到了困难，要解释历次冲突的原因，这是更为困难的事，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正式的评价，即使有了，也不彻底，而战士是在每天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来思考悲剧的一切时刻和事件的。这种情况也包括干部家属和文职人员。

这个时期军队同社会的联系遭到严重的削弱。这种联系本来是很密切的，是通过战士向社会的献礼活动和战士为社

会进行的劳动建立起来的。在悲剧事件之后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重建军队的威信，才能密切军队同社会的联系。在悲剧事件时期，我那个旅有一位战士，他保护港口设施，忠于职守。而他的亲兄弟、格丹尼亚《巴黎公社》造船厂的工人却悲惨地牺牲在'上班途中'。此时此刻这位战士在想什么呢？在经历着怎样一种生活呢？同他的家庭很难谈得拢，为了缩小，哪怕是部分地缩小他们的家庭悲剧，不得不立即让他复员……。

今天，过了十年之后，戴着著名的天蓝色贝蕾帽的战士加入了《死难者纪念碑》落成典礼的仪仗队行列，这时他们肯定会想到十年前经历过苦难日子的自己的前辈，而那些业已退役的前辈在电视机前观看这场仪式时，也一定会象每一个有思想的波兰人一样陷入沉思。

同许许多多军官一样，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我曾经思考过，今天我仍然在思考，可能思考得更深一些，更广一些。这次事件对整个民族，对许多家庭是一场悲剧，对'另一方'——也就是对军队和治安力量也同样是一场悲剧，当时他们执行了建立在对事件错误判断基础上的命令，被迫使用了武力，动用了武器。"

在结尾时这位上校指出，"作为悲剧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我写了这几点看法，我希望自己能为阐明当时沿海地区异常复杂的形势作出一点点贡献。"毫无疑问，当时的形势是极其复杂的，历史学家将会对其各个方面进行周密的分析。

我已经讲过，这本书是在一九七八年写的。现在决定出版，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在最近几个月波兰出现的新的政治形势使书中提到的某些问题得到了阐明和评述，我该怎么办呢？我

决定予以增补。

最后，十分明显的是，在这类著作中我不可能绕开那些在中央和沿海地区决策中心活动的人物。无疑，他们中的每个人对当时自己的活动，是各有评价的。这不一定同我的评价相一致。我根据我所接触的文件和自己的知识，提出了自己的评价，不怀有任何因政治上的狂热、喜爱和厌恶而产生的其他目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于华沙

目　录

第 一 章

十二月危机

“事情很明显，不能只在提价和提价方法所造成的痛苦中探讨十二月危机的根源。危机是多年来滋长起来的，并具有更深刻的原因。”

——爱德华·盖莱克
（一九七一年二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的讲话）



暴风雨之前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中午十二时，座落在"克拉科夫郊区"大街的部长会议大厦的圆柱大厅内，准时地开始了一次重要的令人难于忘怀的仪式——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的签字仪式。在条约上签字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方面是联邦总理勃兰特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谢尔，波兰方面是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和外交部长英德里霍夫斯基。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工作的声音沙沙作响。在当天向波兰，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千百万电视观众播放的电视新闻中，在翌日出版的欧美报纸第一版的新闻报道中，都重复着一个场面——一张巨大的桌子，勃兰特和西伦凯维兹坐在那里签署条约，后边站着一大群参加仪式的人。他们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团员和一些波兰人。条约的主要设计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站在这群人的中央，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几位领导成员、波兰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和两名波兰记者——奥斯曼契克和本书作者围绕在他的身边。

这一天，哥穆尔卡情绪高涨。他知道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将作为揭开波兰人和德国人相互关系新篇章的日子而载入欧洲史册。这是持续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临时状态宣告结束的日子。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坚决否认波兰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的最终性质，在欧洲，它是不同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形成的波兰地理版图的唯一的一个国家。这种不承认欧洲现实的政策，怂恿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的修改边界主义和复仇主义势力的活动，抵制了在欧洲结束“冷战”时代，并使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难于开始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在这些年代里，波兰坚决地摈弃了由某些西德政治家倡议的一切不彻底的解决方案，揭穿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届政府企图在奥得—尼斯河边界问题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立场中制造裂痕的每一次尝试。

为了在承认欧洲政治地理变化的文件上签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理、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莅临华沙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欧洲政治地理的变化，是法西斯第三帝国失败的结果。波兰人在奥得—尼斯河边界问题上的坚定不移的态度得到了报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得不适应现实，承认了波兰的要求。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团员的陪同下，在成群的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的簇拥下，勃兰特于当天上午向犹太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我同汉堡《星》周刊的主编南宁一道，目睹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突然间联邦总理出人意料地跪在纪念碑前。我就在碑前集聚的人群中，谁也不曾想到他会成为这一在道义上难于描绘的事件的见证人。在此后的一些岁月，我曾多次碰到过关于这次著名的“跪拜”的问题：在走向纪念碑时，联邦总理是作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姿态，还是作出了一个自发的反应呢？我始终答称，不能说这是什么深思熟虑的姿态。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勃兰特有相当的了解。

当天晚上，勃兰特在维拉诺夫宫举行宴会。在宴会上波兰客

人喜形于色。很少出席正式宴会、更很少面带笑容的哥穆尔卡在这天晚上也满面春风。这是他的伟大节日。从波兰获得西部和北部地区之日起，他一贯追求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一向不愿会见记者，特别不愿会见西方记者，这天晚上却同记者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记者们在报道中说，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哥穆尔卡。

在参加宴会的波兰人，特别是外国人当中，能有几人想象得到，再过一周的时间会在人民波兰的历史上出现新的悲惨的戏剧性的一章，三十年以来第二次发生工人流血事件，而这一次是在格但斯克、格丹尼亚和什切青。可以肯定，谁也没有预见到那些在宴会上温文尔雅喜形于色的主要英雄人物再过两周将会离开政治舞台，并被公认为是导致民族悲剧的罪人。

勃兰特在波兰的访问，恰恰是在制定提高食品价格草案的工作已经结束的时候。实施新价格的日子已经确定，即十二月十三日，圣诞节的前十天！选定这样的时间，本身就表明了对社会心理学基本原则的轻视。参加宴会的许多波兰人都知道提价的时间，他们曾因此而心情不安了吗？很难作出明确的回答。但出席宴会的赫林凯维奇部长的情绪却是悲观的，他认为这次提价“不会轻轻松松地就过去了”。但我不认为他已经预见到一周后即将在波兰沿海地区发生的事件。我也没有预见到，虽然……。几年以后，马乌楚任斯基回忆起当天夜里我们俩人在设在欧洲旅馆的新闻中心的交谈。维拉诺夫宫的宴会一结束，我为一天的经历所激动，决定再找同事们谈一谈。在酒吧间我遇到了马乌楚任斯基，他正在品尝威士忌。我受到赫林凯维奇谈话的影响，情绪有些低沉。马乌楚任斯基立即有所觉察，并询问因由。我对他说，再过一周我们将丧失一切。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经常研讨十二月事

件，当时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见解，说哥穆尔卡意识到提价不得人心，因为任何社会也不会兴高采烈地欢迎物价上涨，但是，他认为整个行动可以毫无痛楚地过去，因为这是在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订条约几天之后，也就是在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日子里实施的。虽然这是许多假想中的一个假想，但当时人们反复地重复它。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外交政策中获得了最伟大的成就，这也不能改善社会上不良的自我感觉，如果产生不良感觉的原因是日常的生活条件——同生产力水平类似的其他国家相比，极其困难而又极其贫困的生活条件。

在六十年代，生活水平的提高过于缓慢，几乎不为人们所感知，波兰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一年比一年加剧。很大一部分劳动者，例如轻工业部门的工人，不开私人门诊的医生，教员，国家机关的小职员，他们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线上。他们工资本已微薄，又多年无所增加。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宣传工具几乎每天都在向社会灌输说，波兰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正在不断地改善。甚至向社会进行这样的说教，你们不好好工作；你们给予国家的少，向国家伸手要的多；你们的生活超过了可能。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印象，追求应有的生活水平是坏事，有了小汽车是奢侈。《政治》周刊的政论家一九七〇年底提出了生产廉价小汽车的经济和社会的目的性问题，结果被公开指责为散布“消费情绪”。有人警告编辑们，不要无批判地宣扬西方杂志推崇的时装，而文件指示说，应广泛宣传目前正在销售的服装。

六十年代中期，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造价低廉的住房建设。这是一些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如浴室、厕所等）就交付使用的住房。这种厨房没有窗子的住房遍地开花，尽管大家都知道许多家庭的家庭生活是集中在厨房的，特别是工人家庭更是如此。只

有西里西亚地区没考虑中央设计院的指示，继续建造了厨房有窗子的住房。

对于千百万波兰人来说，六十年代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一年比一年难于理解和缺少吸引力，赞成这一政策原则的人也日渐减少。社会上滋长了一种看法，即国家在原地踏步走，国家领导人似乎建议大家在今天和明天实行某种清贫的社会主义。前途不是大有希望和令人鼓舞的，特别是对千百万年青的波兰人更是如此。对于年青的波兰人来说，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已经不再是回忆对比的出发点了。可是那些领导人，他们在斥责“消费倾向”的同时，却一再引用他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经验，不愿意或不能够“跳出这个圈圈”。在许多公开讲话中，他们求援于两次大战之间波兰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状态，他们引用的事例是真实的，但这并不能唤起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想象力。许多人认为，领导人如此热心地大谈特谈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主要是企图依此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他们没有能力解决由于整个战后时期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

首先是哥穆尔卡，他规定了六十年代的波兰模式和波兰人生活追求可允许的界限。哥穆尔卡是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的活动家和政治家，将来会有人就他的生平和活动给他写传记的。根据他的指示和公开发表的主张，确定了党内教育工作和群众性宣传工具的工作方针。可以想象，他也不止一次地意识到有一种力量在逼近，这种力量将不赞成人们所说的清贫的社会主义。一九六八年十月，他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华沙市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党内有了新的年青的一代，他们不了解丑恶的过去，他们受的教育不同，思想方法也和过去的不一样。新的一代，从本质上讲同任何一代一样，它追求生活的改善，渴望获得某种新的东西。这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否则根本就没有进步。在这些恰如其分的讲话之后，令人遗憾的是，他紧接着又讲了那一套不考虑波兰年轻人的雄心壮志的话。

全国人民心情焦急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形势，而且还有政治形势。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三月事件是一个意外。这主要是因为多年以来任何人也不曾公开谈论在党的主要活动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分歧和相互对立的流派。可是，实际情况突然表明，这确实是存在的。禁止在人民舞台上演出《先人祭》激起了知识分子特别是华沙知识分子的愤怒。对大学生的人身袭击和政治攻击使人感到困惑和惊愕。疯狂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也不能不打上许多的问号。这一时期，在知识分子中流行一种普遍的看法，即领导人失去了对国内政局的控制，同时也提不出明确的主张。

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那里形势的发展也影响了六十年代的波兰人，使他们的自我感觉进一步恶化。一九六八年夏天，八月份，形势发展到了顶峰，华沙条约国家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后，人民心情焦急还有一个不能说不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波兰人看他们周围各国发展得很快，而且较顺利地克服了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于避免的困难。

在这种经济和社会情况下，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人民论坛报》公布了部长会议头一天通过的关于一系列商品改变零售价格的决议。决议指出，价格的变动“是多方面的，包括了比较广泛的市场商品”。四十种产品的零售价格平均降价从百分之八点六（香皂）到百分之四十点五不等（丝涤纶长袜）。降价的产品包括：电视机、收音机、家用电冰箱、洗衣机、缝纫机、录音机、涤纶混纺布匹、人造丝、药品、弹力连袜衬裤、电灯泡、自

行车灯泡、手电灯泡、颜料和油漆、某些玻璃器皿、某些造纸工业品、火柴、某些食品罐头、油毛毡……

四十五种商品提高了零售价格，提价幅度从百分之三点六（纱布绷带）到百分之九十二点一（人造咖啡）不等。肉和肉制品平均提价百分之十七点六，小麦面粉和稞麦面粉提价百分之十六点六，牛奶制品提价百分之三点八，鱼及鱼肉制品平均提价百分之十一点七，果酱等提价百分之三十六点二，甜点心提价百分之十二点四，麦糁提价百分之二十三，大麦米提价百分之三十一，通心粉提价百分之十五点三。在建筑材料中，陶瓷砖提价百分之三十六点六，陶瓷瓦提价百分之十七点八，花瓷砖提价百分之十九点九，木材平均提价百分之二十点一。硬煤提价百分之十，焦炭提价百分之二十，褐煤提价百分之十四。提价的商品还有亚麻布、丝绸、某些种类的毛料、棉织长袜、衬衣、睡衣、皮鞋、白铁和生铁器皿及冶金产品、自行车、摩托自行车、WSK牌摩托车、某些体育用品、纸张、木质家具、尼维牌牙膏和儿童爽身粉。

《人民论坛报》在题为《提价之后》的评论中说，部长会议的决定“对于波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政府作出这项决定的出发点是，既要使食品需求（主要是肉类食品需求）同市场供应的现实可能性相适应，又要使整个零售价格体制，也就是消费结构同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

对农食品提价的动机作了如下的说明：

“迄今为止，大多数食品价格与生产成本不符，甚至有的低于农产品的收购费用。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由国家的预算予以补偿。除了肉类食品外，基本食品价格多年未变。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粮食、牛奶、生猪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从而使国家对农食品的补贴也增加了。”

评论的作者说，一九七〇年国家对农产品补贴的情况是，粮食加工品——五十二亿八千五百万兹罗提，奶制品——七亿二千七百万兹罗提，水果加工制品——三亿五千四百万兹罗提，鱼及鱼类制品——六亿兹罗提，混合精饲料——六十五亿兹罗提。评论员补充说，国家补贴的资金来源，有些是从某些工业品的销售积累中获得的。这些工业品的价格同生产成本比较是过于昂贵了。必须降低这些工业品的价格。因为过高的积累也限制了这些工业品的销售和有碍其生产的增长。

评论还说，保持低于生产成本的农食品的零售价格，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消极的后果。这不仅造成了国家预算负担中补贴的增长，而且破坏了市场的平衡，“这种情况十分尖锐地表现为肉及肉食品的供应不足。由于居民的现金收入不断增长，人口在增多，按当前价格计算的肉和动物油脂的需求，比我国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增加得更快。按人均计算，肉和动物油脂的消费，一九六〇年为五十公斤，一九六九年为六十一公斤。在此期间，我国人口十年内增加了三百万人，即增加百分之十，而肉和动物油脂消费的增长则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二。最近两年的欠收又造成畜牧业生产的下降，也限制了肉类市场进一步增加供应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五年肉类和动物油脂的人均消费之所以还能增加五公斤，这是以大大限制肉类出口为代价的。………为了进一步发展畜牧业生产，我们不得不经常进口大量的粮食和饲料，平均每年进口近二百万吨，而在年景不好的时候还要进口更多一些。限制肉类的出口，其后果是肉类出口的收入已不能抵消购买粮食和饲料的支出。因此，不能允许再进一步限制肉食品的出口了”。

提高了的农食品的新价格还不能消除许多农食品的匮缺现象。国家预算仍然要对牛奶、面粉、鱼等进行补贴。在面包价格

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对烤面包用的面粉的补贴一九七一年将为四十二亿多兹罗提。

显然，广大的消费者最关心价格的变化。部长会议认为，提价所获得的金额“只略高于降价所减少的金额”。

向社会提出了如下的一笔账：在保持目前购买结构的情况下，一年中居民因零售价格提高而增加的支出将为一百五十七亿兹罗提。与此同时，居民因零售价格降低而减少的支出为一百零九亿兹罗提，两者的差额为四十八亿兹罗提。这个差额，将由于对收入最低的家庭进行家庭补贴（约九亿二千万兹罗提），由于降低电视收费（由四十兹罗提减为三十兹罗提，将少收五亿多兹罗提），由于分期付款商品削价而减少每月的付款额（八亿兹罗提）和提高生猪和牛奶的收购价格（十五亿兹罗提）而大为减少。一般说来，这种计算得失的方法不为消费者所称道。靠自己双手劳动谋生的人，是根据自己家庭条件和收支情况来比较价格的涨落的，而不是根据整个社会或社会中哪一部分人的生活条件来比较价格的涨落的。对于许许多多的波兰家庭来说，十二月十三日的价格变动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都认为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实。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批准了部长会议关于改变零售价格的决议，并就此事写信给党的各级组织。

十二月十二日，在华沙举行了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和执委会联席会议，也讨论了价格变动问题。副总理雅罗谢维奇和国家价格委员会主席卡尔比尤克向会议介绍了部长会议的决议及其出发点。波通社记者对政府代表的讲话归纳如下：

“这个决定是在市场出现供应困难，特别是出现肉类及其加

工品和其他食品供应困难的情况下作出的，是以完全负责的精神作出的。农业中出现的连续两年的不利的条件以及外贸中出现的不甚轻松的局势造成了这些困难”。

主席团和执委会在了解了政府决议的动机和听取了补充说明之后确认，政府的决议是必要的。

十二月十二日，在拉多姆举行了《铸造工人节》中央庆祝会。《人民论坛报》于十三日报道了庆祝会情况。庆祝会参加者写信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向他表示衷心的敬意，信中说：“书记同志，我们向您作出保证，久经考验的铸造工人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并将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提出的纲领”。

悲剧的一周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在部长会议办公楼大厅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大概没有料到，在这一天波兰进入了悲剧的和惨痛的一周。大厅里的人们望着组成会议主席团的政治局委员们，恐怕谁也没想到哥穆尔卡是最后一次坐在主席台上，没想到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很快就要发生重大的变化。

会议包括两项日程。正如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二的《人民论坛报》所报道的那样，第一项，讨论了国家的经济形势和一九七一年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第二项，哥穆尔卡向中央委员会介绍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订的条约。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什楚克作了引导讨论的讲话。他是党的领导班子中主管经济事务的。

全会正常进行着。雅什楚克讲话后开始讨论，有十四人发言。讨论结束时哥穆尔卡讲了话，他承认，六中全会结束了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期，并开始了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的实质是把粗放的经济管理形式和方法转变为集约的形式和方法。哥穆尔卡解释说：“我希望大家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因为这并不是截然隔断或者深刻改变我国经济迄今的发展道路。急剧的转

变可能发生在政治领域，即使在这一领域，也需要某些因素的长期积累，而这些因素的总和就导致了某一政治方针的改变。”这可真是至理名言！

正是这种急剧的转变已经开始了。当时是否是一种政治的本能使他预告了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后果呢？有可能。哥穆尔卡对两天前决定实行的价格变动谈了很多。他说：“如果说在社会上降价是令人满意的，那么涨价则是不受欢迎的，而且总是受到批评，不管这种批评有没有道理。”

下午七时左右中央全会结束了。

此后三天，报纸刊登了全会的文件。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四，《人民论坛报》还刊载了政治局的报告，题为《国家的经济形势——一九七一年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占了报纸的四个版面。

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在离开会议厅时还根本不知道格但斯克发生了什么事。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部长会议关于价格变动的决议宣布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格但斯克造船厂发动机车间的一群工人，上午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聚集在造船厂经理办公楼前。罢工者公开表示对涨价不满。其他车间的许多工人也加入了聚会，其中一部分人形成了一支游行队伍，有数百人之多，他们开始向市区，向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大楼方向挺进。就这样，罢工越出了造船厂的大门，变成了街头示威。当然，这种街头示威受其自身规律所支配，游行的人群唱起国际歌和波兰国歌。

有关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华沙。下午一点左右，六中全会主席团的成员们得知这个消息。政治局委员、不久前曾任格但斯克省委第一书记的科乔韦克主动前往格但斯克。格但斯克省委第一书记卡尔科什卡也同时回去了。哥穆尔卡在全会

上对讨论进行总结时已经知道在波兰沿海出了什么事，可是中央委员们却一无所知。

傍晚，两位政治局委员，即中央书记克利什科和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洛加一索文斯基，以及科尔钦斯基上将奔赴格但斯克。克利什科留在沿海地区近一周，由于他在政治局的地位，实际上是他在领导格但斯克党组织和治安力量——民警和波军部队。

关于悲剧的一周的经过情况舆论界实际上是在近两个月之后才知道的，即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六日至七日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发了题为《十二月事件的评价及其结论》的文件后才知道的。《新路》的特刊登载了这次全会的纲领性讲话，讨论中的发言及上述文件。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三，报纸没有登载任何有关沿海地区事件的消息。而《人民论坛报》却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工资、价格、购买力》的长篇文章。文章中列举了许多数字，企图使公众舆论相信，价格的变动不会恶化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尽管文中只字未提沿海地区工人的抗议，但毫无疑问，它是在间接地反驳那些认为食品涨价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的人们。这种论战以后还继续了几天。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四，《人民论坛报》在第一版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居民收入的组成——明年的预测》。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人民论坛报》就食品消费结构问题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是党的领导授意写成的，显然，党的领导认为，借助报纸的宣传将能阻止迅速发展起来的深刻的政治危机。这当然是天大的幻想。

公众舆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发生的事情上。国内的政治紧张、焦急和不安，以及对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恐惧都在

增加。尽管群众性宣传工具半周以来只字不报沿海地区的骚动，人们已知道那里的情况不妙。这些消息是铁路员工，警察及那几天正好在沿海地区的人们从格但斯克和其他港口城市传出来的，最后外国电台也广播了。正如在这种形势下常有的情况那样，消息被歪曲了，谣言到处传播。

当局的威信，也就是党和政府领导的威信每时每刻都在下降。到星期四为止，没有一个领导人认为应该和有必要向社会讲讲对沿海地区发生的事情的评价。星期四早晨沉默被打破了。这一天《人民论坛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波通社关于格但斯克骚乱的公报。内容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在格但斯克发生了严重的街头骚乱。那些与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冒险分子和流氓分子利用在格但斯克造船厂职工中出现的局势，破坏和焚烧几座公共建筑物，并抢劫了几十个商店。面对治安人员的干预，发生了枪杀人的事，还有许多重伤者目前住在医院。由于流氓挑起的冲突，有六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在这种情况下，当局采取必要的坚决步骤，击溃了冒险分子，恢复了市内秩序。

与此同时，当局警告，它将坚决打击一切破坏公共秩序和反对国家的行动。”

从公报下边刊登的编辑部评论中公众舆论了解到，动用了军队，格但斯克实行了宵禁。评论把冒险分子和教唆分子与工人阶级明显分开。报纸写道“为了从格但斯克发生的事情中得出结论，应当回答一个问题，这些骚乱是怎样发生的，首先，造船厂的部分职工是否真有理由丢下工作走上街头？”回答是很明确的。《人民论坛报》认为，没有真正的理由。作为论据，该报还

引用了造船厂工人平均工资的数字。评论的作者指出，它们比公营工业的平均工资高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当然，造船厂也有与改进劳动组织，实现企业现代化等有关的困难问题，它可能引起人们的气愤，但这些问题应当在平心静气的，实事求是的气氛中研究解决。可惜的是，“部分职工屈从于不负责任的呼吁，丢下工作走上街头。……其实，所有那些与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以及与某一具体企业形势有关的问题完全可以在党、工会和社会组织的会议上平心静气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讨论、解释和解决。船厂职工具有利用这些可能性的一切条件。格但斯克事件证明，那些不负责任的行动只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悲惨的后果。”然而问题在于，沿海地区的工人阶级的结论是，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报纸呼吁为责任感的胜利，为关心共同利益的胜利，为停止一切无政府主义行为的胜利而斗争，并指出，“一定要严惩杀人放火和抢劫的肇事者”。《人民论坛报》的读者从评论中获悉，格但斯克的大多数工厂星期三均正常工作。这是一条不真实的消息。

呼吁停止闹事和谴责过火行动是对的。任何一个哪怕有一点点责任感的政权也不会容忍这几天在沿海几个城市中出现的局面。不幸的是当时政府对于承认工人抗议的正当原因没有准备。从上述评论中可看出，工人受到了指责，说他们不应该罢工，也不应上街！有了这样的评价，就没法提问，为什么工人没有利用评论中所列举的党、工会和社会组织？既然《人民论坛报》说这些工人比其他人生活得更好些，那末为什么他们还要听从那些“利用几天前改变零售价格这一事实而进行煽风点火的人”呢？

由此可见，在悲剧的一周过去一半以后，党和政府的领导公

开表态了，但他们对事件的评价是错误的，充满了问号的。当时他们不理解，反对提价的抗议是有正当理由的，这个抗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群众对当局执行的政策已经失去了信任。

同一期《人民论坛报》还在头版发表了十二月十六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什切青省委领导会见工厂代表的消息。这不是偶然的。什切青的政治形势也很紧张，尽管报纸对此只字未提。

假如公众舆论真的对《人民论坛报》和其他报纸关于格但斯克骚乱的解释信以为真，那末它后来一定会陷入巨大的惊奇之中，因为就在那天晚上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西伦凯维兹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呼吁人们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和理智。总理讲话的声调十分激动。这篇讲话值得注意，因为它忠实地表达了处在悲剧中心的国家政治领导人中这部分人的当时的情绪。不言而喻，总理的讲话是经过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批准的。

总理的呼吁一开头就说：人民政权和国家的代表“不管有什么悲痛”，都必须从国家的范畴考虑问题，都必须以整个国家和整个人民的利益为行动的指南。在国家的最高利益中包括每一个波兰家庭的最根本的利益，那些在今天“感情用事”的人迟早也会相信这个道理。那些人往往一方面被无政府主义分子、流氓分子和犯罪分子所利用，另一方面被社会主义的敌人、波兰的敌人所利用。生活再一次证明，即使街头示威的组织者没有不良的、冒险的愿望，但总会有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和犯罪分子卷入游行队伍，并趁机进行抢劫、放火和盲目的破坏。

在指出抢劫、破坏和焚烧建筑物的表现时，总理说：“结果发生了不幸的冲突，治安力量被迫使用武力。出现了人员伤亡——警察和市民死十几人，伤几百人。”尽管总理把事件局限在格但斯克，但在他的讲话中有一句话暗示听众，事态正在扩大。他

说："敌对势力企图建立新的无政府主义策源地…。"星期四在格丹尼亚和什切青发生了不幸事件。实际上这一天在整个沿海地区的总罢工正在风起云涌。

谁应当对发生的事情负责呢？从总理的讲话看，工人们应对此负责。总理在提到人员伤亡后所作的结论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这就是那些缺乏理智和责任感的人们所造成的令人痛心的后果，他们丢下工作，走上街头，给那些社会败类、冒险分子和敌人以破坏、抢劫和杀人的机会。"工人们不应这样做，因为"存在着一切条件，可以在平静的气氛中，在自己的工厂里，在社会组织、工会组织和党组织的会议上分析和讨论工人阶级关心的许多问题。不能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和作出必要的解释的事情是没有的。"

这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人民论坛报》第一篇评论中的论点。同样，总理使用的关于改变零售价格的论点也是如此。他说："我想指出国家从价格变动中一点好处也得不到，也不会以此增加国家的收入。"总理保证："我们将继续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要在安定和正常生活的气氛中进行。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国家、人民生活和每个公民的根本问题已经摆在日程之上。波兰在世界上的地位，它对迅速发展的科技革命的赶超，它的经济潜力的扩展，都取决于为了达到全民族的和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奋斗的一切力量的团结。社会纪律和人民在道义和政治上的一致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无政府主义势力和敌对势力企图破坏这种一致和纪律，破坏这种共同的努力，而那些不自觉地或在苦恼中响应他们号召的人，则起了助桀为虐的作用。"

总理号召大家要慎重和明智，要有责任感，要捍卫艰苦创造的共同财富。他以热诚的呼吁结束了自己的讲话："我向工人阶

级，向共同战斗和劳动的同志们，向全体劳动人民发出公民的呼吁：抛弃那些挑衅者，不要听信那些冒险分子的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坚守自己的岗位，怀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反对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表现，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和纪律。愿你们意识到这一时刻的严重性。”

在总理的讲话中包括了很多正确的提法和评价。譬如谁能对下述说法的正确性提出异议呢："建造家园困难，需要劳动和努力；焚毁和破坏家园容易。”但是总理所提出的政治路线在后半周已经不为社会上绝大部分人所接受，人们已经意识到，波兰的政治危机一天天在加深。这条路线首先就不能说服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他们经历了悲惨的时刻，看到自己的同志们倒了下去。他们期望听到的是别的话，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所讲的这一些。他们期望政府作出真诚的自我批评。

同一天，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四，由于近几天在格但斯克和沿海地区经常发生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事，部长会议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二条第七款通过了“关于确保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决议。决议的第二点指出：“指令民警、治安以及与他们合作的其他机关采取法律上所允许的一切强制手段，包括使用武器在内，来反对那些严重危害公民生命和健康、抢劫和破坏财产以及公共设施的人。”

看来，应从心理和政治范畴去寻找作出这种决议的理由。在通过决议之前早已动用了武器，而关于在什么形势下治安机关可以使用武器，这在所有治安部队的章程中都早有明文规定。作这种决议，目的在于教育，是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是要阻止人们继续搞激烈行动。

同一天，政治领导还研究了在沿海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建

议。匆匆忙忙起草了一篇文章，用以论证这种决策。在文章的第一段中作者说，沿海地区的事件帮助了波恩修改边界主义者。但到了晚上他们放弃了实行紧急状态的想法。

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人民论坛报》公布了总理的讲话，公布了部长会议的决议，发表了一篇重复总理论据的该报评论，还发表了关于格但斯克整顿工作进程的消息。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的《人民论坛报》第一版刊登了一则消息，题为《三联市的形势——在港口、造船厂和工厂里工作正常。商店里节日前的采购》，而关于什切青事件则只字未提。次日，星期日的《人民论坛报》又登了一则消息，标题是《沿海地区的形势》，其中写道，那里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从这则消息中公众舆论第一次知道什切青也出事了。消息异常简短，“可是，本月十七日事件之后，在什切青虽然没有发生任何动乱，但紧张状态仍在持续。”就是说形势还没有安定下来。

在上面提及的星期六的《人民论坛报》上登了波兰报刊的第一篇写沿海地区事件的署名文章。它的作者是著名政论家马乌楚任斯基。在题为《当前的重要性——波兰的国家利益》的文章中，政论家指出了事件在国际上的牵连，他认为，只有安全恢复平衡、安定和秩序以及消除敌对的冒险的和不负责任的言论之后，才能“有条件就我国在一九七一年，在今后五年，以及在七十年代的问题进行公开的诚恳的公民般的讨论。这个十年有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这个十年的首要任务，是要保障欧洲有持久的安全体系，保障波兰有全面的发展和进步。”

生活恢复正常了！读了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报纸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报纸预示着回到正常情况，但这是错觉。即便是思想完全平静下来了，可是沿海地区发生的事件已使国内出现了新的

政治形势。劳动人民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和政府领导的深刻的信任危机是这种形势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所有的领导成员都理解这个重要的政治事实。他们的结论是，既然星期五和星期六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这就意味着局势得到控制，已经可以根据总理指出的和群众性宣传工具一再重复的方案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现在让我们概括地对波兰港口发生的事件的过程作一个接近真实的描述吧。我写"接近真实"是因为最诚实的报道也不可能在出事前后抓住所有的细节和微妙的差别（请看序言）。十二月十四日格但斯克造船厂的部分工人走上街头，来到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大楼前面。一位省委书记试图劝说示威者离去。这个呼吁没得到预期的效果。示威者控制了一部"邮电"广播车，从车里广播呼吁书，数以千计的人群在城市街道上进行了几小时的示威游行。人们甚至试图争取"列宁"造船厂和修船厂的工人们，建议他们进行占领性罢工。接着人群来到了工业大学门前，想拉学生们参加游行，遭到学生的拒绝。随后示威群众来到广播大楼。八名工人进入广播大楼，他们要求广播公报。由于技术原故未能得逞。这时游行的人群已接近一万人，他们再次来到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大楼前面，并在沿途推开了民警的警戒线。

两次试图烧毁省委大楼和《海岸之声报》编辑部，阻塞城市交通和运输，向公共建筑物和商店投掷石头，用装有汽油的瓶子武装自己，这一切促使警察当局使用武力来恢复公共秩序。警察的行动一直持续到深夜。内务军部队进驻省委大楼。

十二月十五日，《海岸之声报》发表了题为《动荡不安和需要慎重》的评论。报纸在谈到星期一事件时指出，想同聚集的群众进行谈话的一切试图都没成功。文章写道："昨天的事件和政

府关于改变价格这个困难的、明摆着不受欢迎的、然而又是必要的决定显然有着联系。难于接受这个决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它使社会物质状况暂时恶化——从这点讲，人们的感觉和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地区与华沙不同，在沿海地区明确指出了价格变动将使社会的物质状况暂时恶化！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一早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和许多其他工厂开始进行占领性罢工，有组织的一群群工人走上街头。和往常一样，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流氓和犯罪分子也参加进去了，他们使游行具有极大的挑衅性。还有一些人喜欢搞耸人听闻的事。他们开始烧汽车，冲击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大楼和民警局大楼，当民警部队击退冲击的人群后，将近二万人集中在邻近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大楼和中央车站附近。他们用石块和汽油瓶袭击省委大楼，很快这座楼就着火了。他们还焚烧十几辆警车，消防车和邮车，焚烧中央车站等几座建筑物，最高技术组织的办公楼被完全烧毁。他们捣毁并抢劫了十几家商店。为了维护秩序，增派了民警和地方驻军部队，这些地方部队动用了坦克和装甲运输车。治安力量使用了武器，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死的人中也有工人，这当然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同群众搏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晚上政治局委员科乔韦克在地方节目中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许多工厂停了工，并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了各种提案。“我想坦率地讲：正象不能撤回已作出的决定一样，大多数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科乔韦克批评了罢工：“请允许我坦率地说：那些中断工作的人客观上给街头闹事创造了条件。”当然，客观地讲，科乔韦克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说服工人，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抢劫，我们的确走上了街头，不过这是你们逼我们这样做的！同一天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

团下令实行宵禁，禁止集会。星期二夜间又向三联市增派了部队。用武力使格但斯克街上的局势得到了控制，那些利用工人游行的分子被镇住了，他们出于盲目的破坏欲，掠夺和捣毁国家财富。这天夜间召开了省委执委会议，当时在沿海地区的政治局委员也参加了。考虑到十二月十六日发生街头示威的可能性及其一切后果，克利什科命令封锁"列宁"造船厂。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三，在格但斯克和格丹尼亚的造船厂等许多工厂爆发了占领性罢工，其他工厂则举行了短时间的声援罢工。在罢工的工厂里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性质的要求。早晨八时左右，造船厂罢工工人和在厂工人中涌现出一伙用铁棍木棒武装起来的人，他们试图通过二号门到城里去，结果遇上了封锁造船厂的部队，死了两个人。

这一天在整个沿海地区其他城市的工厂和全国许多地方紧张形势也在发展。傍晚在斯乌普斯克和埃尔布隆格也发生了街头骚乱。在斯乌普斯克有几百人，主要是学校青年，试图挑起骚乱。他们袭击波兰统一工人党市委大楼，并企图烧毁市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大楼。示威者被警察以及党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驱散。在埃尔布隆格袭击了警察的广播车，并捣毁了几十家商店。同样，这里的示威者也被警察驱散了。在这两个城市，军队都没有动用武器。

星期三傍晚科乔韦克又一次在格但斯克电视台发表讲话。他再次批驳关于提高工资的要求。

在谈到自己星期二的讲话时（其中也包括呼吁人们回去工作），科乔韦克说："昨天对你们讲话时我就强调过，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正常的工作进程。我要指出，绝大多数工厂的工人听从并理解了这个呼吁。同时我深感遗憾的指出，有一些工厂的工

人没有听从我的呼吁。其中有格但斯克造船厂，格丹尼亚“巴黎公社”造船厂。这两个厂的第一班没工作。在这种形势下，造船工业领导决定，停止第二班的工作。”在讲话结束时科乔韦克向造船工人号召说：“造船工人们，我再次向你们发出呼吁——快开始正常的工作吧！”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四，一周中最危急和最悲惨的一天来到了。这一天在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工厂工人的罢工和街头闹事，在格但斯克和格丹尼亚开始了总罢工，接着，总罢工波及到什切青和埃尔布隆格。在什切青和格丹尼亚的街上发生了流血事件。

格丹尼亚一些工厂的职工罢工始于十二月十五日。当天上午“巴黎公社”造船厂的数百名造船工人向市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办公楼进发。示威者在同市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马利安斯基的谈话中要求他承认罢工委员会。马利安斯基表示同意，这样一来，罢工委员会的存在就成为合法的了。十二月十六日“巴黎公社”造船厂继续罢工，其他工厂如远洋捕鱼公司和港务局也在继续罢工。这是声援格但斯克造船工人的罢工。应当指出，这两天在格丹尼亚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或抢劫之类的事，那里秩序井然。十二月十六日深夜逮捕了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当局继续实行对抗的方针。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克利什科就“巴黎公社”造船厂问题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开除造船厂全体工人，并对职工进行甄别；第二，封锁通向造船厂的一切路口。这个决定得到贯彻。根据《海岸之声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报道，第一个决定于晚八时由造船工业联合公司经理部门用电话通知了所有造船厂。科乔韦克当天晚上通过电视呼吁造船工人回厂工作时，他不知道在此之前已作出了封锁造船厂的决定。于是只好深夜派人到工人旅馆甚至私人住宅去撤销科乔韦克的呼吁。很可能不是所

有的人都得到了通知，也不知道有多少职工对此置若罔闻。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四，早晨五点五十分在工人旅馆门前（那里住的人已得知停工的消息）有一些人朝造船厂方向走去。在格丹尼亚造船厂车站，火车开始从格但斯克和维伊海罗夫两个方向开来。车上乘坐着上早班的工人。扩音器里不断呼吁他们回家去。没有奏效。出现了巨大的混乱。船厂的入口处由部队封锁着。人群朝那里拥去。要他们停止前进的呼吁无效，于是枪声响了。首先是警告性的，朝空中开枪，后来……有人被打死，有人受伤。一小时后，在格丹尼亚客运车站，军队和示威者发生了新的冲突。九点，在格丹尼亚造船厂车站附近五千左右的人群向警察和军队进行冲击。格丹尼亚街头骚乱一直持续到下午。它的结果是可怕的——十八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

同一天什切青成了流血冲突的舞台。在“瓦尔斯基”造船厂的船体车间一清早就举行了有一千五百余人参加的集会。约有一

---

* 在十二月事件十周年前夕，格但斯克《时代》周报（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七日）发表了同波兰统一工人党现任华沙市委第一书记科乔韦克的谈话。记者玛热娜·沃伊尼亚克和塔德乌什·沃伊尼亚克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作为一个没有被恢复名誉的人回到政治活动中的。在人们的感觉中你对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事件的悲惨进程是负有责任的。”科乔韦克回答说，“我始终把自己对十二月悲剧应负的共同责任放在政治和道义的范围内来对待，从未把它放在治安部队和军队的行动范围内来对待……”看来，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能拒绝这个观点。科乔韦克对格丹尼亚事件的责任问题尚无定论。首先，当时在沿海地区出现的局势是由于在此之前中央要以武力镇压罢工和示威的方针造成的结果；第二，在当时笼罩三联市的气氛中许多人情绪激动，感情超过了理智，在对造船厂实行封锁的情况下，即使没有那个呼吁，谁也不能肯定就不会发生这场悲剧。

千人离开了造船厂拥向市区。与此同时在“格雷芬”修船厂也举行了集会。这个厂也约有七百人走向市区。街上的人，主要是青年人也加入了工人的游行队伍。近两千人聚集在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大楼前。警察部队驱散了游行队伍。不久之后，被驱散的人群又在市中心集结了近一万人。烧毁了两辆警车。两小时后，估计有一万五千人聚集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大楼前。大楼由军队保护着。人们开始从窗口往里扔汽油瓶。大楼着火了。一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运兵车也被烧毁。在省委大楼前，民警部队和军队没动武器。

从各方面的描述看，在什切青示威者的咄咄逼人的活动异常猛烈地增加。他们袭击值勤的民警和士兵，烧毁汽车，砸抢几十家商店。他们放火烧了报纸编辑部和省工会大楼。他们袭击省民警局大楼。他们曾两次试图占领监狱，监狱的卫兵开了枪。街头冲突持续到深夜，死十几人，伤几百人。实行了宵禁。《什切青之声报》十二月十八日的评论称：“什切青昨天发生的事件是一个最清楚不过的例子，它说明那些丢下造船厂内工作走上街头的一伙人对自己的不慎重的行动的后果想得多么少，因为他们给了社会败类、教唆犯和敌人以放火抢劫和暴力行动的机会。”＊

任何报纸都没有刊登当时“瓦尔斯基”造船厂和修船厂罢工委员会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有：“那个从来没有捍卫劳动群众

＊ 在什切青事件十周年时，什切青省“团结”工会的新闻周刊《统计》（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发表了《给扬卡的信》，这是示威参加者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写的报道。作者是造船厂的工人，他以激昂的心情详细描写了袭击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大楼和省民警局大楼以及如何收集汽油和瓶子等的情景。

的工会中央理事会下台，……隶属于工人阶级的独立工会，……释放在事件中被拘留的工人，不在法律和工作上给他们任何处分，……惩办那些屠杀工人（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工人）的罪人，绝对禁止枪杀手无寸铁的劳动群众，……惩办那些对导致国家目前的经济危机负有责任的人，不管他们在党和政府里担任什么职务，……停止在报纸、电视和广播中把工人称作流氓，并惩办那些称工人为流氓的人。劳动人民是被追去显示自己的生存权利的”。在二十一条要求中有几条属经济性质的要求。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五，由于总罢工，什切青的生活处于瘫痪状态。

在埃尔布隆格，木材厂的近三百名工人走上街头，开始了星期四的街头骚乱。人群用石块袭击并试图放火烧毁县法院大楼、百货商店及其他一些建筑物。傍晚市区街道恢复了平静。星期四有一些青年还试图袭击斯乌普斯克和瓦乌布日赫两处的党委大楼。

我们要提醒一下，在这一天《人民论坛报》发表了有关最近几年人民收入情况的文章。在全国，尖锐的政治危机在发展，在沿海城市的街道上，有人在流血牺牲，而在华沙，在政权的中心，却仍然以为这场深刻的民族悲剧可以用公布消费和工资的统计表来控制住！再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可悲的宣传活动更能说明领导机构完全脱离群众的情形了。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五，在什切青和埃尔布隆格还在发生治安部队同人群的激烈冲突。这一天参加街头闹事的人数不多，最多只有几百人，其中多数是青年人。例如，一些目击者认为，在什切青，示威的人群中就没有工人。他们袭击执勤民警，多次试图放火焚烧波兰统一工人党埃尔布隆格市委大楼和地区诊疗所及电话

局。他们在什切青和埃尔布隆格砸抢了几十家商店。治安部队开了枪。许多人受伤，部分人伤势很重，结果两人死亡。这是悲惨事件的最后一批牺牲者。

沿海事件的结果是极其可怕的。根据官方的公报，死四十五人*，伤一千一百六十五人。烧毁、全部或部分地破坏十九座公共建筑物，其中有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省委大楼。在格但斯克地区由于破坏造成的损失达一亿零五百万兹罗提，而在什切青近三亿兹罗提。毁坏或损坏民用汽车四十七辆、警察和军队车辆装备几十辆。焚烧和毁坏二百二十家商店。

从十二月十四日到二十日，治安机关在沿海地区共拘留二千九百八十九人。其中二千八百四十三人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八日以前释放。那些被怀疑有抢劫、主动攻击、纵火行为和非法拥有武器的人被逮捕。在被拘留的人中有一千九百九十名是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

在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悠久历史中，因经济、政治和种族原因而暴发的冲突以及其他以流血而告终的冲突是屡见不鲜的。实际上直到今天它们仍是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两次大战期间的波兰，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于争取面包、争取劳动权和土地的斗争中。在一九二六年五月政变中死了二百八十四名士兵和一百一十六名平民。然而这些事实并不能为沿海地区发生的事情进行辩解。具有悲惨后果的十二月的一周并不是什么不可驾驭的命运和规律作用的后果，而是政治性的失误、虚假的评价和错误的决定造成的。这里也反映了当时对国家政策负有责任的人在个性上的弱点。

---

* 检察机关公报的数字是四十四人。

在人民波兰的历史中这已经是第二次非常深刻的政治危机，它造成了人员的伤亡，使人民和领导之间出现了鸿沟，把世界的注意力引向波兰，并使波兰的朋友们感到悲伤。第一次危机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在波兹南。* 在波兹南，示威者与治安力量（民警部队和前往支援的波兰人民军部队）之间也进行了较量，并有伤亡。四个月后，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中央全会上，党的领导班子发生了变化。哥穆尔卡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在八中全会上发表纲领性的演说，在《波兹南的教训》这一部分中他指出："解决累积成堆的困难的

---

* 根据波通社的公报："本月二十八日在波兹南市区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一段时间以来，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和地下反动力量企图利用波兹南某些工厂的经济困难和缺点，挑起反对人民政权的活动。敌人选中正在举行国际博览会的波兹南作为挑衅地点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是给人民波兰好的名声上抹黑，为我们发展国际的和平合作制造困难。本月二十八日这天，敌特挑起了街头骚乱。有人袭击了一些公共建筑物，造成人员死亡。在有觉悟的那部分工人的支持下，当局控制了局势，恢复了市区的平静。以西伦凯维兹总理为首的政府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莅临出事地点。这次动乱是一次广泛的、精心准备的挑衅和颠覆行动，它的肇事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

在波兹南的街头骚乱中被打死或受伤后死亡的共四十八人，近三百人受伤。被打死的人中有波兰人民军的战士和公安人员。九月中旬，检察院把五十四人的案件交给法院，这批人的罪行是野蛮袭击公安人员日·伊兹德布斯基下士，袭击农学院军训班、监狱、民警分局和省公安局，以及抢劫商店和住宅。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波兹南报》发表公报说："根据总检察院关于重新审理与波兹南事件有关案件的指示，波兹南省检察院在分析研究起诉书和正在侦讯的案件之后，决定将其结束。"

钥匙掌握在工人阶级自己手中。一切都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态度，今天和未来的前途都取决于它。而工人阶级的态度则取决于党的政策——由领导运筹的政策，取决于政府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治理国家的本领。

最近工人阶级狠狠地教训了党的领导和政府。波兹南的工人们拿起罢工的武器，在六月的黑色的星期四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们快从错误的路上回头吧！

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轻率地把罢工当作争取自身权利的武器。尤其是现在，在以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人民波兰，工人阶级不会轻率地跨出这一步。很明显是事情过了头，在任何时候事情一过头就不能不受到惩罚。

当波兹南工人走上街头的时候，他们不是反对人民波兰，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反对的是那些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广泛滋生并深深触痛了他们的邪恶，他们反对的是对他们的思想——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

把波兹南的痛苦的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挑衅分子干的事，这种拙劣的尝试是政治上的极大的幼稚。

时时处处都可能有代理人和挑衅者的存在和进行活动。但是他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也不能决定工人阶级的态度。假如代理人和挑衅者能够鼓动工人阶级去行动的话，那么人民波兰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的任务就太轻松了，他们的目的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了。问题在于，事实并非如此。”

现代编年史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沿海地区事件正在发展的时候，哥穆尔卡曾否看过一眼他自己过去的多么聪明的演说。

沿海地区事件发生在波兹南事件以后的十四年。一般都把它们归作一类。虽然它们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点，诸如经济动机，走上街头，人员伤亡等，但这些事件发生时的许多情况又使得它们成为彼此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波兹南工人走上街头是在人民波兰的第十一年。一九四五年建立的社会制度仍处在自己的开始阶段，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还很不稳定。这不仅因为社会的大部分是由两次大战期间的一代人组成的，同时还因为从一九四九年起波兰进入了迅速发展的工业化阶段，它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破坏了许多世纪以来存在的秩序。工业化耗资巨大，影响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个时期社会上大多数人感情上还与两次大战期间的年代相联系，或者还接受住在西欧的波兰资产阶级残余分子的影响。同时这也是一个建立新的，人民知识分子队伍的时期。胜利了的阶级正在学习管理国家。

在国际关系中"冷战"笼罩着一切，其特点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紧张状态，相互之间极大的猜疑和不信任，处处都觉得有敌人存在。

波兹南事件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四个月发生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后果进行了批评。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尽管很不大胆，但却在发展中。在波兰，这种清算实际上从一九五四年年中就开始了。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前就出现了一些文章，不同程度地公开对斯大林主义在实践中的道德价值提出了异议，并指出它不适用于波兰。因此，这种批评不仅具有意识形态的一面，而且具有民族的一面。事情很明显，它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情绪。

波兹南事件的发起者是"采盖尔斯基"工厂的职工，他们的工人传统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后半叶，他们代表着古典的波兰无

产阶级。走上街头的直接起因是主管部门就工资政策问题作出的官僚主义的决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工人们对六年计划期间的物质条件以及对斯大林主义时期采用的管理方法的不满。

虽然波兹南的工人阶级对经济状况完全有理由感到不满，可是应该提醒一下，有些部门的工人阶级生活的物质条件尽管差得多，但他们并没有以这样剧烈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要求。让我们以建设诺瓦胡塔钢厂的工人为例。如果比较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条件要比"采盖尔斯基"厂工人的条件更差。即便工资水平相似，他们的居住条件、福利和文化设施等条件也差得多。然而在诺瓦胡塔的街上没有出现抗议。可是一年以后诺瓦胡塔的工人却为修建教堂的事举行过罢工。有一种论点认为，既然格但斯克造船工人比其他部门工人挣的钱多，他们就不应该罢工，这种论点是很站不住脚的。就象"采盖尔斯基"工厂的同事们一样，他们以罢工来表达他们对物质条件的不满，但这只是原因之一。不满的主要根源是他们深信党的领导正在执行的政策不能保证不断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在有几十年历史的或技术水平高的那部分工人阶级中，这种信念一般说来更为强烈。建设诺瓦胡塔的工人则完全属另一种类型。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久前还在波兰山区或在人口密集的凯尔采农村经营贫瘠的小块土地。对他们来说，从过去的生活条件过渡到参加诺瓦胡塔的建设工作是一次从贫穷和绝望的王国到舒适而有远大前途的王国的飞跃。

沿海地区的工人是在与一九五六年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走上街头的。到一九七〇年人民波兰已经存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工业化的急风暴雨时期已属于过去。一九四五年后在波兰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巩固，出现了由人民波

兰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一代波兰人。那些在五十年代还认为波兰的革命变革剥夺了他们晋升机会的人们对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回忆已经淡薄。此外，苏共二十大已过去十四年，共产党内进行的非常困难、复杂和富有戏剧性的非斯大林化过程，以及由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引起的震动也已经属于过去。

所有这些变化了的情况都说明十二月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这次危机比一九五六年的要严重得多。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五，在沿海城市的街道上响过了最后的枪声，街头游行和闹事已告结束，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政治形势几乎每一小时都在恶化。星期六，七个省的近一百家工厂举行了罢工。在全国各地，散发批评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呼吁组织集会游行的传单、口号和标语的活动越来越多。下一周的局势将会失去控制，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混乱和大规模流血的威胁笼罩着波兰。迅速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当时存在的政治危机要求采取政治的而不是镇压的行动。

星期六下午召开了那一周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哥穆尔卡没有参加。他病了。医生通知政治局委员们说，他的患者必须住院治疗。*

政治局讨论了国内的政治局势以及由于第一书记生病在党内出现的形势，决定在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召开中央全会，决定由

---

* 关于哥穆尔卡同志健康状况的公报由理·果谢夫斯基博士和伊·科斯采夫斯基教授博士签署，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论坛报》上。该公报提到："几周来患者的循环系统出现紊乱，造成一时性的视力损害……。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早晨，上述症状再次加重，由兹·阿斯卡纳斯教授博士、阿·契日克副教授和斯·沃奥达尔赤克博士进行会诊，他们建议住院治疗，患者表示同意。经诊断，患者血压升高，循环紊乱造成了一时性失明和疲劳过度……。将需要较长时间的治疗。"

盖莱克担任中央第一书记。讨论持续了七小时。对此，西伦凯维兹在八中全会时解释说："假如就立即召开全会的意见是一致的话，也就没有必要讨论那么长的时间。这个一致首先在于对事件的评价、在于对当时形势的评价，如果不是其他原因的话……"

至少在中央全会召开前两天，中央委员们（当然不是全体）就开始热烈地议论必须更换中央第一书记的问题了。星期六上午政治局委员泰赫马去见哥穆尔卡，在谈话中他对哥穆尔卡说，他认为哥穆尔卡应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哥穆尔卡冷静地接受了泰赫马的意见。在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上，中央委员、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什拉赫齐茨起了积极的作用，他极力推荐盖莱克为候选人并把盖莱克调到华沙。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天，下午四点举行七中全会。政治局委员科乔韦克就沿海地区事件的经过作了报告。他说，国内动乱持续不断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党对事态的发展失去控制。如果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国家将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更换党的领导问题已被提上日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开摆脱危机的道路……。

中央第一书记的更动已成为必要的，因为过去的一周证明哥穆尔卡对事态的发展已失去了控制，他不能、也不想理解事件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在这不幸的一周中，他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向波兰人灌输了一些消息，说什么他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好，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满意……。哥穆尔卡周围的人一致认为，在这不幸的一周的后半周，党的领袖越来越悲观失望，他指责工人阶级的行动会葬送波兰。这位地地道道的工人领袖失去了同自己阶级的共同语言。这是个可悲的事实，但却是真的。

科乔韦克发言后，全会接受了哥穆尔卡"因病重"而辞去

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请求，并推选盖莱克接替这一职务。同时，全会撤销了雅什楚克、克利什科和斯柴莱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了马·斯彼哈尔斯基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新选进政治局的有：巴比乌赫、雅罗谢维奇、莫查尔、奥尔绍夫斯基和希德拉克，新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有：雅鲁泽尔斯基、雅布翁斯基和肯帕。当选中央书记的有：巴比乌赫、巴尔齐科夫斯基和科乔韦克。• 全会向哥穆尔卡表示了最良好的祝愿，祝他尽快恢复健康。

当天晚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新任第一书记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全国人民非常注意地收听了这个讲话。盖莱克说，最近一周发生的事件深深地震撼了整个社会，这次事件使祖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件？它是怎样形成的？"党和政府领导的义务，是就这些问题向党和人民作出完满的回答。这个回答将是困难的和自我批评的，但，是明确的和真实的。从根本上说我国目前形势的原因，是真正的困难所造成的。我们有权指望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理解这些困难。但也有一些原因，它们是由于经济改革中的未经深思熟虑的主张所造成的。这些原因我们将予以排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新领导认为："保证安定，保证正常的劳动和生活"，

• 七中全会后的政治局由下列人员组成：巴比乌赫、西伦凯维兹、盖莱克、雅罗谢维奇、英德里霍夫斯基、科乔韦克、克鲁契克、洛加一索文斯基、莫查尔、奥尔绍夫斯基、希德拉克及泰赫马，政治局候补委员有：雅布翁斯基、雅盖尔斯基、雅鲁泽尔斯基和肯帕。中央书记处的组成：盖莱克（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巴比乌赫、巴尔齐科夫斯基、科乔韦克、莫查尔、奥尔绍夫斯基、斯塔莱维奇、希德拉克和泰赫马。

这是最紧迫的任务。他强调指出，在全国必须有治安、秩序、劳动和安定以及互相谅解和信任。

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呼吁。尽管全国人民以紧张的心情听了讲话并真心希望恢复正常，但不能排除还有一些人准备继续进行激烈的活动。

盖莱克还谈了党和社会的关系。他说："最近的事件沉痛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即党必须始终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不能失掉同劳动人民的共同语言。"他还谈了为保持这种联系而应执行的政策的梗概。在谈到必须重新仔细研究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整个新的五年计划时，盖莱克指出变动和改革将保证国家迅速而和谐的发展，党将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进行磋商。他说："我们号召工人，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和各界人士共同来解决这些重要问题。我们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为这种共同行动创造条件，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遵守社会主义民主的准则。"他接着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一般政策的铁的规律是，必须始终面对现实，同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进行广泛磋商，在党的生活和领导机关的活动中尊重集体领导和民主的原则。"

他还提到政治局打算研究，如何改善最低收入和多子女家庭的物质条件的可能性。这些家庭由于价格变动遭到了最大的损失。因此在许多会议上都提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在谈到许多使劳动人民痛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列举了三个最迫切的问题：劳动妇女的处境，住房问题和青年问题。

悲剧的十二月的一周就这样结束了。在街头示威的压力下，在工人和治安人员以及波兰人民军战士和军官流了血的时刻，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进行了变动，这在人民波兰的历史上已经是

第二次了。*

危险的政治危机被制止了，然而留下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新的第一书记不能指望今后会有一种轻松的无冲突的生活。

---

* 在十二月事件十周年时，《自由战士报》（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记忆和教训》，文中写道："当事件发展到混乱和涣散现象加深的阶段时，治安力量得到了加强，接着军队也参与了。这个事实本身就极富有戏剧性。但，在社会遭到威胁的情况下，它制止了那些孕育着事态进一步灾难性发展的破坏活动。在当时动乱的漩涡中，最令人痛心的要算是那些由于悲剧性的误解和对抗而发生的流血和牺牲事件………

派特遣部队的战士去协助治安力量，这个任务使他们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因为再没有比动用社会主义军队的士兵去对付社会内部冲突更为复杂的事情了。我们的军队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以这样一种信念教育出来的：为人民服务和为祖国工作是军队的最高职责，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诚联系是军队的力量的源泉。战士们当时所处的形势同这种信念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他们的行动具有深刻的内在的悲剧性质。

根据'保险'的机制和限制，军队在使用武器和武力时表现出相当的镇静和分寸。指挥员和全体战士甚至在强大的压力和对方主动进攻的形势下（其中包括破坏和捣毁设备，烧毁坦克、运输车及其他军用车辆）仍然是克制的。不难想象，假如是积极地使用了武器，其后果将会如何……。军队的行动是纪律严明，十分谨慎，他们极力不做那些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更为悲惨的后果的事情。"

中央委员会的几任第一书记

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〇年，波兰工人党和后来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职务有过四次变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是解放了的波兰的第一任书记。还在被占领时期，他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开始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解放后，在合法的条件下，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波兰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一九四八年在波兰工人党八——九月中央全会上他被指控为“右倾民族主义”而被撤去总书记职务。经全会选举由波莱斯瓦夫·贝鲁特继任总书记的职务。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统一大会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贝鲁特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三月）设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贝鲁特从这时开始到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为止一直担任第一书记。贝鲁特是在莫斯科逝世的。当时他率领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他没能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同返华沙，因为他患了重感冒和肺炎。

下一任第一书记是爱德华·奥哈布。他是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召开的六中全会上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在波兹南事件四个月后，一九五六年十月召开了八中全会。在八中全会上奥哈布

辞去了第一书记职务。第一书记自愿辞职这还是第一次。此后，哥穆尔卡再次担任第一书记。

哥穆尔卡，贝鲁特，奥哈布和盖莱克四个人都是在或多或少富于戏剧性的情况下担任第一书记的，这一事实是对波兰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有趣的注释。哥穆尔卡是在他的前任帕·芬戴尔被捕后接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波兹南事件后，在波兰开始出现尖锐的政治危机的条件下他又重新当权。贝鲁特是在哥穆尔卡和他的政治朋友被指控为右倾民族主义，波兰工人党发生深刻危机的时刻担任总书记的。奥哈布是由于贝鲁特突然逝世而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盖莱克则是在人民波兰历史上出现最深刻的政治危机的时候担任了党内的最高职务。

每一任党的领导人在谈论自己的时候都可以说，他当领导的那段时期具有独特的、不可能重复的性质。哥穆尔卡任书记的前几年正是消除战争带来的可怕后果的年代，也是新政权同其阶级敌人和政治敌人进行尖锐的政治斗争的年代。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八年，这一斗争不止一次地具有极端的形式。在人民波兰的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同历史学家所说的“内战因素”进行周旋。

贝鲁特是六年计划年代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六年计划为工业化的波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真正的革命事件。它不仅改变了国家的经济面貌，而且震撼了多少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体系。这是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年代，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社会地位提高的年代。在此期间，革命的浪漫主义取得了胜利，但同时也出现了个人迷信时期典型的、十分消极的现象。在这些年代里，许多波兰人，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国家军或参加流亡政府影响下的其他组织的波兰人，准确无误地意识到他们受到的对待是不公正的。过分的警惕，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多

疑，堵塞了这些波兰人职业上晋升或学业上深造的道路。镇压政策（尽管不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厉害）不仅涉及到前国家军成员，而且涉及到左派阵营里的一大批人。一九五一年哥穆尔卡被关进监狱。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格热戈什·科尔琴斯基及其他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在那段期间，为了同“右倾民族主义”的残余作斗争，为了争取“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有时还损害了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损害了几个世纪以来构成波兰人民族性格的文化遗产。贝鲁特生前最后一年已经赶上了“解冻”时期，某些共产党和工人党正在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摆脱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奥哈布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时间很短，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就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果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讨论。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不稳，迅速增长起来的政治危机更因波兹南事件而进一步加深。

当哥穆尔卡第二次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时，他从前任那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个摊子。他面临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安定民心并实行一种符合波兰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的政策。在哥穆尔卡领导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六十年代实现的经济和社会任务，其条件与五十年代截然不同。大搞突击和高喊革命口号的年代，战后的贫困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波兰已经拥有可观的工业基础和工农出身的新的人民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雄心也与往昔不同了。

当盖莱克在十二月的一个夜晚呼吁波兰人给予支持时，他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不同于五十年代的波兰。当时他提出的七十年代治理波兰的设想还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

在谈到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的特点时，不

能不提到他们的生平。他们都是年纪很轻就参加了革命活动。除了这一共同的特点外，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令人深思的差异。哥穆尔卡出生在克罗斯诺一个工人家庭。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克罗斯诺是加里西亚地区的一个又穷又脏的小城镇。而且不仅是克罗斯诺，波兰的这一部分就是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的地区。哥穆尔卡十四岁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在钳工作坊参加劳动，十七岁获得钳工证书。显然，他十分了解加里西亚的贫困，他在自己的一生中肯定从未摆脱过当时积累的经验。一九二六年他因五一节游行散发左派印刷品而第一次被捕。入狱不久，在工人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毕苏茨基五月政变后爆发总罢工时在工人群众大会上组成的）的要求下获得释放。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他已经成为杰出的工会活动家。工会工作是他所从事的党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他加入波兰共产党。一九三二年他组织罗兹纺织工人罢工，在一次左翼工会秘密会议上被警察打成重伤，被逮捕并判处四年徒刑。后因健康状况恶化，获准出狱治病。党派他前往苏联，就学于莫斯科列宁国际学院。约两年后，他于一九三六年回国，并作为波兰共产党区委书记继续在西里西亚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再次被捕，并被卡托维兹省法院判处七年徒刑。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谢拉兹监狱服刑。逃离监狱后他到了华沙，参加了华沙保卫战。首都投降后，他象许多左翼活动家一样，转移到比亚威斯托克，尔后又从那里前往利沃夫。直到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他在一家造纸厂当车间主任。一九四二年他同国内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参与组织了下喀尔巴阡地区党的第一批支部和反对占领者的第一批战斗小组。一九四二年九月他当选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波兰工人党在敌占期间的基本文件，即工人党纲领性宣言《我们为什么而

斗争》是由他最后定稿并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发表的。波兰领土一经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出来，哥穆尔卡就担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并积极地参预组织国家机关的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他成为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第一副总理。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他同时兼任收复地区部部长。他是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两党合并的倡议者和热情的支持者。一九五一年被捕，一九五四年底获释。他作为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只在一九六〇年去过西方一次，那是同一些国家的总统和总理一道参加联合国大会，在西方总共逗留了三个星期。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下一任领导人贝鲁特，出生在离卢布林不远的卢雷·耶苏茨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但是他们家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卢布林人。他父亲曾是塔尔诺布热格附近的农民，是加里西亚人。

一八九九年贝鲁特七岁时开始上学。当然这是俄国学校。同整个俄国占领区一样，学校里对波兰人实行奴化教育。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时候，该校的学生们决定不再用俄语回答老师的问话。贝鲁特受四、五年级同学的委托向老师声明说，学校里的学生是波兰人，不希望用俄语进行教学。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们开始罢课。罢课结束后，包括年轻的贝鲁特在内的罢课领导人被学校开除了。当时贝鲁特非常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印刷工人，他在一家印刷日报——《卢布林土地》的印刷厂里无报酬地工作了几个月。一九一〇年，扬·海姆帕尔来到卢布林，他负责编辑进步的《波兰信使》报，在他的帮助下，贝鲁特进入费尔泰雷夜校上学并学完商业课程。海姆帕尔对贝鲁特的智力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九一二年他们俩人参加了波兰社会党——左派。一九一四年，当贝鲁特到了华沙并开始当排字工人时，他很快就去听卢德维

克·克日维茨基和宰格蒙特·赫林格讲授的课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发表自己关于社会问题的第一批文章。战争爆发后，他返回卢布林，并在合作社组织里进行活动。

一九二三年，遵照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贝鲁特前往西里西亚煤矿区，担任索斯诺维茨消费者工人协会理事。一九二三年十月他第一次被捕，获释后继续在合作社组织内活动。一九二五年，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他到莫斯科参加为期九个月的党训班。回国后他负责领导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央技术部(出版部)。一九二七年一月，他在华沙再次被捕，押解至本金县入狱。可见，每一个未来的领导人都有过一段在西里西亚的经历。经保释出狱后，贝鲁特成为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临时书记处成员，负责组织—技术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派往莫斯科列宁国际学院学习。一九三〇年十月结业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组织指导员。两年后回国，担任波兰共产党罗兹区委书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再次被捕，一九三五年在华沙受审，因“从事非法的共产主义活动”被判处七年徒刑。由于一九三五年大赦，他在狱服刑的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获得自由。

战争爆发时贝鲁特正在华沙。九月四日他离开首都前往卢布林，从那里又到了科瓦尔。一九四一年春迁居比亚威斯托克。希特勒进攻苏联后，他随同后撤的苏军一起到了明斯克。一九四三年春返回华沙，担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中央机关报《自由论坛》报编辑。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首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法令，改“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总统”。当时实行的一九二一年

三月宪法规定，总统必须由无党派人士担任，因此贝鲁特在就职总统时表示："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或政治集团。我认为，我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参加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一切集团和党派的力量团结起来，巩固正在复兴的波兰国家的团结一致，增强其力量和威力，并发扬民主精神，民主精神是我们自由独立的波兰祖国的伟大和力量的基础，自由独立的波兰祖国是属于我们大家的。"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立法议会选举后，贝鲁特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当选为波兰总统。在一九四八年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八——九月全会上，贝鲁特出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当时他五十六岁。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波兰人民共和国议会通过新宪法，取消总统制，代之以国务委员会制。由亚历山大·萨瓦茨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贝鲁特改任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一九五四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他辞去了这一职务。

贝鲁特正是在斯大林个人迷信达到顶峰的时期担任党的首脑的。那些年代里，斯大林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容置疑的领袖。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即在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一九四七年九月），斯大林着手把一九四五年后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组成团结一致的阵营。在实践中，这一方针极大地削弱了每个国家的特点，这种情况在领导班子内部引起了许多冲突。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这些国家都发生了领导班子的变动。其中多数国家当时的领导人被逮捕审判，被指控为叛徒，说他们为美帝国主义或"铁托主义"从事间谍活动。其中有些人被处决了，有些人，如亚诺什·卡达尔，则被判处长期徒刑。在波兰虽然没有审判哥穆尔卡，但还是采用了当时的典型做法——对那些由于其阶级出身或政治历史而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人，对社会主义的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

普遍地进行了排斥和迫害。斯大林断言，随着社会主义的巩固，阶级斗争也日益尖锐化，波兰国内的政治生活就是在斯大林这一论点的强大影响下进行的。贝鲁特不加怀疑地执行了这一政策。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中全会上，他谈到党在“目前形势下为提高革命警惕性而奋斗”的任务，他指出，帝国主义分子迄今使用的反对革命运动的方法效果很差，于是他们越来越频繁地乞灵于挑衅，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组织自己的间谍网。这种论点对党的影响很大，因为党在那些年代对许多人，特别是对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实行镇压，这个论点则为镇压提供了根据。斯大林逝世以后，出现了苏共领导开始批判地分析已故领导人的活动的第一批信号，贝鲁特也面临着必须清算过去和吸取教训的问题。沃齐米日·索科尔斯基在《笔记》中记载了贝鲁特动身去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前一天同他的谈话。索科尔斯基写道：“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矮小的老人，他说，……我这副样子你感到奇怪吗？我病了，感冒，心脏也不好……简单地说，我觉得不舒服……现在的情况是，我应该去出席，……斯大林去世了。明天会怎么样，很难说，……你以为现在会容易些吗？……历史是由事实组成的，由已经完成的事实和将要完成的事实组成的。要保证波兰的地位，对此，我曾渴望过。……”。

贝鲁特的接班人是奥哈布。他一九〇六年八月十六日生于克拉科夫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同贝鲁特相似，奥哈布也是通过参加合作社活动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从二十岁起他就积极参加合作社运动。一九二七年毕业于雅盖隆大学高级合作社专业。一九二九年加入波兰共产党。在三十年代，他是罢工的积极组织者，他组织的罢工包括一九三二年董布罗夫斯基矿区矿工的罢工和一九三六年罗兹纺织工人的总罢工。他也是统一阵线的主要活动家之

一，他从事活动的主要地区有华沙、罗兹和董布罗夫斯基矿区等。他曾多次被萨那其政府监禁。一九三七年被判处十年徒刑。一九三九年九月他逃离华沙中央监狱后，参加了首都保卫战，尔后退向东部地区，进入苏联。他是波兰爱国者联盟和塔德乌什·科什秋什科第一师的共同创建者，列宁诺战役的参加者。一九四四年被选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此后在国家行政机关和中央委员会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他五十岁时，在党的统一大会上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五六年他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历时仅七个月。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担任中央书记。从一九六四年八月起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一九六八年辞去一切党政职务。

在困难而富有戏剧性的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的一周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选举党的多年活动家盖莱克为中央第一书记。七十年代波兰的发展，波兰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欢乐和忧伤都与盖莱克的名字紧密相连。这是由中央第一书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占据的地位决定的。第一书记的实际权限很大，拥有广泛的全权。通过选举，他是党的领导人，但只有他的观点和主张（关于国家发展、公民幸福和安宁的观点和主张）符合公民的感觉和愿望时，他才能成为人民的领导人。

盖莱克一九一三年一月六日生于本金县波隆布卡一个矿工家庭。父亲因矿井事故逝世，此后他同母亲移居法国，在那儿从十三岁起就开始当矿工。盖莱克出身于矿工世家，他的曾祖父也是矿工。一九二六年他第一次下井干活。他回忆说，“我当时很小，手提的矿灯碰在地上，不得不把灯提手弄短些。”矿工干的活不仅繁重，而且还有生命危险。这就使得矿工们之间有着特别强烈的团结感和集体感。

他在当矿工的几年中积极地参加了法国总工会的工作。一九三一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因参加矿工罢工被法国警察局驱逐出境。回波兰呆了三年后，一九三七年再次流亡国外，赴比利时当矿工。在比利时居住期间，他是比利时共产党党员。战争结束后，他在比利时组织了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爱国者同盟，并领导了在比利时的民族委员会的工作，任该委员会主席，历时两年多。

一九四八年盖莱克回到波兰，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一九四九年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卡托维兹省委书记。在卡托维兹他念完了业余大学，获得煤矿工程师证书。一九五四年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央书记，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从一九五七年起兼任波兰统一工人党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他领导西里西亚党组织达十三年之久，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不仅在西里西亚人们认为他是个好当家的，是个面向现代化的政治家。一段时期以来，在党的积极分子中就议论说，盖莱克将是哥穆尔卡的接班人。

值得指出的是，在战后波兰党的领导人中，盖莱克有他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他的出身。哥穆尔卡和奥哈布都出生在加里西亚地区，并在那儿度过了他们的青年时代。贝鲁特则出生在卢布林地区。加里西亚地区和卢布林地区是波兰的二类地区，在这里经济的落后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哥穆尔卡、奥哈布和贝鲁特三个人都是在这样的地区成长起来的。只有盖莱克是人民波兰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波兰西部地区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也是第一位在西欧侨居了二十二年之久的领导人。同前面三人相比，他是在截然不同的文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不是件小事，因为环境对于人，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有着极大的影响。

最初的步骤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举行议会全体会议，在国家最高领导中进行了人事变动。鉴于马·斯彼哈尔斯基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议会选举迄今的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波通社报导员写道，会议厅里笼罩着肃穆和期待的气氛。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是西伦凯维兹，他宣布辞去总理职务。他说："根据多年的经验，我认为在我国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情形下，我不应该继续担任执行机关首脑的职务。国内发生的事件，我未能事先予以防止，这些事件只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上才找到了符合国家切身利益的、必要的和恰当的政治解决办法。"

认真观看议会会议进程的电视观众会注意到，总理在宣读自己的声明后，使劲地把手中的几张纸捏成了一团，走回主席台座位上。这对他来讲肯定不是轻松愉快的时刻。值得补充的是，在哥穆尔卡领导核心中，在悲剧的一周里，他是唯一的一个面对广大公众舆论的人。西伦凯维兹任总理二十二年。多年担任副总理的雅罗谢维奇当选为新的部长会议主席。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对人事变动作了说明。*

---

* 弗兰齐舍克·卡伊姆和扬·米特伦加任副总理。塔德乌什·符热什契克任机械工业部长，沃齐米日·莱伊查克任重工业部长。

新总理提出了政府工作的主要方针，同时他指出这不是详细的活动纲领，因为制定这样的纲领需要时间。总理认为，第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要作出决定，来改善最低工资收入者、多子女家庭和养老金领取者的物质状况。为此目的，决定拨出七十亿兹罗提。盖莱克在议会讲话中声称，居民收入的增加如果超过这个界限，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现象，从而在市场上引起新的混乱和居民供应情况的恶化。盖莱克还指出，党的领导认为，政府必须通过决议："除了有季节性价格变化的食品外，至少在两年内，冻结其它所有食品的价格。"毋庸置疑，在事件的压力下作出的这个冻结价格的决定，成为以后几年经济政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理表示，政府将着手对一九七一年的经济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改，同时将制定新的五年计划，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也将体现出由于对最近事件原因的分析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新因素。总理宣称，把满足社会当前和日后的需要放在适当的高度，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针。这要求"在市场供应问题上，要有新的气象。"关于投资政策问题，雅罗谢维奇表示，"形势绝不允许增加计划以外的投资支出，不管是用于生产目的，还是用于其它需要。"

总理在讲话中还谈到外交政策问题。他指出"我们极其重视，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我国现行的外交政策。"

十二月事件引起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密切关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和政府内部的变动在新闻报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主义国家十分关心波兰那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在危急的一周里，他们对那些表明危机在加剧的一件件事实感到不安，对七中全会决议则感到宽慰。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给盖莱克的贺电中对他当选为第一书记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强调说，

苏联共产党深信波兰共产党人的党“能够顺利地克服最近以来在国内生活中出现的困难……”。

议会开会那天，《人民论坛报》就盖莱克星期日的讲话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在经济这个生活领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不屈从于行政命令的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今天已经不可能用单方面的决定来正确地领导象波兰这样的国民经济的复杂机制。为了使国家、地区、企业和机关生活的领导体制符合我们时代的要求，其基本条件就是要把集体领导原则同明确划分的个人职责结合起来，就是要保证在我国制度机制的巨大结构中每一个单位都能用正确的方法完成自己的任务。”文章提醒说，只有采用这种领导和管理方法，才能保证盖莱克所说的波兰的高速度发展。高速度发展的口号，如同党和社会就国家和公民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的要求一样，已经开始进入波兰的政治辞典。《人民论坛报》在节日前发表的又一篇评论中写道，“同社会广泛磋商的方法应作为从上到下的各级国家机关的行动指南。”在这篇评论中该报要求：“必须摈弃一切妨碍我们生活的东西，独断专行，自我满足和轻视舆论……”。

国家缓慢地恢复了正常生活。在议会开会的前一天，即十二月二十二日，什切青“瓦尔斯基”造船厂的最后一部分工人停止了占领性罢工并离开工厂。什切青港口职工、“奥得拉”服装厂工人、什切青“格利芬”修船厂职工、建筑公司职工以及其他一些工人也都复工了。《什切青之声报》在评论这些事实时写道：“什切青正在恢复平静。”

按预定计划，十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五日在一百零六家最大的工厂里举行了协商性会晤，讨论有关分配七十亿兹罗提的各种建议，这笔钱将用来贴补因十二月十三日涨价而受损失的工资收入

最低的家庭。几天后，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提高最低工资，关于对某些工种的职工实行工资补贴，关于提高家庭补贴和退休金、养老金”的决议，最低工资从八百五十兹罗提提高到一千兹罗提。

十二月二十八日，《海岸之声报》发表了该报集体编写的长篇报道，题为《事件的全貌》。报道对格但斯克、格丹尼亚和埃尔布隆格事件过程详尽而枯燥的描写，表明了戏剧的逐步发展，证实了形势的复杂性——一方面是非常失望的、对人民政权失去信任的工人，另一方面是破坏欲强烈的社会渣滓，而他们的对立面则是力图制止破坏的军队和警察。回过头来读一读八年前的新闻报道，即使某些人可能认为这些报道不够完善，不够全面，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沿海地区的事件把波兰国家和人民推向了民族悲剧的边缘。领导层的变动则是完全必要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盖莱克向波兰人民发表广播电视讲话。这不是一篇应景的演说。党的领导人讲到，指导国家的政治思想必须永远同现实进行对照，而每一个行动必须永远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

第　二　章

重要决策的一年

“……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使每天只有一碗菜汤喝，我们也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进行劳动；但我们希望得到保证，那就是这碗菜汤的分配将会是公平合理的。”

（摘自格但斯克造船厂一位工人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同盖莱克会见时的发言）

自发的讨论*

由于许多原因，一九七一年是人民波兰历史上值得特别注意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波兰统一工人党制定并向社会提出了七十年代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尽管后来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战略进行了一些修改，但其基本方向没有改变。

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新设想是在困难的政治条件下产生的。诚然，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的人事变动使可怕的危机得以制止，但是，国内的政治形势仍然是困难和复杂的。社会上对盖莱克担任中央第一书记表示满意，但对新领导发表的旨在恢复党与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失去了的联系的意向宣言和最初决定却有很大的保留。存在着一种等待的情绪，在某些工人集中的地区，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不信任气氛很浓。这种不信任气氛是可以理解的，它和“波兰十月”后最初几周所常有的那种兴高采烈大不一样。在党的、工会的和其它组织的成百上千次的会议上，在报刊上，在给编辑部的信件以及私下谈话中，人们一再提到和分析十二月事件的过程，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而首先是对未来的保障问题。人民想知道，党是否将实行一种能使不久前大家经历过的类

---

* 此节原文无标题。标题是后加的。 ——译者注

似形势不再重演的政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一九七一年是全民的自发的、就具有重要思想意义和爱国主义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的一年。

在十二月事件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这些讨论主要是对导致悲剧的政策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并不是只因为涨价人们才走上街头，而首先是抗议对社会生活的危险的歪曲。长时间以来，许多人已经感到在党的领导层同广大党员和社会之间出现了鸿沟，感到几年来不断加剧的冲突必然会导致悲剧性事件的发生。如果党的领导能从波兹南的历史教训中得出正确的结论，那末这次事件本来是可以防止的。

正象公民们所说和所写的那样，几年来波兰出现的紧张和国内的气氛，已经把社会弄得疲劳不堪了。应该以诚恳的态度对待社会，怎能用标语口号和连篇空话来充填社会的饥肠呢！对记者的批评尤其多。人们呼吁他们：读者期望你们认真对待那些能够揭示沿海地区事件真象的问题。报道不完整的消息，不敢多讲真情实况，这不仅不利于恢复人民的信任，而且还会引起社会的淡漠、消沉和厌恶。在绝大程度上社会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当然是赞成没有病瘤的社会主义。人们愿意同当局谈话，希望当局倾听他们的意见，希望当局能象对待成熟的、有充分权利的、负责任的公民那样对待他们。不仅要讨论改善经济形势的方法，而且还要讨论党、政府、部长、厂长行使权力的方法。对这些机关所作的决定，应该规定由社会进行监督。个人所担任的职务不应是终身的。只是到了工人走上街头的时候，中央机关才作出人事变动，这就说明制度中存在着某种错误。一位读者给华沙一家报纸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我的父亲是一位老工人，是工人运动的老战士，他住在埃尔布隆格刚刚四年。他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城市，喜

欢这个城市，这是他生活的最后一站，但破坏性的风暴降临了，到处留下了它的痕迹，街道遭受毁坏，父亲曾经信任过的一些人也兽性发作。因此毫不奇怪，他由于失望而抱怨国家领导人，抱怨那些也许只是因为一般的疏忽和不慎而造成了这种局势的领导人。父亲要求我，只要我的社会地位允许，就不能容忍将来出现破坏我们民族家园的事情。尽管有这些苦涩的意见，我还是乐观的，因为我更有经验了，我也就更加谨慎和克制”。

讨论中对政权问题谈得最多。人们对干部政策的弱点、党委会的官僚主义化和缺少自下而上的批评等现象进行口诛笔伐；人们提问，是谁决定进一步“勒紧裤带”的；为什么哥穆尔卡忽视社会情绪？诺瓦胡塔钢厂一位工人说：“……信任中断了。今后任何一位波兰领导人也不会再有哥穆尔卡曾经享有的这种信任了。因此，社会的失望要求领导必须有更多的理智和谨慎。新领导目前只在一点上得了分，即它拯救人民免于内战，免于岌岌可危的兄弟间的相互屠杀及其难于挽回的后果。在这一点上已经赢得了信任，但在其它所有问题上人们还在等待。迄今的经济措施对于需要来说只是沧海中的一粟。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但终究不是最迫切的。主要的问题是，要重视社会，倾听群众的呼声，遵守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及无情地根除那些身居要职而好耍手腕的人，不学无术的人和暴虐无羁的人，等等”。人们说，如果党想实现对社会各界的保证，就应该真正地尽快地不仅同自己的党员，而且同全体波兰人民开始诚挚坦率的谈话。对最高审判者——波兰人民，必须讲真话，只能讲真话，全部讲真话！我们不是经常需要听听教训的人民，我们很了解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的复杂局势。在讨论中，许多发言和提问都涉及到改进领导和管理体制的过程问题。人们问，已经决定了的某些改革为什么半

途而废？修正主义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两者之间的界线在哪里？为什么许多早该解决的事情我们抓不住，只是修修补补呢？

讨论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工人参加工厂的共同管理及其作用问题。人们说，工人自治是个空架子，事实证明，它同工厂委员会一起只能给行政部门和厂领导装点门面。工资制度也需要改进。行政部门的庞大和许多机构的重叠也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从会上的许多发言看，从写给日报、周报编辑部的来信看，对于领导人，对于党的各级活动家和政论家所作的保证，即下决心保证摆脱导致十二月危机的领导方法，社会上某些阶层是不十分相信的。十二月事件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人们常常采取以厌世哲学为特点的态度。一家华沙报纸的读者在给编辑部的信中问道，“我有什么把握十年后会不再谈论革新的需要呢？”另一个读者写道：“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后，充满了热情和希望，现在肯定和那时不能同日而语了。恐惧、担忧、犹豫、甚至厌世是当前形势的特点。我们所遇到的倒霉事太多了，太频繁了，为了不向它屈服，确实需要很大的耐力。为了能够坚持下去，就需要抱有希望。我们努力靠这种希望生活下去。一九五六年，我们看到了希望的光芒，但它始则缓慢地、随后就闪电般地开始熄灭了。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明显地感觉到了坏的事情即将开始。大家都知道了，只有领导还是两眼漆黑，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这是怎么搞的呢？是制度起的作用不好，还是人不好呢？如果我们承认是制度不好，是它没经受住考验，——那么一切就此完结！但是，我们排除了这种想法。因为很难摈弃在理论上保证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好的前提。每一个人都希望生活得好一些，富裕一些，舒适一些，这当然是正常的。我国制度的基础明确无疑地规定了这一点。

看来，这对每个普通公民，对劳动人民来说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愿望。那么，为什么人们要怀疑呢？这里只留下了一种解释，即人不好。是所有的人都不好吗？可能每一个人都负有一部分责任，但是，主要的过错却应由那些指导体制运转的人来承担。”

在十二月以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对哥穆尔卡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人们感到遗憾的是，这位领导人从人民中来却又失去了同人民的联系。人们也想到一九五六年十月，想到他当时的讲话，他也曾经激昂慷慨地谴责那种导致党和工人阶级以及党和全体人民中断联系的政策。

上面引述的一些片断只是真正的全民性的自发讨论中谈到和写到的一小部分，从这些意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沿海地区的事件多么深刻地震动了波兰社会。由此可见，七中全会组成的党的领导班子是在特别困难和异常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开始自己的工作的。这一时期波兰人的思想状况远不是稳定的，其特点是希望与疑虑、乐观与悲观、温和与极端交织在一起。

在什切青和格但斯克的对质

一九七一年一月波兰沿海地区的政治形势比其他几个大的工人阶级集中的地区更为紧张。在沿海地区，社会还未能从不久前所经历的震动中苏醒，虽然工人们上班了，但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罢工的危险。工厂里的讨论持续不断，除了批评十二月二十日以前的形势外，还提出了许多经济要求。人们要求稳定物价，并同暗地的涨价作斗争；人们主张工资要合理，要求取消所谓工资"悬殊"，主张对人的评价要根据劳动；他们还要求制止进行轻率投资的做法，减少束缚工厂及职工积极性的指示，同官僚主义和忽视工人需求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等等。

《海岸之声报》记者一月中旬在报道党组织会议的情况时写道："在举行过罢工和街头示威的工厂里，开会时更富有感情的色彩，激动的情绪平息不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会上的发言是苦涩的，痛心的，有时是不客气的"。有些人问道："如果有人说气话，会不会挨整？"记者介绍了会上提出的问题，涉及最多的是党。是否领导干部的变动都必须有个悲惨的过程？党中央和政府中的监督部门干什么去了？对于令人不安的情绪的信号，党中央为什么没有反应？人们要求对领导职务实行轮换制，主张党的工作原则应该是进行指导和监督，而不是搞行政管理；党应该

向我们通报情况，听取我们的意见，对工人应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党必须坚决抛弃追求冠冕堂皇的、“学院式的”工作方式，应该停止粉饰太平。对工会，人们则要求它彻底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记者的结论是：“可能很久以来党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以便在工厂里整顿所有的问题，杜绝浪费，消除工厂中人与人关系中的一切不公平和不正常现象，提高职工的劳动效率”。

一月上旬在格但斯克举行了格但斯克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从华沙来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科乔韦克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沿海地区的报纸登载了他的发言，工人们对这篇发言的反应不好。他大谈国内的经济情况，而对于自己提出的问题*却回答得很缺乏政治性。到会的人本来希望他批评哥穆尔卡和雅什楚克的经济政策，而他们听到的却是：过去的情况是严重的，现在仍然是严重的。科乔韦克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沿海地区的工人们对涨价期间所列举的种种理由记忆犹新。我们都记得，报纸以及他本人在第二次电视讲话中都曾证明，造船工人的生活比其他行业的工人要好，因此造船工人没有理由罢工。

谈到消费问题时他说，对待这个问题“与以前已有所不同”。可是，同提高工资问题一样，工人们想要听到的肯定是另外一些话。科乔韦克的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当他作这番发言时，他还没有觉察到危机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他曾坦率地承认：“几周来我们的感受是十分沉重的，有时简直让人受不了。几周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发生的事件，……我认为，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些

---

* “在这里我想谈谈讨论和提问中提到的事：为什么不在事件之前，而在事件发生之后才决定为工资最低的人提工资？为什么在这之前说这是不可能的？”（《海岸之声报》一九七一年一月九、十日）

问题上来，几年后还会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因为永远也不能把它们从记忆中抹去"。尽管有这番话，但还是不能使上述印象消失。

在作了这番表白之后，科乔韦克并没就自己在十二月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自我批评。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毫无疑问，不论是当时与会的积极分子，还是第二天从报上读到他发言的格但斯克和格丹尼亚的工人们，都会客观地评价这位经历了巨大个人痛苦的活动家。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以后几天就出现了要科乔韦克下台的要求。

科乔韦克的发言是不得体的，不说明问题的一般化调调太多，许多问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他说，我们曾试图通过广播和电视的呼吁来制止事态的最坏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呼吁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没有说明是些什么原因。他解释为什么必须在沿海城市动用治安人员上街的一段话也说得大杀风景。他的观点是，"我们应对他们尊敬和赞扬"。他还说，"尤其在最近几周内，反对人民波兰的所有颠覆中心都在异常疯狂地粗暴围攻"治安和公安人员。"这是目前主要的攻击潮流。这种攻击的目的过去一直是清楚的，现在更加清楚了。它要先把我们党所拥有的一切手段都取消掉，然后再去搞第二、第三和以后各个阶段"。

他关于格丹尼亚悲剧所作的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如果不是地区指挥部的某些错误决定，这个悲剧本来也不一定会发生。经过八年之后，今天来分析科乔韦克的发言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党的领导成员在十二月事件之后，在发生可怕悲剧的地方的第一次发言是没有说服力的。《海岸之声报》的主编采利雷夫斯基在事件发生三周年之后是这样描写沿海地区人们的情绪的："全国都在进行讨论，探讨沿海地区十二月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对我们——这个地区的居民来说，当时就谈论这个问题是最

困难不过的了，因为事件的细节仍然不断在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许多问题都等待回答。对于在这里、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眼皮底下所发生的事，在短期内我们的态度不会是深思熟虑和平心静气的，不会很快转化为对这场社会危机起因的一般条件进行抽象的思考。……一些细节还在不断吸引着我们，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我们的亲人和所有那些我们愿意真诚相待的人们”。既然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这样的精神状态，那么当科乔韦克发表讲话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会是怎样的呢？

他的发言对于沿海地区的工人们没起到安抚作用。许多工厂的职工们仍然抱着极不信任和观望的态度。工人们情绪激烈的会议继续在进行，人们在会上不仅尖锐地批评中央，批评执政方法，而且首先是批评地方当局以及具体的工厂在福利政策和工资政策方面许多令人吃惊的弱点和疏忽。还不止一次地爆发了短暂的罢工。一月二十日造船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斯坦尼斯瓦夫·斯克洛博特工程师在格但斯克电视讲话中呼吁全体造船工人和“关心造船工业的人们”，要他们“给予帮助，要理智，要认真劳动，把耽误了的活补上去”，呼吁他们“不要由于自己的行动给自己带来损失，给工业带来损失”。形势仍然是严重的，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新的大罢工浪潮。

在此期间，什切青的形势也不见得好些。不错，《什切青之声报》在一九七一年第一天曾经写道，什切青人以平静、严肃的心情迎接新年，相信“我们党中央新领导的纲领能顺利实现”，但对于人们思想状况的这种估计是过分乐观了。从报纸关于新年后各工厂举行的党的会议和其他会议的最初报道中，难于了解真正的思想状况。从一月五日什切青省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的报道中，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参加讨论的人以他们所代表的党组织和

职工的名义，表示要以忘我的劳动来支持党的新领导的纲领。有关会见的报道中，多半是这样一类词句："接着展开了热烈而尖锐的讨论"，或"党内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是讨论中的主流"。但是几天之后，什切青报纸的报道调门明显地变了。一月八日《什切青之声报》登了一篇文章，题为《革新中的对话》，文中写道："我们许多人的脑子还没从当时的激动中清醒过来"，在与积极分子会见时，进行着非常必要的、诚挚的讨论，因为"重建党领导与党之间的信任，重建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对党和当局的信任，其条件就是坦率地揭示苦涩的真情"。文章作者还写道：人们普遍认为，"战后二十五年来，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震动了，因此对任何人说来光只宣言已经不够了"。报纸还指出，会上愈来愈多的人在发言中要求实行职务轮换制，以便不再出现原班人马多次当选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情况。

《什切青之声报》另一篇标题为《沉重的日子》的文章称，工人们表达自己意见时的那种坦率劲，他们所提的要求那么具体，这是"谁也不能忽视的人民情绪的表现"，而迄今所进行的改变"只是道路的起点"，问题在于，应使接踵而来的变化"符合劳动者、全体人民与国家的真正利益"。

报纸表示，由于缺乏足够广泛的情报，社会上有许多是非不清的看法。几乎每一次工人集会都要求新闻机构扩大报道面。人们要求充分报道事件的经过和公布死亡者的名单。《什切青之声报》也提出了这种要求，它在一月十一日指出人民的情绪不妙，我们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这是一种紧张还没有完全过去、讨论很热烈、事件的节奏正在加快的气氛……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什切青省检察院就应该公布在悲惨的十二月事件中在我市街头牺牲的全部死亡者名单"。检察院的公报是一月十六日公布的。

如果考虑到工人们曾一再提出这个要求，那么推迟公布死亡者的全部名单这个事实就说明了有人还一直不理解十二月事件的实质，而经历了这次事件的沿海地区的工人们是意识到自身的力量的。省委领导班子到一月初还原封不动，这使得什切青沿海地区的政治形势更形复杂。在许多次工人集会上，人们坚决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第一书记安东尼·瓦拉舍克下台。他直到一月十一日才下台。新的书记是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奥乌贝克。更换书记是在省委全体会议上进行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希德拉克出席了这次会议。开会的那天，“瓦尔斯基”造船厂又发生了罢工。尽管几小时后就平息了，但这是个信号，说明政治形势还是非常不稳定。希德拉克在全会上讲话时认为，基本任务是要克服十二月危机的后果，并加速巩固党的队伍。他也用这一条说明省委领导的人事变动。他正确地注意到，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要创造条件，使人事任免能够正常地按常规进行，而不要在危机情况下进行。至于工人的抗议，希德拉克认为应该在合法的范围内找到出路。很难说他是怎样理解这个提法的。波兰的立法并不把罢工当作非法活动。

由于在很多工人会议和集会上都尖锐地批评了党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这位党的领导机关的代表声称：“不能将前段时期的错误归罪于党的机关。党的机关是按照领导所规定的方法和所形成的气氛活动的”。希德拉克在竭力抚慰党机关工作人员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彻底改变工作作风。他说，目前党的机关从上到下都必须改变自己的活动方法，对国家政权和行政机关不要包办代替，而应实行“党的监督”，可是他没有详细说明怎样监督，更确切些，没有说明这种监督应该具有什么形式。当然这并不是指责，因为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党的领导正忙于考虑比党机关的工

作方法远为重要得多的问题。国内的形势，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形势仍然是不平静的。工人的批评几乎涉及了政治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什切青之声报》一月中旬不安地写道："如果党的活动家和经济生活的领导人只是忙于解释往往是根据各种谣言而提出来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不会有时间来解决具体问题了"。在另一篇文章里，该报表示了这样的观点：将党的生活准则仅限于民主，这就会"把党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机体，一个无法活动的争论不休的俱乐部"。为了证实这种看法的正确性，这家报纸引用了"我们南边邻居近几年历史中可悲的经验"。

《人民论坛报》也报道了职工会议上的气氛。该报在一月十五日的评论中写道："……今天我们十分需要旨在顺利解决问题的讨论，但在讨论中，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出现了另一种潮流。有些发言缺乏考虑，带有社会蛊惑色彩，另一些发言是想制造混乱和不安，其最终目的是想阻止只有党才能领导的真正的革新。结果在有些工厂里社会纪律松弛，职工对自己今天面临的任务的责任心下降"。

从客观上说，这些呼吁是有道理的。那时波兰需要安定，工厂需要有节奏的劳动，会议上的发言需要理智，但问题在于，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党的中央积极分子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社会失望的程度有多深。一月中旬，为了"支持党的新领导和为了人民波兰的利益"，在什切青曾组织一次生产献礼运动。这个例子是领导不了解真实情绪的相当典型的表现。报刊，尤其是中央报刊在评价政治形势时所使用的一般化提法也无助于消除紧张。

在沿海地区工人的讨论中，突出的题目有四个：党的活动，工会的活动，新闻报道机关的活动和具体的生活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人们要求制定"广大党员群众对政治局、对各级党委的

执委会等执行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的方法，并重又提出领导职务实行轮换制的要求，还要求“在党组织的选举中加强民主”，改进党内情况通报工作以及消除党委会工作的官僚主义（有个工人说：“工人去找自己的党的领导人，经常吃闭门羹，这种情况不能再出现了”）。《什切青之声报》一月十九日写道：“关于党内的气氛，确切地说，关于党的工作作风，关于党内民主问题，在各种会见和会议上谈论得很多，现在仍然议论纷纷。首先是基层的活动家，他们带着合理的满腹意见在谈论这些。他们是有权利倾吐苦衷的”。

工会的活动遭到了特别尖锐的批评。* 工人们说，工会并不总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保卫者”。在工人的会议上大家说，工会是官僚化的机构，屈服于经济行政机关的压力，在讨论职工的合理要求时，工会没有足够地维护国家给予工人的权利。

大家要求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充分报道国内当前的事态。他们认为，记者们只是一般化地、而且常常是不真实地在新闻报道中介绍工人们的意见。工人们说，波兰社会应该得到保证，使“类似的情况不会周期性地重复”。大家在会上说，这也取决于报刊能在多大范围内监督党和政府政策的正确实施。

生活福利问题在会上谈得特别多。人们举例说明厂方不认真对待、甚至是蔑视法律和法令所给予工人的合法权利。他们批评了十分明显的忽视福利的现象，例如职工食堂的情况很糟，缺乏足够数量的幼儿园，在奖金分配上徇私舞弊，厂长专横跋扈，工人

---

*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洛加—索文斯基辞去了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他是“怀着充分的责任感，懂得必须根本改变工会活动”而提出辞职的。

有许多问题必须“通过后门”才能得到解决，住房政策中问题成堆等等。对于工厂领导和上级领导的批评是十分尖锐的。

关于工人在工厂日常工作中的影响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批评性意见。最常提到的是，工人们的影响极小或是根本没有影响。“瓦尔斯基”造船厂工会主席对这方面的做法作了最切中要害的描述。他说：“我记得一次干部会，在这次会上将更换一位经理，我作为工人委员会代表参加了这个会。但在开始讨论人事问题时，他们对我说：‘现在你出去吧，该谈人事问题了’”。

当然，沿海地区工厂中的气氛对全国的工人阶级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在那些日子，经济中的停产现象屡见不鲜，造成了无法补救的损失。

为了使局势稳定，党政领导采取了缩小沿海地区气氛意义的策略。读一读当时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刊上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其中的主调是乐观主义，大力号召人们认真劳动。外来的观察者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十二月危机已经最终结束了。但这是幻觉（许多杰出的活动家，尤其在华沙，都产生了这种幻觉），新的风暴正在向什切青袭来。

一月二十三日，“瓦尔斯基”造船厂的职工又罢工了。罢工委员会宣布了十二条要求，其中列于首位的是要求把食品的价格降回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以前的水平。委员会接着还“根据各车间公开会议上表达的意愿”，要求毫不迟疑地合法选举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领导，照付罢工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并充分保证他们在厂里和城里的人身安全，认真向他们通报造船厂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还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盖莱克和总理雅罗谢维奇到造船厂来。

在一月二十三日写的《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

书记盖莱克同志的公开信》中，罢工委员会代表造船厂的职工声称：“什切青造船厂的职工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拥护社会主义并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的。我们也拥护革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盖莱克同志和雅罗谢维奇同志正在彻底推行革新，我们完全支持他们。但我们看到，这种革新正遇到巨大的抵抗和阻力，它来自那些怕对自己迄今的工作负责的人们，这些人不善于或是不愿意同工人阶级进行较广泛的直接对话。

什切青造船厂的罢工是这类人有意挑动起来的，全部责任要由他们承担。这些人不顾造船厂里已经出现的情况，按照老一套的不恰当的方法行事，结果引起了职工的反感，而进一步的错误就引起了罢工。

行政、党和工会领导紧接着采取的态度迫使职工无法合理地迅速结束罢工。

这种态度和工作方法无法在工人阶级同当局之间恢复已严重削弱了的关系，反而增加新的怀疑和误解、以及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所开始的革新过程的今后命运产生担心。

在这种形势下，造船厂的职工向盖莱克同志提出，要求严厉处分那些由于其态度和行为使造船厂职工除了罢工之外没有别的活动余地的人”。

在造船厂罢工之前曾出现过这样的事。一月二十日报纸报道了管子车间搞生产献礼的消息。对一月十九日的这次活动，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作了报道。次日，《什切青之声报》对这件事作了介绍，该报说：“这项献礼活动是由该车间班组长中的一些人作出的，发起人是车间主任，班组长……，召开这次群众集会宣读生产保证，事前并没向职工打招呼”。这就是上面提到的公开信中所说的“老一套的不恰当的工作方法”。

造船厂的罢工有蔓延到其他工厂去的危险。一月二十四日市交通公司的职工举行了罢工。一月二十五日《什切青之声报》登了一则公报，其中谈到各车间代表及工厂工会代表与公用事业部部长的会见时写道："由于部长保证，职工们提的建议和要求在最近几天内将得到答复，各车间的职工代表团决定复工"。这则消息登出后，工人们复工了。

什切青面临着总罢工。如果真发生的话，新领导、尤其是盖莱克的政治地位就会大大削弱。毫无疑问，这类事情对于波兰在朋友中的地位也会是很不利的。

从能够见到的文件以及口头消息来看，上级对于造船厂再次罢工的第一阶段（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作了错误的评价。省当局认为新的罢工是反对该市和国家切身利益的颠覆行动。一月二十三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什切青省委会和该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发了一份传单，第二天由五百名党的积极分子将这份传单送到每家每户，并在街头散发。传单内容与对罢工的上述评价有关。传单写道："我市出现了很危险的形势。包括两个造船厂在内的几个工厂罢工了。今天，这种行动同劳动人民的真正利益毫无共同之处……当全国工人阶级以生产献礼和忘我的劳动来支持党的新领导的纲领时，什切青部分工人却在罢工。制造混乱的人提出了蛊惑人心的不现实的要求，有意挑动，不让人们正常工作，以便保持紧张状态"。

传单的作者们还列举了他们认为是万无一失的理由：来自西德修改边界主义方面的威胁。"我们的政府正努力争取最终承认波兰目前的边界，其主要的论据是人民在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但正是在这个时刻，在什切青这个被复仇集团攻击得最厉害的波兰城市里却持续动荡不安"。一九七一年一月份，在这个问题上波

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行动，因为没有这种必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签署的条约已清楚地肯定奥得河和尼斯河是波兰的西部边界。

传单中几乎每一段里都重复着关于外来威胁的论调。传单写道："公民们！什切青的形势无论对于我们，它的市民们，还是对于整个国家，对于波兰，都可能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种形势只有利于我们祖国的敌人。……

男女工人们，工作人员们，青年们！

我们还记得令人痛心的十二月的日子，那时西德修改边界主义者的敌对中心，利用市里的动荡不安，破坏我们对什切青的权利和对奥得—尼斯河边界的权利，这个边界是苏波战士们流了鲜血才归还给波兰的。你们想一想，这种不假思索的行动会走向何处？无政府主义和混乱对谁有利？

不允许参加这种行动，不能容忍这种行动！

为了我们家庭的安全和我们生活的稳定，为了波兰的什切青——你们必须尽快地自己恢复秩序，去上班，和成百万劳动者站在一起……"。

起初，华沙方面毫无疑虑地接受了这样的论点，即罢工仅仅是几百个人搞起来的，这些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四千职工，事实上是胁迫他们罢工。实际上，与我们打交道的是一些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客观上正把当局推向对抗。华沙得到的消息是，在这几百个人中，大部分是些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青年。根据这种估计，决定采取政治行动来孤立这部分人，说服什切青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必须与冒险分子划清界限。计划星期六晚上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发表电视讲话，并在什切青进行大规模的解释工作，在中央则着手动员党的积极分子，准备把他们派往什切青。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对什切青局势的估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消息传到了党中央大厦，从这些消息看，罢工决不是几百名无法无天的青年人搞起来的，什切青处于总罢工的前夕。中央书记处在午后将已经开动起来的整个机器刹住了。盖莱克做出了七十年代的一个重大决定。第二天有一架飞机从华沙奥肯切机场飞往什切青。飞机上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盖莱克，总理雅罗谢维奇，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防部长、什切青地区议员雅鲁泽尔斯基，中央书记巴尔齐科夫斯基，副总理卡伊姆以及内务部长什拉赫齐茨（十二月事件时他在格但斯克监督公安部门和民警的活动）。当飞机起飞时，它的乘客们还没有明确的行动方案。降落后听了当地领导汇报造船厂和什切青的实际情况之后，盖莱克就在上述党政领导成员的陪同下来到了造船厂。星期日下午四时，他们开始与职工代表会见。会见持续了九个小时。整个会见过程都由厂里的广播站予以转播。包括船厂工人和城市居民在内的一万多人聚集在船厂大门前收听会见的经过情况。

从各种能收集到的报刊和口头消息来看，什切青会见是在无比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当时在场的《人民论坛报》主编巴雷茨基写道：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会见了那些“有理由感到不满，有理由作出主观的论断、甚至作出不公正的评价”的人。领导人和工人“诚恳地交谈，倾诉自己的疑问和希望，共同商量，相互寻求支持和信任……而不是互相发表演说互相训斥”。什切青广播电台的评论称，这次会见中没有演说，没有决议——“有的是认真、坦率、毫不客气的和毫不隐讳的讨论，是最高党政领导的代表与工人们的谈话，没有秘密、毫不掩饰、没有躲躲闪闪的外交词令”。所有的、往往是棘手的问题都得到了回答。这是“有教

育意义的一课，它表明只有真正的谈话，与工人阶级面对面的谈话，才能解决和说清楚那些工人阶级、国家领导和党都很关心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一课中找到一个好的榜样，从中得出结论用以指导自己今后的行动。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想象中的人民政权的风格同这一课完全是两码事”。各报刊转载的波通社关于会见的详细报道中写道：“在这次会见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掩饰自己的立场，把心里的话都讲了出来”。

在九个小时的讨论中，大家谈到了具有全国意义的问题以及厂里的问题，就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势，法制和治安等都表示了意见。在许多发言中，人们以尖锐和坚决的口气要求从战后时期令人痛心的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谈到有必要作出持久的保证，使任何危机形势不致再次发生，尤其不要再出现象什切青这类尖锐的冲突。例如人们要求制定具体而可以核查的干部政策，其中包括由选举产生的各级干部要实行定期轮换。有个工人说：“一九五六年，我们给了哥穆尔卡以完全的信任，但希望落空了。我们现在十分希望不要再让我们失望。我们真诚地相信，今天我们给予盖莱克同志的充分信任一定会对他有好处。我们相信这一次我们没有弄错”。

在讨论中，占时间最多的是当地的问题，首先是造船厂的经济与组织问题，福利情况，人与人的关系，行政的活动，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工人自治机构的活动。什切青的造船工人代表说：“为了支持盖莱克同志，我们准备额外造一艘船，可是我们担心在我们船厂目前这种劳动组织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及时赶造出来”。另一个代表补充说：“即使我们克服了劳动组织上的困难，这艘船也到不了盖莱克同志那里，因为工厂领导会把它当奖金自己分掉”。造船厂里的奖金制度对工厂领导过份有利，人们

对此提出了特别尖锐的批评。工厂行政和领导编制不断扩大的现象也遭到了严厉批评。一位工人说："过去我们车间里监督与今天相同的工作只要一位师傅就够了，而今天却由七个人来做。一个主任有几个副主任，结果谁也不对工作负责"。关于福利问题也提出了不少要求。对工厂领导以及工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党和工会干部"必须经常在我们中间，经常同我们作诚恳的交谈"。他们说，许多党和工会的活动家同工人阶级失去了联系，脱离了工人阶级，他们与工人的接触只在过节时才有，他们不是进行交谈，而是作单方面的演讲。"我们希望当我们到市委会或省委会去找我们的上级时，肯定他们会听取我们的意见"。大伙说，党组织讨论生产问题，但却忘记了普通的人。党的会议经常限于听"书记读文件，却很少有人发表自己的意见"。许多党员是"专门开会的，而不是给人树立工作榜样的"。一位什切青的造船工人说，如果谁想当共产党员，"那么就让他为我们共同的福利而奋斗吧"。人们多次提出，要求精简群众组织的编制，尤其是工会的编制。大伙说，"我们不要那种成天往上级那里跑、成天坐办公室把裤子都磨旧了的人"。最后是工人与厂方的关系问题。什切青的工人说，我们必须有把握"将来能与厂方共同解决所有的基本问题"，但是"厂长办公室并不是与工人阶级进行对话的地方"。

大伙对于在悲惨的一周里活跃在沿海地区的治安部队，对于当地领导核心的成员，对于报纸报道事件进程的方式以及对于什切青地区的议员们都提了很多尖锐的批评。一位工人说："盖莱克同志和雅罗谢维奇同志，这些话很不客气，可能伤你们的心，但是我们只能用这些话和用我们的劳动来帮助你们"。

来自华沙的政治家们不是被动地听取工人的发言。他们在讨

论中也发言，他们进行解释，纠正某些评价和观点，表示赞同并表明要积极行动以消除惊人的不正常状态。内务部长什拉赫齐茨向船厂职工们保证，参加罢工的人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雅罗谢维奇总理也讲了话。

盖莱克在讲话中说，在什切青造船厂和全国出现的形势是由来已久的，又以最近三年最糟。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计划实际上被舍弃了。经济情况一年年恶化。目前国家已没有任何储备可以使新领导有所作为。他说："我们把车子开进了死胡同，很难按我们所愿意的那样调过头来了"。至于造船工人提的许多要求，盖莱克对其中的很多表示了同意，对另一些则进行了争辩。例如他认为使物价恢复到十二月十三日以前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关于报刊的报道，他说："肯定要改进这项工作，也要在党的、工会的和青年的组织中重新进行选举"，"我完全支持这点，但是这必须是真正民主的选举，选出的必须是真能代表职工利益和我们国家利益的同志"。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接着说，在我们祖国目前所处的情况下，每一个不慎的步子只能有利于那些使国家变成目前这个样子的人。这个影射是容易看出来的。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开过之后的最初几周里，那些在十二月二十日被从最高职位上撤下来的人仍然认为，在危机的一周中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认为新领导屈服于群众的压力是不对的，他们首先把群众看成是冒险分子，在带报复性的各种群众运动中照例会涌现出的无政府主义冒险分子。

盖莱克不仅呼吁人们理解当时国家所处的形势，也呼吁人们

---

* 一九七一年三月恢复了旧的价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以前的价格）。

要有耐心。他说："还必须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许多长年积累起来的问题，但这是个长期过程，因为长年积累起来的问题不可能在几周之内解决"。

在会见时，人们默哀一分钟以悼念十二月事件时在什切青牺牲的人。当盖莱克和他的同志们离开造船厂时，到会的工人用掌声欢送他们。《什切青之声报》在报道会见情况时，用了一个航海标题：《向着革新——全速前进》。该报写道，党和政府新领导的立场受到了"几乎一致的赞同"。

盖莱克从什切青到了格但斯克。一月二十五日在省人民代表会议的俱乐部里，盖莱克，雅罗谢维奇，巴比乌赫和什拉赫齐茨会见了造船工业各企业及协作工厂的职工代表。

正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在那些日子里，格但斯克沿海地区的形势仍然是很不稳定的，有时出现短暂的停工，社会还不能摆脱十二月的感受。人们的意见一大堆，多多少少都有些道理。这些意见有针对中央和地方当局的，有对报刊的，有对工厂中党、工会和行政干部的，也有对民警和公安部门的。当时《海岸之声报》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让这封信来说明人们的思想状况吧："你们写道，在交谈时有些话说得很硬，而不是众口一致地重复那些口号式的提法。可是正是你们记者们（其中包括《海岸之声报》）很善于创造和宣传这些口号式的提法。最近《海岸之声报》改变了文章的调门，但这不能一下子也改变人们对报纸的态度和看法。还得写很多文章。肯定有东西可写。有成千个题目在等待勇敢的执笔人去写。只要那种对于自己国家的事情、事件和问题保持沉默的做法一旦结束，那大家都会感到满意的。每个人都希望了解清晰而实实在在的情况。你们讲新风格，那就让我们看看吧，这种新风格在报上到底是个啥样子"。

盖莱克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格但斯克之行也象去什切青一样，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会见持续了八个小时，有二十三个人在讨论中发了言。工人们批评的那些弊病和在什切青谈到的一模一样。压制批评，缺乏讨论，党的机关和组织那种官僚主义化了的工作方式，这些是发言的实质内容之一。有一位工人指出，党内"由工人担任的领导职务太少了"，"经过一、二届任期之后，由新人当选任职的也是凤毛麟角"。对工会活动的严厉评价是发言中的另一个内容。人们批评工会活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批评工会专职干部脱离会员群众。一个讨论者说："我们就拿十二月事件来说吧，在那些日子里，沿海地区的工会到哪儿去了？假如工会善于处理问题，假如它能使工人阶级反对日益恶化的经济条件的抗议具有一定的形式，那肯定不会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抗议的悲惨后果"。

如同在什切青那样，工人阶级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问题在发言中占了很多篇幅。工人们说，如果真要使工人感到他们也是企业的共同主人，那么只把决定通知工人而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不与他们磋商决定的实质内容，这显然是不够的。一位参加讨论的人说："二十五年来，我们重建并扩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原本指望，我们干得越快，我们获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越早，结果我们失望了。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使每天只有一碗菜汤喝，我们也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进行劳动；但我们希望得到保证，那就是这碗菜汤的分配将会是公平合理的"。

盖莱克在讲话中请求大家谅解有耐心。他指出，当时经济形势的特点就是缺少储备，从而无法取得资金来提高生活水平。他说："同志们，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们，情况是多么困难"。"你们把我们也当作人吧——也象帮助人那样来帮助

我们吧！我们需要的只是安定，劳动，理智和时间”。“请你们相信，我们都是用同样的泥土捏成的，除了在这里宣告的目的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目的。如果你们肯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就能够共同地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怎么样——你们肯帮忙吗？”回答是一片整齐的喊声：——我们帮忙！一九七一年最流行的口号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会见过程中，雅罗谢维奇总理也发了言，他回答了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什拉赫齐茨回答了与十二月抗议的悲惨经过有关的问题。根据《海岸之声报》一月二十七日的报道，什拉赫齐茨表示：“本来在十二月那些日子里可以避免使用武力，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目前应该尽一切力量使类似的事件永远不再重演。……民警机关如果老老实实地为人民、为工人阶级和国家服务，那它就应该受到好的对待。如果它在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之处，就应该克服。内务部机关将遵守法制，将秉公行事，也将无情地追查每一起犯罪和敌对活动”。

盖莱克及其同志在沿海地区的逗留对于国家七十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纲领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会见有几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沿海地区工人提出的意见、抱怨和要求，其中大部分是合理的，可以列一张很长的单子。这张单子说明，在十二月那些悲惨的日子里爆发出来的政治危机，范围极广。令人十分惋惜的是，那些在十二月二十日被撤销党的领导职务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活动家们没参加这些交谈。那些人在一月份和以后几个月中都曾认为，沿海地区的工人没有实质性的理由进行如此激烈的抗议。例如哥穆尔卡就曾表示，这个抗议之所以具有这样激烈的形式，只是因为人民波兰的工人不经过多少犹疑就罢工就上街了，因为这

是他们的国家，不言而喻，国家会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这种论点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十四年以前，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上，正象我们在前文提到的那样，哥穆尔卡对同样的问题却说过截然相反的话。

会见的过程表明，沿海地区的工人并不感到自己真的是领导阶级。会上就工人、党的机关、行政这三者间的关系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对工会、工资政策、福利政策以及劳动组织的尖锐批评也值得注意。说到底，没有一个社会生活领域是工人感到满意的。他们的批评有时感情激动，即便如此，到沿海地区来的领导人毕竟见到了工人阶级的真实态度，了解了工人的真正情绪。无疑，对盖莱克和他的同志们来说，在什切青和在格但斯克的对质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

什切青会见和格但斯克会见并没有结束沿海地区工人中的热烈讨论，但无疑大大减弱了盖莱克来到之前那里存在的紧张。人们不仅在沿海地区进行着活跃的讨论，全国各地各界都在谈论十二月事件，在探讨其原因，提出了许多建议与结论，其中有些是很极端的。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新领导在人们心中燃起了希望，它善于对付经济困难，但是革新的过程能否成功取决于新领导能否坚决彻底地从公众生活中清除一切使劳动人民气愤和妨碍他们积极性的东西。人们就体制的弊病进行议论和撰写文章。在这些讨论中也不缺乏消极低沉的调子，有些人不相信将来可以保证不会再出现可能导致类似十二月事件的做法。

在这段期间，周刊也参加了全民的讨论。作家、党的活动家、《文学生活》主编马海耶克在该刊一月二十四日那一期发表文章，题为《造反，什么样的造反？拥护社会主义的造反》。各

界对这篇文章评论甚多。马海耶克以他著名的、独特的写作风格写道，“怎么做才能抑止无冕的帝王们的成长呢？人人都只会对下面讲话，训斥……人们在创造某种制度。我们熟悉这个特定的制度——一切都引向教条主义。民主集中制是个好东西，但是让我们记住，我们经历了不同类型的民主集中制”。他承认，“我们做了许许多多好事，但错就错在我们认为对这个事业只能称赞，既不需要改进，也不需要完善了。这样的说法曾经被系统地揭穿过”。谈到工会问题时他表示，希望“工会的领导不会再让别人把自己当作小丑，不会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关于不合理的特权和达官显贵，他也写了不少看法。他大声疾呼，“我们到底有谁晓得那些经理和主席们挣多少钱？他们挣得很多，事事都分红，事事拿奖金，连撒谎也有奖金。什么别墅呵，汽车呵，用高级轿车送孩子到邻县教堂领受圣餐呵，干这些的都是有党证的同志们”。

在评价沿海地区工人的态度时，马海耶克表现出了特有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工人的行为没有政治性（？！），另一方面他又证明，这是对日益脱离劳动人民的管理制度的抗议。大概马海耶克是唯一一个在波兰报刊上重提一九六八年三月事件的人。他写道，当时“对党机关的某些环节进行了清洗，但不彻底。这些不彻底的变动也是那些决定一切事情的人被迫作出的。对那些在三月事件中为维护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原则、为维护共产主义的未来而起过积极作用的同志们，他们的态度是不积极的。”

拉科夫斯基在题为《反对顺从的哲学》一文中（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政治周刊》）号召要有耐心。他写道：“面对着沿海地区发生的悲剧，有些读者要求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马上进行突然的、最大限度的改变。可是，在波兰目前的社会和政治条件

下，只有逐步发展才是唯一现实的”。

《法律与生活》周刊主编康科尔在题为《前景》的文章中（该刊一九七一年一月十日，第一期）这样写道：“看来有许多人并没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得出任何结论……从编辑工作的实践中，我看到官僚主义的愚昧可以变得多么自信，它能以多么自满的态度极力将自己那些老掉牙的想法强加给别人……从报刊的文章中我看到，粗制滥造、公式化、拍拍肩膀的作风在有些杂志或广播节目中仍然在炫耀自己的胜利……”。康科尔认为，“社会生活的实践证明，缺乏轮换（在规定的任期期满后，自动无条件的轮换）或不做人事结论……这肯定不利于加强民主”。他对干部政策表示抗议，并为那几个人离开领导岗位已经晚了“好几年”而感到遗憾。谈及政权的作用时，康科尔证明，由民主主义退化而成的民主集中制变成了假民主主义，“它瘦弱，憔悴，多病……”。至于“我们面前的前景，就是要从所实行的社会秩序的名称是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出一切结论”。

维尔海尔米在《文化》周刊（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第一期）上表示了最低限度的愿望。“今天所共同经历的不幸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或早或晚必然会出现集聚已久的因期待而厌倦、因要求而急躁的情绪。唯有进步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才能使集体的精神不会涣散，而且变得更坚强更具有抵抗力，哪怕是点滴的微小的进步，但必须是彻底的，一个一个的，使人能感觉到的进步，而不是统计表上或报告中的进步”。

《人民论坛报》在一篇编辑部评论中写道：“让我们坦率地说，我们生活得不是很好，甚至还不能算好”。在另一篇评论中写道，革新就在于要调整那些“违背社会主义理想，不适合现实情况，造成经济紧张和社会冲突的原则”……对于政府和各级党

机关之间的关系，报纸也提出了批评意见。在《华沙生活报》上，斯切潘斯基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波兰人问题续篇》，他认为必须计算一下我们的可能性，“想办法调动和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可能性，要指出现实的，每个家庭和每个公民都可以达到的通向进步的道路”。

整个一九七一年，在报刊、广播和电视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全民性的讨论，上面几点就是讨论中的先声。

重要而仓促的最初几个决定

从一月份的头几天起，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和政府就开始显示出非凡的积极性。举行会见，召开会议，几乎每天都作出具有全国意义的决定。

一月五日，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乘飞机去莫斯科，与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会谈。公报称，会见“在真挚友谊和兄弟般相互谅解的气氛中”进行。一月十一日，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去柏林访问，与乌布利希，斯托夫和昂纳克进行会谈。

一月上旬，各个省都举行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就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以前党的工作作风问题谈得很多。泰赫马在热舒夫的会议上说，“由于缺乏明确的使人充满信心的前景和今后的计划”，因此在这段期间“社会活力没有调动起来”。在与华沙省党的积极分子会见时，巴比乌赫认为，各级党的机关和组织在作出决定时，必须严格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华沙省委第一书记肯帕表示，迄今关于经济问题的很多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应该正确地、理智地加以实现。他还说，十二月那些困难的日子证实，华沙党组织与首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保持着良好的联系。

一月八日，政府主席团会议就新的投资项目作了决定，其中

包括着手修建“波莫沙尼”铅锌矿和在希维诺乌希切修建冷藏鱼库。一月上半月，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致信各企业的工人自治代表会议主席和总经理，这封信注意到工人阶级生活福利情况与生产问题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考虑了当时工人在集会上提出的批评。中央书记处断定，这许多意见都涉及到职工的劳动条件。要满足这许多正当的要求，要花很大一笔经费，但是其中好些问题不要多少资金也可以得到解决。信里还提到必须公平分配用于奖金、奖励和福利事业的钱，必须加强监督厂方遵守安全和劳动条件方面的各种规定。中央书记处还提到，必须不断改善为生产车间和辅助车间配备的必要的福利设施，诸如存衣处，淋浴装置，饭厅等。在讨论中央书记处这封信的过程中，在党中央领导提及的领域里揭露出了一些怵目惊心的不关心人的事例。例如在圣十字奥斯特洛维兹的耐火材料工厂，建造福利用房竟拖了十年之久；拥有一万一千名职工的“诺沃特科”炼钢厂居然没有自己的职工食堂；在新塔尔格的“波德哈莱”制革厂，厂方取消了大部分福利用房，把这些房子当仓库使用。

紧接中央书记处的信之后，报纸报道了部长会议主席就个人领导和责任问题致各部长、联合公司经理和企业经理的信。总理指出，并非处处都正确地执行了个人领导原则。他提醒大家注意，最近几周中发生的事情说明，在执行政府的重要决议和指令方面，部分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采取了消极态度，他们容忍劳动纪律松弛和违背规章制度的现象，不采取坚决的行动以保证厂里劳动的正常进行。

从国家利益的观点看，总理的呼吁和警告是完全有道理的。十二月事件打乱了国家的正常劳动节奏，在这期间许多工厂没有完成计划，用于讨论和开会的时间过多。总理的信企图改变这种不

利的形势，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厂方之所以不能尽到自己职责的全部原因。不应忘记，这个时期是工人非常尖锐地批评厂方的时期。工人认为，厂领导是限制工人权利、甚至是靠牺牲工人而生存的那股力量。要使工厂的情况真正改善，首先就要取消那些引起工人对厂方极其不满的做法。总理的信是在盖莱克及其同志们去沿海地区的前几天公布的。正如我在前一章所写的那样，造船工人在交谈中表露出了对厂方的深深不满。正是这种不满，使得工厂的领导瘫痪了。

波通社记者报道，盖莱克在会见“采矿工人、炼钢工人和造船工人之后”，于一月二十日在党中央会见了创作界代表。会见时，党中央第一书记告诉大家，“关于华沙市政当局和各界代表建议重建华沙王宫”一事，政治局抱“积极态度”。创作界的代表们极其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决定。《人民论坛报》评论指出，这是此次会见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感人肺腑的倡议是关怀民族进步传统的证明”。

《人民论坛报》的上述评论写道，过去缺乏这种会见，缺乏这种气氛，缺乏这种交谈，借用著名的法律术语来说，就是缺乏建立在“善意推测”原则上的这种交谈。在会见时，盖莱克向创作界人士说：“我们想把你们的问题留给你们自己去解决。党将确定文化政策的主要方向”。

重建被希特勒分子完全破坏了的华沙王宫有它自己的历史。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在立宪议会第六十七次会议上，第一次作出了必须重建王宫的决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计划在一九五四年建成。但是这个决议没有付诸实行，其原因不仅仅是缺乏资金。对于重建王宫，既有众多的拥护者，又有众多的反对者。这些年来数度出现重建王宫的呼声，最近一次是在人民波兰成立二

十五周年时。

几天之后，一月二十六日在华沙成立了重建王宫公民委员会，由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兰统一工人党华沙省委第一书记肯帕牵头。他讲话说："当我们在古老的城墙旁使王宫耸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伟大象征将重新复活，这是独立的民族持续存在的象征，是我们最重要又最悲惨的历史篇章的证人"。委员会向居住在国内外的波兰男女发出号召，号召他们"都来参加这项伟大的事业"。号召的结束语是："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历史风暴，我们独立国家的纪念碑——王宫，将重新屹立在维斯瓦河峻峭的岸边"。

关于重建王宫的决定无疑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是想把全社会团结在具有民族性质的目的的周围。

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一月底在华沙又出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教育和高教部长下令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起草关于波兰教育状况及其结论的报告，由世界著名学者斯切潘斯基教授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从组织、教学、教育等方面评价教育制度的功能，评价教育机构在整个波兰社会中活动的效果"。

成立专家委员会在战后波兰历史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它表明国家的新的政治领导致力于波兰的现代化，致力于加速波兰的发展，因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将取决于培养教育青年的制度是否卓有成效。

二月来临了。

痛苦的清算和活动纲领

二月六日，在党中央大厦六楼会议室开始举行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第二天夜晚会议结束。会议的议题是：十二月事件的评价，党在当前的任务和组织问题。在讨论中有四十人发言，五十四人书面发言。讨论结束后，盖莱克发表了纲领性的讲话。

全会参加者收到了由七中全会成立的特别委员会起草的题为《十二月事件的评价及其结论》（下简称为《评价》）的文件。希德拉克主持讨论，并对《评价》作了阐述。他说，文件中指出的真理是"痛苦而复杂的"，但是，"我们的立场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通过充分地指明党内生活出现歪曲的真实原因，只有不加任何粉饰和不作任何回避，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成功的希望，并开始从事改变坏事的努力——首先是创造出不使类似的错误再次重演的条件。"希德拉克指出，现在全国人民和全体工人阶级正在期待中央委员会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工人阶级正在注视我们，他们不仅满怀信任和希望，而且带着批判的目光注视我们，并对业已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在暴露坏事的原因和对未来进行分析的时候，"要记住发生了的一切，要对过去作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清算，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思考未来，思考这样的活动纲领，它将会消除业已暴露出来的

一切歪曲，并将最好地最充分地促进我国人民创造力的解放。”

希德拉克承认，党对业已发生的“把我国引向公开危机的”一切事件的责任问题是无比重要的问题。他解释说，他首先想到的是前领导一些成员的个人责任问题，因为他们的行动造成了党内生活的歪曲，并导致危机。（在讨论过程中，异常广泛地谈论了责任问题，也没有把它局限在前领导几个成员的范围之内。）希德拉克还指出，由于领导中心——他指的是哥穆尔卡及其周围的几个人——的过错，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被贬低了。八中全会应尽一切努力“恢复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集体领导和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中心环节的应有的作用。”

希德拉克说，在这次全会上必须使“全党意识到，导致十二月悲剧的因果链条是怎样产生的，是由什么进行连结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对未来得出正确的结论。“对于我们党来说，思考和活动的整个过程的基点，应该是既不美化也不丑化的事实真相，应该是不以任何主观臆想而剪裁的事实真相。”

提交给全会参加者的《评价》包含下列一些章节：（一）十二月事件的经过和评价，（二）危机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三）政治结论，（四）经济形势和最紧迫的经济任务。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已经谈过了事件的经过。关于事件的评价，特别委员会认为，工人阶级对党和政府的基本决定的抗议是事件的根源。食品提价是事件的导火线。但是，这次抗议采取了如此激烈的形式，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着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例如，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严重忽视社会福利政策，实际工资停滞，供应困难，生活费用上涨等等。

就其本质来说，沿海地区的行动是工人性质的，这并不意味

着要缩小非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所起的作用。正象《评价》的作者们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派生的潮流”，同工人的抗议相比，是第二位的，但在情绪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它影响了一部分青年工人的态度，对社会治安构成了致命的危险，这种情况不只是在沿海地区。随着街头闹事的延续和扩展，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有利于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反动势力进行积极活动的条件。但是，应该补充一点，即在沿海地区出现的口号和传单中占绝对优势的是经济——社会要求和人事——政治要求。《评价》没列举这些具体的口号和要求，可是大家都知道，在危急的一周内一开头就提出了要哥穆尔卡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的要求。本书作者不掌握可资说明哥穆尔卡本人也了解这些要求的证据。《评价》指出，不论是地方当局还是派往沿海地区的党的领导成员“没有充分利用同工人们建立直接接触的可能性，而工人们却一再地同街头闹事者划开界线，在工厂范围内以占领罢工的形式继续自己的抗议。”

十二月危机的根源十分深刻，用医生的话说，这是广泛性的心脏梗塞，尽管如此，假如哥穆尔卡及其亲密的同事在危机开始时不采纳关于工人行动具有反革命性质的论断，那末不排除事件的进程会更缓和一些。《评价》说，“在中央第一书记作出个人的决定时，一开始他就对沿海事件采取了错误的立场。他不召开政治局会议来研究这一事件。截至十九日为止，宣传活动的路线是由中央第一书记以及雅什楚克和克利什科同志确定的。这条路线轻视现实，抛弃一切有关沿海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的经济决策同工人阶级的立场之间发生矛盾的思想，也不认为有关党组织对政治局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信件持否定态度的许多信号是可能爆发尖锐的政治和社会冲突的一个严重的警告，并对党

的会议的过程，对党员、党的积极分子和地方党机关的不安情绪采取了轻视的态度，置之不理。”

哥穆尔卡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显示出来的领导国家的工作作风绝不是突然之间一日之内形成的。这是多年以来的产物，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毫无疑问，哥穆尔卡是这样一种类型的领导人，他擅于要求人们从属于他自己，并强加自己的意见于他人。他无限忠于思想，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人说他的统治作风容不得不同意见，他会感到这是令人惊奇的。特别是在他担任第一书记的年代里，他的工作作风造成了一种不能对领导人进行任何严肃一点的批评的气氛，但这不等于说在中央全会上从未有过批评性的发言。当然，有过批评性的发言，可是发言者必须事先考虑到他将被列入充满原则性的总结中，因为第一书记全神贯注地倾听讨论，并亲自起草自己的总结发言（在七十年代盖莱克的讨论总结则是事先写好的）。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哥穆尔卡从不轻率地作出人事上的结论，甚至对那些不顺从他的人也是如此。我认为这些事实并不损害上述评价中所说的哥穆尔卡工作作风及其个人特点的正确性。可以设想，这样的评价可能引起哥穆尔卡的反对。这将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一种反响。没有对领导中心的工作方法和作风的充分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就不能正确地实现伟大的社会目的。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只是在危机的形势中才摆在光天化日之下。

对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中的专断作风应负的责任，假如都加在一个人身上，加在哥穆尔卡身上，那是极不公正的。但是，抛开最亲密的同事应负的共同责任不谈，应该注意一个事实，即在共产主义政党的整个结构中，特别是在执政党的结构中，第一书记处于

客观上赋于极其广泛权限的地位。他掌握着极大的权力，正因为如此，真正的、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的、不允许滥用党的权力的监督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就是这种机制。可是事实上这种机制无论在十二月事件前，还是在十二月事件进程中，根本没起作用。

《评价》的作者指出，“在危急的日子里，一切论断都是由哥穆尔卡同志提出的，没经过集体讨论，也不受集体监督。这些论断的思路是：开始，只在非社会分子和敌对分子的活动中寻找挑起工人行动的势力；尔后，随着罢工和闹事规模的扩大，给这些行动定了反革命的性质。对波兰人的命运在历史哲学上的悲观看法是这种态度的表现。根据这个看法，我国的统治阶级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的国家引向灭亡。贵族的无政府主义导致第一共和国的衰落，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和盲目反苏造成第二共和国的失败，现在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将会搞垮人民波兰。”这是个独创的论断，但对人民波兰的命运来说，又肯定是一个不正确的论断。不是一九五六年表现了政治上成熟性的工人阶级，而是政治——社会政策给波兰国家的稳固打上了问号，这个政策忽视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压抑人民正当的壮志和雄心，作为领导人哥穆尔卡的悲剧似乎就在于他不理解这一点。

对波兰工人阶级的极端悲观主义的论断（所幸，沿海地区的工人们当时还不知道它）打开了通向镇压的道路。《评价》说，“这个论断实际上论证了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是控制局势的唯一手段，同时还规定了宣传路线，试图证明关于对物质状况不满的论点是同真实情况和社会感觉格格不入的。强调使用武力，包括使用武器，是这种立场的直接的主要的表现。”《评价》还注意一个事实，即几个指挥中心的活动使沿海地区的形势复杂化了，在

实践中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决定。由于这种情况致使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四）在格丹尼亚动用了武器。克利什科执行了哥穆尔卡的路线，他认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强调使用最严厉的镇压和治安手段，并在第一天就向格但斯克调来了军队。但是，武装干涉并未达到更加灾难性的规模，只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使用了武器，对此应该感谢中央和地方负责民警和人民军队活动的集体，他们采取了温和和审慎的态度。使用武器，这对参与这一行动的波兰人民军战士和执勤民警来说则是一场极大的悲剧。在人民波兰的历史上，他们是第二次被用来镇压工人的抗议。这是不能不留下痕迹的经历。

《评价》的作者还阐明了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更迭的情况。十二月十九日哥穆尔卡患病，在这一天，在危急的一周内第一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但是，不是病患，而是“最严重的政治上的必要性”使七中全会作出了解除哥穆尔卡职务的决定。这次全会作出的人事变动的结果，使得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更新，这有利于摆脱政治危机，修正政策中的错误，改变党的领导作风和方法。”显然，修正错误是必要的，因为沿海事件“是党，特别是党的中央机关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遭到削弱的长期发展过程的顶峰”。

在《评价》的关于危机的社会和政治背景部分中，作者指出，十二月事件证明，党同劳动群众的联系，特别是同工人阶级的联系一旦遭到破坏，就可能“在我国导致严重的政治动荡”。党应该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将来必须致力于防止同社会的冲突，必须“开动可靠的能预告冲突形势的体系，并创建出在我国社会机构和组织范围内消除冲突形势的条件。”

在描绘波兰社会的特征时应该肯定地说，尽管波兰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形形色色的、时而相互矛盾的倾向的影响，但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建筑在战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业已实现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具有压倒的优势。当然，这不等于说党可以忽视那些同社会主义思想相矛盾的或相对立的倾向在社会上对社会主义态度的形成过程“仍然具有的实质性的影响”。这些倾向的代表者首先就是“思想游移不定的”小市民的自发势力，他们的特点是“摇摆性，易受无政府主义的感染以及对资本主义的蒙昧无知的迷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意识的每一种表现形态和政治关系的力量对比，在决定性的程度上是依“我们党政策的正确性”为转移的。当党的政策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时候，社会上就形成一种顺利向前的感觉，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建设性的倾向对人们的态度产生出压倒优势的影响。而当党的政策与这种感觉相抵触的时候，就会出现怀疑和冷漠，“进一步发展下去，就会为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提供用武之地。这些反社会主义势力在思想和宣传上得到了思想颠覆中心的支持。”

那末，在沿海事件爆发前党的政策是什么样子呢？《评价》的作者回答如下：“一方面，在政策上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通过党而组织起来的人民在生产和社会方面的努力并未白费”，但是，与此同时“人民在发展经济方面所作的努力与一般劳动者在获得这一努力的成果方面感到的不足，这两者之间的分野”一年比一年地扩大了。工人阶级和某些知识分子强烈地感觉到增长缓慢的物质后果，强烈地感觉到在一些职业中实际工资水平停滞和国家逐步限制社会福利的物质后果。同时，看不见光明的前途，缺少完整的富有逻辑性和预见具体成果的发展主张，也对社会意识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人们更加确信，国家的发展慢于可能有的

和应该有的发展，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缺少一种对需要的感觉，也不理解现代发展的规律。

社会意识中的消极现象，首先表现为工人阶级中紧张情绪的加剧，使得党队伍内部，特别在积极分子中间产生了不安和怀疑。这些消极现象之所以不能揭示出来，是因为“党内对党的政策同群众之间的联系遭到破坏的表现没有进行公开、严肃和深入讨论的气氛。”中央第一书记和党的领导不仅没意识到这种不利的过程的实质和根源，而且更有甚者，他们根本否认其存在，并把有关群众情绪低落的每一个信号都看作是无病呻吟的表现，从而逐步地堵塞了批评性的、与实际相符合的情报的渠道。这种做法“为反动势力的积极活动，为他们试图在非无产阶级阶层中进行的思想渗透提供了方便的条件。代表着形形色色反动倾向的各种势力，一九六八年在修正主义思想旗帜下，要把波兰推向自由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斜路上去的尝试就具有这样的性质。”《评价》的作者认为，一九六八年后信任危机在几个方面笼罩着党内关系：党员基本群众一方面承受着日益恶化了的社会情绪的压力，一方面承受着领导机关的政治决策——对其正确性并不完全相信的政治决策的压力，他们丧失了保持思想攻势的必要的论据。信任危机也日益扩大了党的积极分子和党的机构同领导之间的裂痕。围绕着党的中央机关而集聚起来的多方面的信任危机，是“人民波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达到的现代生产力和文明水平，同不适应国家目前阶段发展水平和需要的领导方法之间，发生了深刻矛盾的最本质的表现之一。”恰恰是这个不合时宜的同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领导方法是最近几年政策错误的主要原因。

在我们的时代，管理和领导方法对生产过程，对全民的生产组织，越来越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首先，在中央第一书记的作风的影响下”，现代组织的管理原则和决策原则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在作出有关经济和政治决策之前，一般的情况是，从不进行严肃的科学分析，很少倾听或只是浮光掠影地听听专家的看法，既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也不征求工人阶级的意见。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是根据不完整的带有偶然性的情报作出的，是直观地唯意志论地作出的，是只根据自己的感觉和“多年以前的老经验”作出的。这句话是影射哥穆尔卡，他在决定问题时，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居民生活条件的问题，他总是愿意强调自己在两次大战之间那个时期的经验。

《评价》中指出的党的领导中心——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存在的情况是特别有趣的段落。《评价》的作者说，在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中，破坏列宁主义的准则是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作风一年比一年差的根本原因。五十年代后期，政治局经常召开会议；六十年代后五年，政治局会议越来越少。最近几年，政治局一年只开几次会，中央书记处几乎是根本不开会。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讨论问题和交换观点的可能性几乎是完全消失了。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决定是在第一书记的意见事实上拍板定案的情况下通过转圈子的方式作出的。在政治局内部有一个狭小的“由第一书记赏识的人组成的小团团，形成所谓的核心领导，控制着实权，不容纳批评，不容纳与自己看法不同的倡议。这个非正式的机构在政治上控制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其中克利什科掌管干部政策和思想生活，雅什楚克掌管整个经济政策，他们“这些同志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左右第一书记的看法。他们提出甚至积极坚持一些错误的主张，并抵制一切批评这些主张的意见。”个人决定一切，对经济部门的具体事务的繁琐干预，以及对政府机关的包办代替，成为党的中心中的领导实践的特点。这个狭小

的领导团团还“有意识地系统地破坏政府的威信。总的看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作风不符合时代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是，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要有新鲜的主张，自由的讨论，创造性的和理智的气氛，以及有利于作出集体决策的条件。第一书记及其最亲密的同事的工作作风同这种需要处在明显的矛盾之中。”

《评价》还涉及到歪曲的责任问题，歪曲的结果导致了流血。《评价》说，“对未能防止第一书记的独断专行和违背列宁主义准则的领导方法的逐步发展，我们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应在不同的程度上负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在中央委员会中有一种随声附合小团团领导方法的不健康的气氛，同时还有一种涣散中央委员的积极性的信念，即认为对消极现象你反对也是没用的。担心有人讲派别活动。另外，关心党的团结，也促进了这种气氛的形成。这就降低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的实际作用，就更难于对形势进行深入的讨论，更难于采取防止形势恶化的措施。”

《评价》中的许多正确的提法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文件对折磨党的病症的描述是十分大胆的。

作为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国内和党内形势的政治结论，《评价》的作者列出了以下十五点，这可以看作是党在七十年代政治纲领的雏形。

第一点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方法的歪曲，特别是在经济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方面的领导方法的歪曲，是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相矛盾的。在批判这种歪曲的时候，应坚定不移地指出，造成歪曲的根源，既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也不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它不是人民国家中党的领导作用的后果。”这里的

后一个论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在全党、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注视之下，还能够发生党的领导人以及领导成员中的二三人事实上不受监督的事情，几年以来他们还能够专断地以违背集体主义精神的方式作出决定，那末就应该对现行的组织原则的有效性提出疑义。

结论的第二点指出，“加强党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联系是当前党的基本任务。”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法是，要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恢复工人阶级在物质和社会生活方面应有的地位和扩大工人活动家参与党和国家各级机构的工作。

第三点强调了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特别意义，认为首先要在党内创造出自由交换观点看法的条件，保证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情报流通，这里“从下到上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第四点强调，人民国家——“就其社会本质来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加强，要求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同工人阶级和其他有关的社会阶层就经济和社会重要的决定草案进行磋商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保障。同时，也要为扩大议会和人民代表会议对政府和地方政权机关的工作的监督创造条件。

《评价》的作者在第五点中指出，在党的诸多的基本任务中，“在当前形势下，要使所有党员具有正确的进攻性的政治思想态度是特别重要的。”党必须考虑到，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同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和阶级对峙的进一步尖锐化。“在我们正在经历的政治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原则性永远是党对工人阶级承担的重要义务，这在政治转折和社会积极性高涨时期尤为重要。

在第六点中《评价》的作者就责任问题发表了意见。他们认为，对领导方法歪曲的责任不应由全党来承担，“尽管全党必须

挑起重担”以克服歪曲的社会后果。同样，片面地一股脑地要整个中央一级的积极分子和党中央机构的全体成员来承担领导方法歪曲的责任也是根据不足的。《评价》指出，“不能因为对党的领导表现了顺从，特别是不能因为八中全会前纪律严明地执行了党的决议（那怕决议的某些方面引起了怀疑），而对任何一个党员提出指责。”在为时两天的讨论中，曾经多次谈到全党对党领导人奉行的政治路线的责任问题，同《评价》作者提出的看法也不尽一致。顺从问题的概念可以当作一个讨论性的问题。顺从的界限在哪里？党的积极分子和普通党员是否有义务顺从地执行中央权力中心的决定，甚至深知这些决定有错误时也是如此？要知道，政党不是军队！在十二月事件前的一段时期，中央和地方的许多活动家充分地意识到经济政策在许多情况下是错误的，一些重要决策具有唯意志论的性质。不仅如此，他们还意识到这一政策正在削弱群众对党的信任，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尽管他们了解情况，尽管他们对未来忧心重重，他们还是执行了那些未经深思熟虑的同社会期待相矛盾的决定。因此，可以提出一个关于干部和一般党员的顺从界限问题。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看这个具有道义和政治性质的问题，就是说要保证党内有这样一种机制，使党员有可能在党纲的范围内对上级机构的决定提出保留意见。

《评价》的作者正面地肯定了积极分子的政治态度，指出，“党的积极分子很好地经受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的政治考验，是他们第一个面对着过去的痛苦真相，第一个承受了关于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批评意见。他们众口同声团结一致地支持党领导的变动，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的决定。”

第七点提出的要求是，必须恢复和严格履行中央委员会在两

次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党的最高机构的党章规定的职权，即中央委员会“唯一有权确定党的政治方向和监督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活动。”

结论的第八点指出，极其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党的最高机构和政府之间的正确关系。党的领导首先应该为政府的政策指明主要的社会经济目标，并规定出可供支配的手段，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期限。政治局和政府领导最重要的“最困难的任务，是分清轻重缓急，指明现实可行的经济目标。”当然，还要广泛地听取专家们的意见。

第九点，根据社会上的要求，表示了要扩大和改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报范围的意愿。党和国家当局的工作通报，在方法上要摈弃那种装点门面的和枯燥无味的公式。《评价》说，“我们希望报纸、广播和电视在提出社会倡议和进行批评方面要比现在起着不可比拟的更大的作用。”

第十点指出，必须扩大和完善工会在我国社会体制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工会活动中，要在组织工厂职工积极完成生产任务与关心劳动人民生活福利两者之间恢复正确的比例关系，”此外，工会的特别重要的任务应该是防止对集体生活、劳动法以及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定义务的一切破坏。

第十一点提到科学的日益增长的作用，指出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同科学界磋商，保证波兰科学在各个关键部门开展积极活动的必要条件。至于说党的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实践已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第十二点宣称，党将继续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同人民统一阵线中的各个组织和团体进行密切的合作。同时还谈到国家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评价》的作者断言，“对于国

家和人民来说，国家和教会关系充分而持久的正常化是可能的。从各方面看这也是有益的。但是，这种正常化的条件是主教团要顺从地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持久的事实”。

第十三点提出，青年一代的问题，青年们的前途和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是需要全面加以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现实是，出现了一代在人民波兰出生并在人民波兰受到培养和教育的新人。但青年运动形势是十分令人不安的，对整个青年问题必须进行深刻的分析。前领导的错误“特别”加剧青年问题和青年运动的局势。《评价》说，同加强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一道，党在青年中的工作必须摆在“最突出的位置上。”

第十四点的提法实质上应成为《评价》的政治结论这一部分的开篇。其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景象，只有把它译成二十世纪后半期波兰实际生活的现实语言时，才能成为有效的指路明灯。“因此，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要制定一个超过最近的五年计划界限的国家发展的远景规划。这个远景必须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大胆的，并能给我国开辟出新的天地。”

最后，第十五点是对外交政策的评价。它指出，最近几年党在一切基本问题上继续执行了正确的外交政策。这里特别强调了与苏联同盟对波兰的意义，“历史充分肯定了这一同盟的价值。这一同盟符合两国最切身的利益。我们党将象保护眼睛那样保护这一价值。”

《评价》的作者在政治结论这部分的末尾表示，这些还不能穷尽党所面临的全部任务。许多问题还不能立即予以解决，许多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讨论和细致地思考。其中许多问题的解决还要求现在必须创造出可观的物质手段，而“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不是轻而易举的，甚至在短时期内也是不可能的。”

《评价》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经济形势并列举了最紧迫的经济任务。一开头它追述了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期间，国民收入增长百分之三十四左右，投资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外贸增长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在此期间有许多工业企业建成和投产，为一百五十万人提供了劳动岗位，扩建了燃料、动力和原料基地，数目可观的新产品投入生产。可见，进步是明显的。尽管如此，“社会仍然对国家的经济形势不满。”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评价》的作者提出了问题，并作了回答：“第一，这种进步并没有带来劳动群众在物质状况方面的明显的可感觉的改善。比较起来看，生产的增长很快，但消费的增长显然是缓慢的。……第二，人们对形势的评价，与其说是根据统计材料，不如说首先是根据日常生活中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观察。”

《评价》的作者在探讨经济形势紧张和劳动群众不满的原因时，提到了六十年代波兰经济发展的基本数字。首先是发展速度，在整个十年内（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〇年）是“相当快的。”其次是投资的规模，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期间年投资速度从百分之七增加到百分之八点五。而整个十年的投资速度要比苏联、捷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更快。就是说，波兰把相当数量的不断增加的资金用于投资，这种努力尽管带来了很大的成就，“可是效益不佳，同已取得的生产效果相比，造成了过重的社会负担。投资的方向未能保证经济的和谐发展，明显地损害了消费领域。”由于投资政策中的错误和把国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积累，使得波兰处于消费增长最慢的国家的行列之中。在满足劳动人民物质需要方面取得的进展太慢了。据统计总局的资料，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实际工资增长百分之十，平均每年增长不足百分之二。在五年内实际工资平均增长百分之十的情况下，某些部门的

实际工资增长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而另一些部门只增长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甚至有些工种的实际工资还下降了。《评价》提到，一九六六年七月规定的最低工资为八百五十兹罗提，一直到一九七〇年底也未改变。

《评价》的作者指出，虽然有了顺利的数量结果，但质量的变化跟不上来，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的进步以及成本的降低跟不上来，生产指导也跟不上购买者变化了的需要。已创建的生产潜力未能充分利用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发展缺少一个明确的长期的远景纲领——建筑在技术和经济深刻分析的基础上的和建筑在科学的长期规划的基础上的远景纲领。”与此同时，在当前的政策中，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行业在看法和估计上变化不定。在工业发展的主张中，不能适当地考虑保持第一和第二两大部类之间，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的必要性。《评价》的作者未列举数字来进行说明，但从对生产日用品的工业状况所作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第二部类受到了明显的忽视。

至于农业，“确实在最近二年内由于不利的气候条件造成了农业的生产下降，”但错误在于未能在适当的时候作出足以提高生猪饲养者生产积极性的决定。《评价》说，一九七〇年在粮食生产下降的情况下，减少了精饲料的供应，这必然对畜牧业造成更为不利的影响。《评价》说，“上述经济政策中的错误是一种认识的表现，即认为摆脱当前形势中的困难和为新的五年计划打好基础的唯一出路，就是要限制居民收入的增长，限制用于社会福利的费用。这种政策还应在整个五年计划时期贯彻执行。”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实施的零售价格改革符合这一主张。改变消费结构是零售价格改革的目的，但“事实上在缺少相应的补贴的情况下造成了实际收入的降低，尤其是最低收入者家庭的实际收入

的降低。”

限制消费的政策，在新的物质鼓励制度中得到了表现，这个新制度尽管“有某些正确的思想”，是要在很大的程度上抑止工资的增长，限制住宅建设。限制消费的政策还在“经济政策的许多其他设想和实际决定中”得到了表现。

《评价》的作者还认为，在评价经济政策中的错误和经济政策中的不彻底性时，不能对计委工作中的“由于党中央书记雅什楚克同志强加的指令而造成的”严重歪曲视而不见。不管在整体问题上还是具体问题上，雅什楚克绕过政府，直接给计委下达指令，这不仅对计划工作而且对政府工作造成了消极的后果。

研究《评价》的经济部分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同政治部分比较，对六十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比较表面化。实际上它是政策的描述，而不是对那些年代经济主张藉以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刻的分析。也可以用当时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来解释这种表面化。在十二月事件过后的头几个月中，领导干部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形势的政治方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经济问题。还应补充一点，《评价》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以后几年不再提了。《评价》的作者指出，“在我们的时代，管理和领导方法对生产过程和全民的生产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具有实质的意义。在物质生产装备和劳动者技术熟练程度中表现出来的生产力水平同陈旧的领导和管理方法之间的矛盾，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特殊表现之一，不及时解决这一矛盾，必然要导致危机和社会紧张。”

关于经济政策的近期和长期目标，《评价》归纳为十点，留待介绍盖莱克讲话时再说。

*　　　　*　　　　*

自八中全会以来已经过去八年了。七十年代末期的波兰从许多方面看已与一九七一年二月完全不同了。一九七一年二月，人们在中央委员会大厦里反复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深刻和如此危险的政治冲突，导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出现了鸿沟——这在人民波兰的历史上已经是第二次了。八中全会为时两天的讨论说明了许多问题。一九七一年六月初出版发行的《新路》专刊几乎囊括了讨论的全部过程，它是人民波兰最有意义和最吸引人的文件之一。我们说"几乎"，是因为在两天会议的最后部分宣读了哥穆尔卡的信，此后又进行了短时间的讨论。党的领导认为这是讨论中的秘密。至于在《新路》专刊登载的发言，其中有些也已经过作者和编辑的润色。

两天的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些问题是次要的，附带的，而另一些问题，从社会主义政权的职能方面看，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抓住讨论中的这些问题吧，尽管过去了多年，这些问题还是值得现代编年史家加以注意的。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讨论的参加者是怎样评价波兰在十二月事件前夕和危急的一周期间的政治形势的。看法是各种各样的。

卡尔科什卡指出，众所周知，我们今天所说的危机遍及全国。肯帕认为，波兰国家正处于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他说："由于与沿海地区相同或极其类似的问题而引起的深刻不满和坚决抗议也出现在国内其他地区，其中包括华沙。然而抗议的表现形式不同，表面上不太尖锐。"但是，华沙党组织在"十二月困难的日子里经受了考验——我和华沙市委都是这样看的。"中央委员、索斯诺维茨"米洛维采"矿的矿工卡明查克对十二月事件前

夕形势的特点作了如下的刻画："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消极被动和半瘫痪状况在不断加剧，变相涨价，改换包装或品名同时提高价格，引起了社会的不安。家庭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停滞，在一些家庭中甚至下降。不安情绪在增长，缺乏信任在加深。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改善，今后也看不到任何前途，尽管我们事先在讲台上讲过和听说过什么'过渡性困难'……形势明显地表明政权无所作为。社会上的信任危机加深了。"这位矿工认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政治局的一封信葬送了对"前领导集团"的最后一点信任，他说。沿海地区所发生的事也可能在别的地方出现，"在整个波兰都可能出现悲剧。"中央委员、克拉科夫省委第一书记多马加瓦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卡明查克接着说，十二月事件不是反革命，"不是象一些人竭力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这是工人阶级对僵化了的，脱离生活的中央领导的抗议"。中央委员、奥尔什汀省委第一书记比亚乌科夫斯基谈到，在十二月份以前那个时期不存在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现实前景，而前领导的工作方法却使"社会产生沮丧，冷嘲热讽和普遍的厌恶情绪"。中央委员、比得哥什省委第一书记马伊赫热克认为，社会的极大不满首先是因为缺少明确的前景。"我们大家都感觉到，群众的这种不佳的情绪一年年是怎样在增长"。

中央委员、"乌尔苏斯"机械厂技工莫迪卡说，"枪声响在沿海地区，但是，我们感觉到了它。那些天，我们"乌尔苏斯"机械厂里的局势相当紧张，真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我们没使它爆发。"莫迪卡指出，人们要求对导致十二月事件的原因要向全党作出彻底的明确的分析。中央委员、斯塔拉霍维采载重汽车厂的班长克拉维茨说，"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存在沿海地区那种形势，但所有地方的气氛都非常紧张。我们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

中央委员、“采盖尔斯基”工厂钳工乌卡舍夫斯基指出，十二月份的食品涨价“在我们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失望”。中央委员、卢布林省委第一书记科兹德拉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开始逐渐失去我们党同社会联系的基础，丧失为全面发展经济和文化以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而进行广泛的共同活动的可能性”。“至于说危急的一周，如同国内大部分地区一样，卢布林地区十二月份是平静的，秩序井然。”别的发言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沙夫兰斯基称：“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只是在沿海地区可能出事情。”中央候补委员、内务部副部长别查克透露说，“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〇年我们收到了不少请愿书和工人提出的要求，他们对党和政府政策的不同方面提出了批评。其中对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官僚主义的滋长和压制批评等现象提出了指责。”他说，内务部向中央领导报告了各方面出现的消极现象，但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中央候补委员、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前任党委第一书记平科夫斯基在谈到十二月以前形势的特点时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一九六三年以来，福利条件恶化了，同时有几批工人从来也没有提过工资。

中央委员、比乌哥拉伊县委第一书记戴赫尼克指出，“一九七〇年秋，县委在评价居民情绪时，就曾向省委报告存在着悲观主义和漠不关心的现象”。中央候补委员、科沙林省委第一书记库伊达指出，科沙林省“有过一些街头骚乱（在斯乌普斯克），但是这些骚乱并没有达到可能导致悲剧后果那样的程度。全省的紧张状态一直持续到盖莱克同志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库伊达说，企业中仍存在着引起冲突的形势，这首先要由那些不能理解必须改变“做法”和不能理解“必须同积极分子及职工进行谈话”的行政部门负责。中央候补委员、比得哥什电器厂电工纳莱

日迪在谈到十二月以前形势的特点时表示，现在“不能让任何人相信不能兑现的事情。我们日常的生活表明，工人往往比许多假经济学家更会用铅笔计算。经济学家经常搞错，而他们的工资却不减少。如果工人搞错了，就得不到工钱。”什切青省委第一书记奥乌贝克认为，“什切青居民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有时连最基本的生活福利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这一事实是什切青出事以及紧张状态持续相当久的根源。中央委员、伏罗茨瓦夫省委第一书记皮瓦托夫斯基说，一九七〇年夏季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了“普遍的不安，产生这种不安的原因是市场对基本消费品的供应极其短缺。在危急的一周里从沿海地区传出来的消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安情绪，在伏罗茨瓦夫几个工厂里，部分职工曾停工几个小时”。中央委员，罗兹市委第一书记约·斯彼哈尔斯基说，至于社会情绪，那“罗兹也不例外。在那难忘的十二月的日子里，尽管普遍感到失望，但市内还是平静的，我们那里的工作没有被打乱，这只能归功于党员群众和工人们的高度纪律性和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中央候补委员、热舒夫省委第一书记什克拉巴指出，如果说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在我们省里没有发生公开的示威游行，保持了较多理智，到处是井然的秩序和正常的劳动节奏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基层党组织的广泛的政治工作……以及我们省党的机关自己负责，没有执行前领导制定的、雅什楚克同志去年十二月份发出的关于大批解雇和停发法定奖金的不正确的指令，在食品涨价之外，这些指令直接影响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中央候补委员、霍热夫“兹戴尔”氮肥厂党委第一书记希什卡说，沿海地区工人的行动并不使许多党员感到意外，因为，“宣传和实际生活之间出现了这么大的差距，党内和社会关系中有这么多不对头的事，因此工人阶级的反应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央候补委员、波兰国营铁路卢布林机务段的钳工瓦尔契凯维奇认为，“长久以来不满情绪就在滋长……”。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然达罗夫斯基认为，社会的不满情绪，主要是工人阶级中的不满情绪是由于错误的经济和福利政策而产生的，“这种政策加剧了紧张。”

从以上介绍的评价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十二月事件之前的时期，波兰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十分危急的。毋庸置疑，沿海地区事件也有可能在波兰其它地方出现。值得记住这个事实，因为那些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失去自己职务的党的领导成员或多或少地公开否定这一评价。他们认为，在悲剧的一周的末了国内已经平静，因此，经济和社会政策中预计要进行的修改，并没有实际的根据。

评价格但斯克和华沙领导中心在这悲剧的一周中的活动是讨论的重要题目之一。卡尔科什卡指出，在省一级党的领导骨干中，在星期四，即十二月十七日对事件有了一致的评价，执委会在星期五，即十二月十八日夜间的会议上接受了这个评价。这个评价的根据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不满于经济状况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行动……”，“这样的评价我们作得太晚了，只是到了悲剧一周的末了才作出来”，这对国家来说是个不幸，对沿海地区来说是一场悲剧。为什么这么晚呢？这是前领导的过错造成的，主要是代表前领导的克利什科的过错造成的。卡尔科什卡提醒说，省委会的执委们还在涨价之前，在宣读政治局就此问题的信件时，根据从工人中搜集的意见就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评价，其精神与全会的材料中所表达的一样。因此客观地看，对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在沿海地区开始发展的形势更早地作出正确评价，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卡尔科什卡说，在十二月十五日悲剧的星期二之后，省委执委会夜间开会研究形势，但是已没有可能心平气和地开完会议和认真地分析形势了。“因为我们大家情绪都很急躁，受到克利什科同志的批评，而他的批评是不对的。”发言人翻开记录并读了一段克利什科当时说的话：“听了方才的发言和评价，给人的印象是，党的机构已做了力所能及的事。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格但斯克，而不是在其它省份发生闹事？你们当中有一种情绪，你们自己也不明白这一点。出事的主要原因就在你们身上，因为你们自己都不相信决定涨价的必要性。明天必须彻底消除混乱，恢复平静……”看得出，克利什科对当时沿海地区发生的事确实很不理解。他不仅不大知道群众的情绪，而且也缺乏想象力。平科夫斯基也谈到了卡尔科什卡提到的问题。这是八中全会上最富有戏剧性的发言之一。《新路》上发表的发言没有完全表达出这一戏剧性，因为平科夫斯基关于造船厂工人一边在街上抬起自己同志的尸体，一边齐声唱着国歌的那段描述被删掉了。平科夫斯基指责克利什科轻视省委。在谈到卡尔科什卡提到的那次省委执委会议时，他说：“我和海杜加同志曾想在执委会议上提出，必须采取措施，不死一个人。克利什科同志，你不愿听我们的意见。你不让我在执委会上发言……我还有别的话要说，他认为我们胆小怕事……”。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也提到了克利什科在沿海地区的活动，他指出，“在困难的十二月的日子里，领导的做法也不是绝对一致和明确的，”他注意到，作为领导成员之一的“克利什科同志——正如同志们在这里已经提到的那样——说得轻一些，没有促进问题的政治解决”。

克利什科说，是的，他在那次执委会议上的讲话很不客气，

"我的发言甚至是粗暴的，因为我中午从直升飞机上看到了燃烧着的省委大楼。我们大家都很着急，因为在燃烧着的大楼里还困留几个或十几个人，而群众不让消防队进去，这些人没法撤出来。"从这一声明看来，克利什科是凭着感情，是在他从直升飞机上看到的景象的影响下而采取行动的。

发言的人们从不同的侧面和立场阐述了在危急的一周里笼罩着党中央大厦，确切地说，笼罩着第一书记的办公室的气氛。有些发言人，特别是鲁明斯基、莫查尔和西伦凯维兹在谈这个问题时还谈了当时没出席全会的哥穆尔卡本人的特点。

肯帕指出，"哥穆尔卡同志不遵循集体领导原则，专断地决定一切，"这对于以恶劣的方法领导党的工作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哥穆尔卡"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或反对的意见。"他对"许多人，对集体，以及对整个党组织"都疑心重重。肯帕还说，所谓"核心领导"中的哥穆尔卡的同事们（这些人的姓名在印发的材料中提到了）以及其他一些同志，过去的政治局委员（也许发言人指的是斯柴莱茨基，斯彼哈尔斯基和洛加—索文斯基），他们在歪曲党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雅什楚克驳斥了一些讨论者对他提出的指责——关于他在讨论中的发言我们下面还要谈到——他在全会第二天会议上提交的声明中表示："关于我同前中央第一书记合作的问题我要说明一下：维斯瓦夫同志（即哥穆尔卡——译者注）经常自己作出一系列的经济分析；他是一个既不需要别人吹捧、又不允许别人指挥的人。"

当鲁明斯基踏上讲台的时候，在场的人立即意识到这不会是一般性的发言。鲁明斯基是波兰共产党党员，工程师出身，在人民波兰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八中全会时他是国务委员会委员。

在我的感觉中，鲁明斯基是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但他属于那些敢于公开表示自己观点的人，甚至在知道自己处于少数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在六十年代，鲁明斯基在几次中央全会上往往不同意哥穆尔卡的意见，哥穆尔卡经常以果断和尖锐的语言同他进行辩论。党的中央级积极分子都知道鲁明斯基对十四年前十月事件的批评性观点。现在他又提出这些问题。鲁明斯基不否认哥穆尔卡要对十二月所发生的事件负责，但他指出，“不能把这种责任与另一些人分开，那些人在特定的形势和情况下为哥穆尔卡再次担任第一书记铺平了道路，并在以后的十几年里，直到最后一刻把他吹捧为最高主宰和救世主。”鲁明斯基继续说，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党经历了严重的危机，特别是在贝鲁特逝世以后，这种危机“主要在党的最高层中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涣散和混乱”。鲁明斯基认为，波兹南事件发生后，经过七中全会一周的激烈讨论，中央委员会尽管有许多弱点和动摇，还是克服了困难，制定了扩大民主、“同所谓个人迷信的偏差作斗争的方针。全党都进行了这一斗争。”可惜“在七中全会上反对哥穆尔卡同志参加积极的党内生活的那么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领导成员居然在三个月之后又支持哥穆尔卡出来工作”。于是开始大力推荐新的第一书记，说这个第一书记“要开始一个革新时期，推行民主和废除个人迷信的方针。我们很快就失望了……没过多久就等到了这种革新。还不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全国就把许多有思想、有热情、多年来富有献身精神的工人活动家从党内职务和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了。甚至非法地停止了中央委员的党内活动。在十一中全会上不按照中央委员会章程就开除了中央委员克沃谢维奇同志，唯一的原因是他与哥穆尔卡同志意见不同。这是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〇年的事”。鲁明斯基讽刺地说，现在有人说，“维

斯瓦夫同志是一九六四年以后才变的。同志们，他没有变，他只是对那些开始造他反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活动感到不安。”鲁明斯基认为，我们还有不少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甚至在党的书记处里都有。哥穆尔卡，就象他常有的那样，了解到情况时已经太晚了，他开始同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书记们分道扬镳*。但是这同一九五六年后的情形不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渐渐离去，没有声张，没有冲突，没有揭露错误的观点，也没有说明意见的分歧和离职的原因，只是说“因为有病”。可见，鲁明斯基是指责哥穆尔卡执行了无原则的政策，并认为再次选举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铸成了大错。在八中全会上他是唯一提出这种论点的人。西伦凯维兹不同意鲁明斯基的观点，他指出，“被哥穆尔卡的威望冲昏了头脑”的情况曾存在过，他并不耻于说，一九五六年以后有许多年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九五六年时我曾尽可能地极力促使哥穆尔卡同志合法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人民、工人阶级，还有关于哥穆尔卡的所有传说，这些都是正确的。要知道这些都是有份量的政治现实，而不是我们说说而已。我在七中全会上也曾说过，我们应该有领导人，而不是领袖……。”**

中央委员，国务委员会委员斯柴莱茨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前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也提到了十四年前的事

---

* 这里鲁明斯基指的是三位书记，耶日·阿尔布莱赫特，耶日·莫拉夫斯基和瓦迪斯瓦夫·马特温。这些人在六十年代初期离开了党的领导层。

** 鲁明斯基在自己的讲话中说，一九五六年夏天在七中全会上，他是反对哥穆尔卡回来当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

件。他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在七中全会上他赞成给哥穆尔卡和其他同志恢复党员的全部权利并纠正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屈辱；同时“我认为应该讲下面几句话：‘我认为应该极力防止这样一种倾向，即把哥穆尔卡同志看成是能解脱我们面临的一切困难的救星。这样看问题不会给任何人和任何事带来好处。我们既不需要救世主，也不需要领袖。党的团结问题不能只靠哥穆尔卡……’。”斯柴莱茨基补充说，他认为这一段话和所包含的思想“值得重视，在目前或在将来都是适用的”。

中央委员，热兰小汽车厂车工斯坦尼舍夫斯基在发言中说道，“多年来哥穆尔卡同志* 在我们厂受到极大的信任，这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也表现出来了。可是现在他无可挽回地糟蹋了自己的威望，……小汽车厂的党员和非党工人们大都感觉到，哥穆尔卡同志滥用了他们对他的信任。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有人这样说：‘我们相信他比相信国内任何一个人都深。他保证说，生活会好起来的。可我们的处境却越来越糟，就在这段期间涨了好几次物价’”。

克鲁契克在描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以前政治局里的气氛时指出，“今天说起这些是痛苦的，因为哥穆尔卡同志在长时间内对我具有很大的影响。”克鲁契克列数了哥穆尔卡为党建树的功绩，并补充说：“同志们，我们同样应该知道，最近几年他已经不是正确地在领导党了。这是因为在他的个性中有一些不好的特点，他多疑，甚至对最接近他的一些领导成员也怀有成见，后来，象雅什楚克这样的人又向他进谗言，弄虚作假，说悲剧可能威胁我们的国家，说所有的人都想捞一把……这些致使他失去了健

---

* 哥穆尔卡曾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热兰小汽车厂基层党组织的成员。

康。"

格鲁金指责哥穆尔卡没有充分估计煤炭对国民经济的意义。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卡托维兹省总结和选举会议上，"他当时明确地专断地对我们说，煤炭没有前途，因此要限制用于波兰采矿业的现代化和发展的投资。实际上也照这样做了。"

沙夫兰斯基说，较长时间以来人们已经感觉到，"党内事情不妙，同工人阶级谈话越来越困难了"，不安和怀疑被"政治局委员们，特别是哥穆尔卡同志的威信"遮盖过去了。沙夫兰斯基继续说，当哥穆尔卡一九五六年上台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帮助哥穆尔卡同志工作，帮助他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但这是一场困难的斗争，一场没有结果的斗争。沙夫兰斯基认为，在那段时期里，不受党监督的第一书记个人的权力增大了，再加上个性的特点，就导致了如此痛心的后果——领导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中断。

西伦凯维兹谈哥穆尔卡谈得最多，他在很长的发言一开始就表示，"在可能有助于解释清楚过去一些问题的范围内他应该回答许多问题……"。在八中全会召开前几天，西伦凯维兹同哥穆尔卡进行了谈话，他说，哥穆尔卡声称，给党领导送来的报告和情况都瞒着他。西伦凯维兹认为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情况都汇集到哥穆尔卡同志那儿了。"例如，卡托维兹省委关于这一地区人们对食品供应恶化的情绪的情况在夏天就转给他了。向各领导成员通报这一情况引起了"哥穆尔卡同志的勃然大怒"。西伦凯维兹问道，是否有可能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谈自己的观点呢？他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刺激哥穆尔卡同志妄自尊大的敏感性，破坏他的权威感，好象他的权威会因意见不同而发生动摇。这只能引起威信扫地……"实际上，谈话只能顺着他的意思，只

能对决定略作修改。西伦凯维兹继续说，几年前，“有一位杰出的、对我表示信任的经济学家，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心给我送来了一份他写的关于经济形势的备忘录。我认为这个文件很有意思，就转给了哥穆尔卡同志，并注明值得一看。几天后在一次见面的时候，哥穆尔卡同志坚决地拒绝了这一文件并要求撤这位作者的职。从那时起我就不给他送有不同意见的备忘录了，以免损伤他人。”西伦凯维兹认为，前几年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商量的可能性——“当然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那样就会被怀疑是另树旗帜，而且也不管什么用。当时只能个别交谈……最近几年就连这点也不可能了。任何商量的余地都没有。相反，政府和我本人受到了猛烈而粗暴的攻击”。

西伦凯维兹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哥穆尔卡专断的统治作风。其中一个例子是关于咖啡。由于这十年来咖啡的消费量增长了，因而“引起了盛怒下的攻击”。后来对有关部门和政府的决定进行了调查，以便确定消费量怎么会增长的。调查工作由雅什楚克同志领导。这一次发怒的结果就是大力限制咖啡的进口。对有关购买房屋工厂的所谓“愚蠢的”政府决议也进行了调查。

莫查尔说，“我既不打算袒护维斯瓦夫同志，也不想得罪他。我认识他已有二十好几年了。我同他是在很困难的时期、即德国占领时期建立联系的。但是我要说，维斯瓦夫同志就好象党内的家长，并且毫无疑问也是个独裁者。他周围的人都是百依百顺的。否则，维斯瓦夫绝对不能容忍，并会把他们抛弃。与此同时，他不认为这样是不能领导党的工作的，也没想过应该听取不同的观点。”莫查尔认为，那些围着哥穆尔卡转的溜须拍马的人利用了他性格的特点。是这些人使哥穆尔卡一直相信，他的所做所为都是正确的，英明的，一切均应如此等等。“由于那些吹

鼓手，结果使维斯瓦夫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逐渐地避开了同人们的接触。我记得，过去在某种程度上他感到需要这种接触。他变得更难于接近了，接着人们也回避他，不愿意碰见他，因为他有时很严厉。”西伦凯维兹也谈到当时的气氛，他说，往往有一大帮偶然挑选来的人，他们为哥穆尔卡效劳，他们装腔作势地证明第一书记正确无误，证明一切都要绝对服从于第一书记的权威。西伦凯维兹趁机说了几句不无道理的刻薄话。他提醒说，正是哥穆尔卡一九五六年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准确地形容了“当时受到批判的”搞个人迷信的人，这种人“在他的活动范围内，知道一切，解决一切，领导一切和决定一切”。

在书面发言中也可以见到对前第一书记的意见。多马加瓦指出，哥穆尔卡“不善于依靠集体，不善于依靠党……对他来说，只有忠于他并为他献身的人就够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只会点头称是的人，只会崇拜领导者的荣誉和正確的人以及一些外行，并由他们决定人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切身问题。”多马加瓦指出，哥穆尔卡忽视党，削弱了思想教育问题的意义。多年来道德和思想问题只是附带地、形式上地、“几乎是被迫地”管一管。多马加瓦引用自己的经验说，一九六六年我们在克拉科夫省委全会上提出了党员的道德和思想立场问题，“我多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说我们离开战线走得太远了。”可惜他没有说明这个指责的根据是什么。

中央委员、部长会议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帕耶斯特卡说，“哥穆尔卡同志深知国家的技术经济进步不够，他曾不止一次激动地（有时夸张地）谈到这一点。最近几年作出的许多决定正是在日益确信我们的技术经济发展不够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这些决定从社会和经济上看应该认为是错误的。”

中央候补委员、波兹南省委第一书记扎萨达指出，前领导的错误在于没有充分估计到对生动的、有活力的和创造性的人民群众运动实行直接领导（不仅仅通过国家机关）的作用。他写道，“我知道，这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很重的，是最重的指控，但遗憾的是，悲剧的经验表明这是真实的。对于我，对于一个来自大波兰地区的党员活动家来说，提出这种指责是痛苦的，大波兰地区的社会在一九五六年曾无比信任和满腔热情地欢迎选举哥穆尔卡同志为第一书记。人们承认他过去的功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威望开始动摇和降低了”。

大多数发言者都认为，前领导人的这些特点对于在危急的一周里作出的重要决定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在这一部分讨论中，很多人谈到了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下达了使用武力的指示。当时的民警司令皮耶沙克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点钟，哥穆尔卡指示在格但斯克实行紧急状态，并命令军队和民警有权在自卫和反击进攻者的情况下使用武器。在作出这项决定时“维斯瓦夫同志没有征求意见，自己一个人作出了决定，然后口授了决定”。当时在第一书记办公室里还有：斯彼哈尔斯基，西伦凯维兹，斯柴莱茨基，雅什楚克，莫查尔，斯塔莱维奇和希维塔瓦。雅鲁泽尔斯基在发言中评论说，关于使用武器的决定是在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在场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它在形式上具有法律的效力，但是在这些决定中缺乏责任感。

西伦凯维兹还补充了一点情况。他谈到行动指挥部参谋长科尔琴斯基将军同哥穆尔卡通电话的情况。星期二早晨九点钟将军打电话请求允许使用武器。十一点钟左右决定传达到了格但斯

克。*

对党的前领导人的批评使我想谈几点超出他个性特点的意见。在谈到整个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对领导核心出现的局面的责任时，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对哥穆尔卡提出批评时，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在党的领导班子里负责经济政策的雅什楚克在他身边所起的作用。对雅什楚克工作的批评是极其尖锐的，有时甚至是恶狠狠的，实际上几乎是直截了当说他是哥穆尔卡的“恶魔”。讨论者对他提出了一大堆指责。以下是在两天的讨论中按发言顺序对他提出的较重要的指责。肯帕说：雅什楚克同志对华沙市委的态度是肆无忌惮的。他对华沙市生活各个领域琐碎的干涉特别多。卡伊姆说：本应由经济部门作的决定，结果由中央委员会作了，而实际上则是前中央书记雅什楚克同志作的。卡伊姆说：“经济决定这样地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种情况在最近二十年中还从没有过。”** 米特伦加谈到了雅什楚克的教条主义的，

---

* 科乔韦克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七日《时代》周刊上回答编辑提出的问题“是谁作出对工人使用武器的决定，是谁向行动指挥部传达这一决定并令其执行的？”时候说：“这一决定是在华沙作出的，在场的有当时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人。我知道这一决定是由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在星期二早晨传达给科尔琴斯基将军去执行的”。

** 在第一天讨论中，雅什楚克是第五个发言人。一开始他就表示，在这次全会上散发的材料里还应该补充一点，即在最近的五年计划中我们的外债减少了，而且还有了一些黄金和西方货币的外汇储备。“因此，不能象《人民论坛报》二月五日写的那样，说新领导没有继承任何储备”。他承认工业生产中第二部类的比例下降了，但又指出，“好几年来形势就是这样，并在递交给政治局的历次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中被确认过”。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五年计划的草案没有提交公开讨论是由于一九七

常常甚至是恶意的活动。正是他提出了对波兰来说特别危险的关于煤炭没有前途的理论。他的破坏活动“不只集中在煤炭工业上”。作为前动力工业部长，他自认为他是决定这一工业中一切事的唯一的人。拉德林斯基谈到“雅什楚克同志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不断增加”，他说，“我们在工业部门的人充分意识到，维斯瓦夫同志和政治局在获得地方和工业情况方面被经济书记封锁了……”拉德林斯基指出，雅什楚克一个人决定副部长的任免，根本不考虑工作的从属关系，不让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会议，而把附和他的人拉来参加会议，并指挥从属于各部部长的人员。拉德林斯基说，“支配权落在一个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人的手里，而责任却落在政府头上，政府受到了以不能允许的方式进行的批评。”克鲁契克也没有放过雅什楚克，他认为雅什楚克的发言是“没有党性的，不负责任的，毫无用处的……他在这里没说清楚任何问题，却给我们的经济带来这么多的贫穷”。“雅什

〇年夏天政治局否定了计划的第二稿，认为它不符合第五次党代会的设想。“这种情况是政府内特定的形势造成的，也是政府工作作风和计委内部形势造成的”。雅什楚克声明，他不同意说他试图通过计委控制政府工作的指责。至于“公开指责我不善于组织调价的行动”，要知道这个行动是国家价格委员会“同党中央和政府协商后”准备的，然后委托给政府去实际执行。“我既没看见，也没批准任何一个价目表”。他说，“要是谈到多年来的全部经济政策，那也必须谈到所有决定这一政策的同志们的责任。我不想逃脱对这一政策的责任，但是政治局其他委员和政府成员也要对此负责，他们的任职时间比我要长的多”。雅什楚克不接受《评价》中关于政治局内有一个“包括他在内的三人领导小组”的提法，也不接受关于他不重视批评的指责。然而他同意说他武断专行，认为确实“很有道理”，但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经济部门的工作是令人烦躁的工作。

楚克同志玩弄计算尺，把我们提出的一切问题都否决了。他能用这把尺子立刻算出一切，名义工资是多少，实际工资是多少，市场上的价格动向怎样，他马上就知道该怎样去解决问题。他用这种办法总是很得手的。”克鲁契克说得口若悬河，绘声绘色，在他谈完雅什楚克问题时，他向上帝求助。他说，“上帝呀，保佑我们不要受中央领导和党机构中雅什楚克那样人的气吧。”雅罗谢维奇说，“大家都知道而且已被充分证明的是，中央委员会前经济书记利用第一书记的威望，把他自己施加了决定性影响的决定和立场说成是第一书记的，以不能允许的方式干预政府的一切事务，否定甚至强迫取消已经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发言人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西伦凯维兹对雅什楚克谈得特别多。问题不在于他是哥穆尔卡命令的执行者，因为“我在一定的方面也曾是个执行者，而且在这么多年中我一直是一个深信不疑的执行者。我们大家都曾是决定的执行者。因此雅什楚克同志和我们的差别不在这里……我们感到，问题在于雅什楚克同志每天都一鳞半爪地向哥穆尔卡同志汇报情况，主要汇报各处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差错……雅什楚克同志给哥穆尔卡同志介绍的许多事情只是为了突出他自己的作用，似乎他是唯一捍卫公众利益的人。为了显示雅什楚克同志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物。我且不谈这个问题心理学的一面，每次看到哥穆尔卡同志的反应时，这一点都显而易见。这种方法肯定加重了哥穆尔卡的心理负担，一个时期以来他几乎每天都失去平衡。”西伦凯维兹说，雅什楚克“不择手段地贬低部长们的威信”，在经济政策中有些问题是禁区，一涉及到这些问题他就火冒三丈。航空工业就是其中之一，有人打算取消航空工业。政府和党的机构凡是想谈论这个问题的，都受到“恫吓”，根本不存

在提供资料的可能性。

书面发言中对雅什楚克的工作也提出了不少批评。中央委员、党中央计划和财政部长布利诺夫斯基（雅什楚克是他的顶头上司）说，“由于我们之间对社会经济各种现象的评价有分歧，对党的工作方法的观点也不同，使得我们之间的合作气氛很紧张。”黑林斯基指责雅什楚克“完全脱离生活，脱离企业中发生的实际现象，也不了解工人、技术知识分子和党员积极分子提出的意见”。他作出的决定与“长远地、经济地对待提高技术水平和发展出口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黑林斯基用这个方法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权限问题。不管雅什楚克及他的直接上司哥穆尔卡本人的个性怎样（他们的个性有助于独裁专制方法的滋长），在波兰的社会制度中，政治领导对经济政策具有施加影响的巨大的可能性。随着经济发展的日益复杂，技术上的要求一天比一天高，经济各部门的相互依赖一天比一天深，经济工作就必须由职业高度精熟的集体来领导。政治因素自然也就没有能力掌握这个非常复杂的机制。

中央委员、中央重工业和交通部长斯·科瓦尔契克指出，雅什楚克在实践中代替了被授权管理国民经济的机构。他说：“有时我有这样一种印象，雅什楚克同志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万能的人，技术、经济、社会、思想和政治，什么问题都懂的人。”中央委员、中央轻工、商业和建筑部长库欣斯基把雅什楚克描绘成一个对自己的活动路线缺乏起码的批评精神的人。中央候补委员、计委局长奥索夫斯基指责雅什楚克应对“强行提高国家进一步工业化的速度，不去改善劳动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条件”负责。中央候补委员、卡托维兹省委书记佩卡批评了雅什楚克“企图把本来工作很好的、中央主管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部门分细化小的做

法。例如雅什楚克同志要把一个部划分成两个部，并建立新的部。幸亏他没搞成，否则这些部门立刻就会变成死气沉沉的官僚主义的机关……”。

雅什楚克在中央全会的第二天发表了特别声明，他指出："我同意对经济形势的某些评价。同意政治局提出的工作纲领。我赞成这个行动纲领。我也同意在讨论中对我提出的许多指责，但是我绝不能同意米特伦加、拉德林斯基、克鲁契克和雅罗谢维奇同志在讨论中对我进行指责的大部分内容。其中有许多是不真实的，特别是说我对政治局和第一书记封锁消息，并以他们的名义擅自作决定更是不真实的……。说我在道义上虐待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指责是幼稚的。这些必须在专门委员会上讲清楚”。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就是对这个声明的答复。决议指出“雅什楚克同志在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主管经济政策的中央书记期间的活动，以不能容许的和专断的方式直接干预了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他极力推行一系列错误的经济决定，这些决定成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事件的根源；中央决定把雅什楚克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斯柴莱茨基也听到了不少对自己活动的尖刻意见。实际上这是由他自己的发言引起的。

斯柴莱茨基首先抗议在七中全会上“以突然的方式把他从党的领导班子中”撤下来。他指出，根据党章规定，以突然的方式把人由选举产生的岗位上撤下来是党内很严重的处分。当时谁也没有告诉他，对他有那些具体的责难。他说，我只要求党章赋予的每一个党员的权利。“我并不想保护已被撤去的职位，用有些人的粗话来说，我也不想保护那把交椅，因为只有那些坐在这把交椅上并老老实实工作的人，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苦役。然而

我保护的是党的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党内民主”。斯柴莱茨基严厉地抨击了《评价》中关于那些在七中全会上被清除出领导班子的同志应该对导致十二月事件的政策负有责任的看法。

关于责任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参加讨论的人对斯柴莱茨基的尖刻意见是由他自己关于党组织和党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讲话所引起的。好象只有他，斯柴莱茨基，和他的同志为“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党内民主，为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和对劳动人民事情的关怀，为党的正确而理智的领导作用和言行一致……”进行了斗争。从斯柴莱茨基的发言看，归根结底什么坏事也没有发生。“工作作风是列宁主义的，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还有什么呢？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评价正是包括在这样的理解之中。他说，“目前，我们国家暂时处在复杂和困难的形势下，但是还没有严重到绝望和惊慌失措的程度。应加强队伍，应对前一时期作出充分的，深刻的和真实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充分的政治、经济和人事结论。必须这样做，不过不要寻找什么黑羊和白羊……。我还认为，应该避免那些有时因感情冲动或一时需要而作的口头的、书面的、特别是公开的发言。”毫无疑问，斯柴莱茨基讲出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含有弦外之音。八中全会已过去多年，从现在来看，斯柴莱茨基话里带的刺和他的恶意都已是无关紧要的。然而不能放过他对当前国内形势的评价。当然，谁也不曾惊慌失措，但谁要是认为只要“加强队伍”，一切就都会好起来，那这个人必然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或轻视现实的政治家。斯柴莱茨基的发言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象他这样的人已失去了与群众的一切联系。值得提醒的是，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为止，斯柴莱茨基在党的领导班子里一直是主管组织工作的。在共产党内组织因素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党取得的许多胜利，都

应归功于她拥有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强有力的组织。共产党生活中组织工作的作用，使得主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在党的各级机关占有关键性的地位。在最高一级，即中央委员会尤为重要。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及其下属机构决定着党组织在执行党的决议时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在党的干部政策中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有关进行各种行动和运动的方式的许多决定也是从这里作出的。

玛伊赫热克在回答斯柴莱茨基时说，他有一种印象，即斯柴莱茨基可能“不清楚同积极分子会见时该讲些什么，也不完全了解国内发生了什么事。”玛伊赫热克指责斯柴莱茨基没有为不断地改善党机关的工作作风创造出适当的气氛。莫迪卡说：“你在这方面的唯一反应是要求拿记录本来”。斯柴莱茨基经常去“乌尔苏斯”工厂，这是事实，他是这个厂党的基层组织的成员，不过“党的积极分子每一次都象怕火一样害怕与他会见，这也是事实。很久以来就没有诚挚的党内谈话，什么事都怪罪我们不好。”莫迪卡呼吁斯柴莱茨基不要再到“乌尔苏斯”去了，因为“我们再也不信任你了。”斯柴莱茨基的讲话中有一段提到，在占领时期他是这样一批人中的一个，他们在波兰历史上最残酷的时期“没有呆在国外，他们在整个希特勒占领时期都在这里，在这块土地上，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战斗”。参加全会的人都明白，这是影射盖莱克的，因为盖莱克在占领时期侨居比利时。莫查尔提到斯柴莱茨基的这一段话时指出，斯柴莱茨基的讲话中，“某些地方有些别别扭扭，特别是当他讲到从西方回国的那些人时更是如此”，莫查尔坚决谴责在党员中实行这种划分。斯柴莱茨基在书面声明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声称他不想贬低那些在国外进行斗争的人们的功绩。他讲：“同志们，在开了一整天会之

后，在紧张激动的情况下，要准确地表达思想是不容易的。”

罗科舍夫斯基的书面发言也对斯柴莱茨基的发言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在党组织中对斯柴莱茨基的意见“非常多……简直要沸腾了……你到自己的工厂的党组织中去走一走，那里有很多意见要对你讲。”关于组织书记会议，罗科舍夫斯基说，“这是独白和争论。你不让别人把话说完，打断别人的发言，你得罪了活动家们。”罗科舍夫斯基还提到有一次斯柴莱茨基下命令把一个在党的会议上讲了工业中存在坏现象的联合公司的经理开除出党。

在两天的讨论中，人们批评得最经常也批评得最尖锐的，是哥穆尔卡、克利什科、雅什楚克和斯柴莱茨基这些活动家。

对他们活动的批评是与对整个领导，确切地说，对中央领导核心的工作作风的批评连在一起的。这种批评通常也与责任问题相联系。恐怕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能象这个问题那样在八中全会上得到了如此广泛的讨论。从这个问题派生出来的问题，就是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保障措施，才能在党的领导中在将来避免出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以前的形势。所有这些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就要求对它们进行通盘的考虑。卡尔科什卡说，当时的领导犯了骄傲自满的错误，他们脱离现实，脱离劳动人民，脱离工人阶级。“已经发生的一切能否避免呢？”肯帕自问自答地说，导致事件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但是他认为“党内从上到下地不折不扣地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这就是保障措施之一。党的每一个机关，它的执行机构必须经常接受有权威的监督和批评。而政治领导则应局限于对全面性的问题作出决策。卡明查克说：“我们觉得，政治局中的所谓的领导小团团过着他们自己的不现实的生活，在世界上也是明显不现实的生活。”

在前面已提到的鲁明斯基的发言之后，对责任问题的讨论就成了注意的中心。他是第九个发言的。他提到："领导脱离群众是可怕的。这不仅是指党和工会的领导，也包括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逮捕罢工委员会成员，回避接触和谈判——这是我们政治上软弱无能的表现。"发言人不同意《评价》中关于党的总路线的观点，好象一会儿说它是正确的，一会儿又说它不是正确的，说"危机的原因不在于路线，而在于没有遵守这条路线，在于领导党和国家的方法，这已是一般党员不易理解的高深莫测的哲学了。"鲁明斯基补充说，总路线问题需要解释和提得更具体些。毫无疑问，他触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评价》中没有得到恰当的阐述。随后鲁明斯基声明："我也不同意对责任问题的整个提法。我们说，什么都怪罪哥穆尔卡同志几个人，难道我们其他的人，过去的和现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就没有责任吗？"他希望，中央的"大多数"同志能正确地清算一下责任问题，并进行党的自我批评。

与责任问题有关的是集体领导问题。鲁明斯基指出，旧的倾向和专制独裁的工作作风"不会很快从我们党的生活中消失。不会在八中全会后自动消失，甚至在盖莱克同志作了最有说服力的发言后也不会自动消失。"鲁明斯基在抨击哥穆尔卡削弱了党和破坏了党的总路线时问道："难道政治局和党中央的同志们都没看见这点吗？难道他们就不能加以反对吗？"他认为他们是可以反对的，但是妨碍他们这样做的，"正如一些人说的那样，不仅是缺乏勇气和担心被人怀疑搞宗派活动，而且照我看来，还有党内的斗争。"他认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也有过这种情况，在那次大会上有些发言象是群众集会上的讲话，"充满了激情和民族主义，对新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又是鼓掌又是

欢呼。”鲁明斯基要求，领导班子中过错最大和责任最大的“必须承担其后果，并予以撤职。”

中央委员、中央文化部长克拉希科在谈到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同什切青和格但斯克的造船工人会见时，认为这两次会见对于“我们党的前领导人”是一堂“苦涩而沉痛的”公民教育课。克拉希科还谈了他对工人领袖作用的看法。他认为工人领袖不能容忍自己同工人级阶发生冲突，“但一旦真的发生了冲突，就应当正视它……哪怕是要付出一时丢失面子的代价。在当时的形势下，同工人阶级进行这种和平的对质会有什么结果吗？——不知道。不过它不仅对于党的前领导人，甚至对于全党在道义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毫无疑问，发言人触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象哥穆尔卡这样的领导人的工作作风问题。事实是，这位不断出没于群众之中的波兰共产党的前活动家，在六十年代除了在中央全会和其他会议上的正式发言外，没有建立起同群众的直接的联系。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领导党和国家的。克拉希科在影射波兰统一工人党前领导人的工作作风时，回忆说：“波兰人在最近几年中被教训得太多了。向人民进行冗长的说教，一有机会就责难人民。”除了前面已谈到的领导核心中工作的缺点外，发言人还指出，在罗列的缺点中还应加上两条：“缺乏认真思考，和没有制订出同社会谈话的形式，向社会传达决议和解释决议的形式”。要知道，“不仅领导人希望人民的喜爱，人民也同样希望领导人的喜爱。”

克拉希科接着指出：“我觉得，在道义上自己对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作过的事情和未能作过的事情负有责任。我和你们中的一些人一样，对沉默，尤其对十二月十四日在那次可悲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沉默感到羞耻。”克拉希科还顺便提到鲁明斯基

的发言，他认为挑起对一九五六年问题的讨论是不恰当的。

斯塔尼谢夫斯基说，全党在期待着对怎么会使局势发展到爆发事件的地步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回答。他说："我不知道同志们怎样，但是我作为一个工人和中央委员，在道义上今天感到内疚和自惭，因为在六中全会上，无论是我还是在这个讲坛上发言的其他同志，都没有政治勇气，都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党员们在十二月十二日宣读政治局决议的会议上真的发表了什么意见。"

比亚乌科夫斯基指出，前领导的工作方法"造成了社会的消沉，厚颜无耻和灰心丧气"。对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做出结论，这种要求"是普遍的"。他还提到鲁明斯基的发言。他不同意鲁明斯基关于全国所有的党组织在十二月的日子里都"表现出完全软弱无能"的这种观点，也不赞同关于"对所有的人进行清算"的要求。他认为"中央的团结一致"在目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此从政治上讲对党的每个领导成员追究责任是不适宜的。

克鲁契克在谈党的领导的工作作风时指出，在最近两年中政治局没有任何活动计划，"我观察了，看到了这个最高机关的工作作风是多么不正常，它既不是列宁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我们很少开会，……直到最后一刻才把议题拿出来。"克鲁契克还就党的政治路线发表了意见。他不同意那种认为这条路线是不正确的说法。他说，我们认为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应在路线中，而应在背离这条路线中去寻找错误和歪曲的根源。"因此，我们明确地表明，不是指责我们在'五大'上通过的政治路线，而是指责领导中的某些人，他们对这条路线，对评价局势都擅自加以解释，擅自引伸结论。"

斯柴莱茨基也谈了责任问题。他说，为什么和根据什么认为只有五个领导成员才应对所有的坏事负责呢？为什么至今不能"既

摆摆整个前领导的功绩（因为好多同志是有功的），也摆摆他们所犯的错误呢？为什么不能单独地清算一下这个领导班子中每个成员所参与的程度及其应负的责任呢？……没有谈一谈，几乎没有谈，也没听到有人谈政府的责任，首先是政府领导的责任……”很明显，这主要是影射西伦凯维兹的。至于说到领导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斯柴莱茨基指出，“我和整个十八人领导班子一样负有同等的责任。我们应当象共产党人那样，老老实实地把每个人（我要强调：把每个人）的功过搞清楚。”

雅罗谢维奇在其主要谈经济政策问题的长篇讲话中，一开头就指出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执行这条路线时发生了严重的歪曲！”他认为，在这些实质性的错误中，“在我们今天必须完全坦率地讲出来的这些错误中，最本质的问题正是中央领导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至于责任问题，雅罗谢维奇说，大家都要承担责任，因此政府也有责任，但是“每个人的程度不同。我们政治局或政府中的每个成员都要从前一时期的错误中得出结论。在七中全会前，在那种困难的、死气沉沉和使人窒息的气氛中肯定要犯错误，肯定有过软弱，犹豫和徘徊。”他指出，必须看到“这一时期的后果和产物，还要找出坏事的根源。”

中央委员、比亚威斯托克省委第一书记瓦舍维奇认为，导致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是党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负担过重，使她没有去“管理日常的人的事情……”中央委员、“书与知识”出版社社长伏隆斯基的观点是，“现在还不是谈这个悲剧性的危机的所有细节的时候”，他把这些留给了历史学家。但是他指出，对危机时期的评价只集中在主观因素上，这种评价是不能令他满意的。“往往有这种情况，把危机的原因归诸于某一部分领导人，并在另一部分领导的影响下来看待这件事。这另一部分领导人同这些

错误的关系要少一些，应负的责任要轻一些”。

人们猜测伏隆斯基指的是向全会提出的那份《评价》。他还补充道，过去“以政治上揭人缺点的方式来解释危机，让这个或那个人作牺牲品”，这种经验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最幸运的结果。伏隆斯基还说，我们不能接受那些想“惩罚整个党领导”的意见。“这里的界线是政治上的理智，是摆脱一时激情和外部煽动的政治上的理智。”他还表示，“我们还应切记，我们在这个大厅里应当说些什么，出去向群众应当说些什么”。

西伦凯维兹就责任问题谈了很多。这位多年的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总理在自己的发言中揭开了事件的内幕，他把听众引导到中央发生的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各种勾心斗角中去。他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必须确定“自己应负哪些直接的共同责任和个人的责任”。西伦凯维兹开始就说，十二月事件是“党的领导层中集体领导几乎完全瘫痪的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西伦凯维兹感到，自己对缺少集体领导负有共同的责任，“因为集体领导的瘫痪——双方都有错，善于要求集体领导和不善于要求集体领导的人都有错。要求集体领导的意图可能难于实现，肯定会以失败而告终，但事实是对缺少集体领导双方都负有责任。”发言人触及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问题之一，即社会主义制度把各级政权机关的集体领导性质看作是防止个人滥用职权的主要保证。削弱政权的集体领导性质必然会使党内以及在党与社会的关系中出现冲突的局面。西伦凯维兹指出，“既然在七中全会前已经不可能及时地赋予党的活动以其他方针”，那么十二月事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西伦凯维兹说，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所发生的这种冲突的幽灵两年来一直在追随着他，“我那时已经知道，如果我们不善于改变活动方针，那么最终总会出现或大或小的灾祸。”他认

为，在党的领导层内存在的形势是，发表不同的意见“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只能加剧人事纠纷（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唯一能进行的交谈，只是对已作出的决定再轻描淡写一番，或略加改头换面而已”。也就是说，能做的事很少。

西伦凯维兹完全支持盖莱克，认为盖莱克“以自己的人品担保，今后不仅不会再次破坏党的生活，而且相反，将开辟一条使党的生活得到充分革新和发展的道路”，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要做一名“前来报到的第一突击队的队员，而是本着深刻的信念和为了维护领导的团结”。他还说，他自己也有很多可以责备的地方。至于他在危急的一周中的作用，他认为他做了在当时形势下应该做的事情，即力争以政治—经济办法解决危机。只是“我与一些同志联系得太少了，这些同志在自己的岗位上，本着同样的方针进行活动，并作出了同样的努力”。西伦凯维兹还谈到自己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电视讲话，他说，他的主要意图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呼吁华沙及全国其他地方要保持平静。值得提醒的是，对他的电视讲话的反应各不一样。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西伦凯维兹的讲话是试图维护那条已经破产了的政治路线。这位前总理声明，在评价自己“在那些日子”的活动时，可以自责的地方并不多，“可能有一些太顺从了”；但是，“除了已经说过的无法在前一时期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外，我作为部长会议主席，肯定还能做更多的事情”。西伦凯维兹引用了中央委员、波兹南“采盖尔斯基”工厂钳工乌卡舍夫斯基讲的一句话：每个过去或现在有地位的人都应当温顺和谦虚。西伦凯维兹补充说，“我很羞愧，因为我感到了与自己所处的地位有关的共同责任。当我看到我们要走向何处时，我虽然想防止，但却没能防止悲惨的事件。我已无法摆脱这种羞愧了。”

中央委员、科学部部长维尔布兰在书面发言中写道："我有明确的共同责任感。当然可以讲，近几年在党的领导方法方面，对于政治局和书记处来说，中央委员在政治活动中的可能性和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是真的，但是这并不能摆脱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去深究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有害现象的根本原因。"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周刊主编拉科夫斯基指出："在党内我们可以考虑，也应当考虑我们每个人应负多少责任，并公正地衡量一下谁应负多大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析事态的原因。在社会上，尽管不能用同一的尺度去衡量政治局委员和乡委书记，但在波兰命运的问题上，在影响波兰命运的事件中，社会是把党做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

中央委员、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普特拉门特说，有些同志建议党内进行普遍的自我批评，要求大家都承担责任，"不过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准则，有这样的仪器，它能准确地划出责任的界线"。普特拉门特认为，那些"一切照办的人多半都是相信哥穆尔卡同志的人。这里不是恐惧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恐惧从来不能单独起作用，它是和信仰在一起起作用的。"他说，普遍的自我批评是不必要的，它只拖长党内的紧张局面并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可以借助头脑来挽救国内的局势"。普特拉门特补充说，他"完全支持把那些不称职的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不过这可以"不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不在这次人事变动后人们期待会出现奇迹的气氛中进行，只能在安定和慎审的气氛中进行"。莫查尔同意普特拉门特的意见，他认为机械地对待责任问题是不对的，他问道，难道正在进行和必将进行的人事变动（不管涉及的是谁）一定要在"愤怒'倾轧'以及社会动乱（在我国不止一次发生）中进行吗？"莫查尔发表了这样一种

观点，确切地讲是一种信念，他认为，事情应当这样，“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一旦已有必要离职时，一旦他最亲近的人告诉他有必要离职时，他就应当从特定的职位上退下来”。如果别人不向他讲呢？似乎发言人自己也不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有本人的觉悟和周围人的好心就够了。因为他接着就说，“哪里有必要，哪里就及时换人，这将是防止产生大小坏事的重要的制动阀之一”，他要求：“我们应当制订和执行一种准则，它能使我们摆脱十九世纪的繁重负担”。

中央委员、华沙市委书记乌卡谢维奇指出，近几年关于责任问题讲得很多，“但是由于职责不分明，干部间又往往有个人关系，因而在实践中并没有太认真地追究责任，而追究责任的条件必须是职责分明，任务明确和个人责任制。”

盖莱克在总结讨论时也谈到了责任问题，他说：“我应负的共同责任在于，尽管我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不赞同哥穆尔卡同志的某些设想，但我没有坚决彻底地去这样做。我的所有的保留意见并不能为我这个共产党人推脱责任。”

在两天的讨论中，大家就保障的问题谈得很多。怎样才能使将来不再出现那种直接或间接导致十二月事件的实践呢？这就是许多发言人给自己提出来的问题。

乌卡谢维奇是这样对待这个问题的。他说，在党的和职工的会议上，许多问题和答案涉及到的主要是这件事：“除了公开的声明，怎样才能保障我们与之周旋的局势过一段时间后不再重复出现呢？”讨论中提出了各种要求，包括“从制度上”保证在党的领导班子中进行定期的变动，和制定新的选举法等等。乌卡谢维奇认为，根本问题“首先是党的领导班子的实践，中央委员会的

工作原则，党的中央和地方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积极分子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他说，中央委员会不能只是举手通过政治局早已作出的决定的机关。它必须是一个机体，在这个机体里根据政治局的意见和建议，制订出对目前和未来，对党的政策具有预见性的原则决策。在中央委员会中必须形成这样一种气氛，即不能把每一个批评性意见都当成列入所谓的“集团”和“派别”的理由。* 乌卡谢维奇要求党的领导成员及其第一书记同劳动人民、同党的积极分子和党员保持“经常的，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不要事先彩排，不要由我们亲自审查问题和答案，也不要搞我们所特有的排场……”。他认为，“在党的各级组织和机构中坚持讨论的原则，坚持就重大的决定在通过之前事先磋商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莫查尔认为，目前人们普遍提出下列问题：“为了使具有威胁性的和令人痛苦的一切类似的事实不再发生，党打算怎么办？党准备建立什么样的‘报警’，以便能及时预报面临的危险，党有无能力建立一道壁垒，以便使今后永远不再发生类似的危机？”

---

* 同其他几位参加全会的人一样，莫查尔，乌卡谢维奇指出，反社会主义分子变得活跃了。乌卡谢维奇说，这些力量“常常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的样子，开始先攻击所谓的已经异化了的、正在干涉政治—经济生活一切领域的党的机关，接着就提出了取消工人自治委员会的必要性，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工人委员会。他们大谈特谈工会的自治，而后提出口号，说自治的条件是工会里不要有党员。他们还攻击党的积极分子，并试图对全党进行审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改正’和‘革新’的口号下进行的，都是来自反社会主义的策源地和思想颠覆中心的。”中央候补委员马海叶克认为，“反共敌人的希望建立在我们的退却上……。敌人会再次努力瓦解党和挑动反党……。”

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首先他表示，在人民波兰历史上这个最深刻的震动之后，党应当对“苦涩的经验”进行彻底的和有计划的研究。不能只在法律条文中去寻找各项决定的正确性和合法性的保证，“应该在党和国家的生活条件中去寻找这种保证，即首先要建立这样一种条件，使领导永远不会丢掉列宁主义的方向盘，……”

依照肯帕的意见，“首先，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应竭尽全力，使全党自上而下始终不渝地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把每个党组织及其执行机关均置于经常的、有权威的监督和批评之下”。他，华沙党组织第一书记，坚决认为不需要所谓的“制度的彻底民主化”，他认为是修正主义分子提出了这个要求。他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一九五六年的第二阶段论者，其余的则是一九六八年的道德家”。鲁明斯基认为，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中，要防止发生歪曲，就需要加强工厂中党组织的地位。他解释说：“要让每一个组织，那怕是最小的组织都感觉到，对于整个制度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来说，它们是自主的，有创造性的和负有责任的。”克拉希科把注意力集中在同群众对话的内容和形式上。他指出，缺少严肃的思考，“在制订同社会谈话的形式方面，在向社会传达和解释决议方面，也就是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存在缺陷。”

格鲁津认为，“目前我们的基本任务是确定出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的方式和方法”。他两次强调，“今天或明天我们将作出的”人事方面的决定一定要有目的性。

佩卡提出的论点是，“必须改变我们病态的政权机制。在现有的条件下和‘上级’永远有理的干部制度中，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特殊病症的态度，即害怕做决定，也就是害怕担

风险。害怕出现为党的前领导所谴责的所不能容忍的不同观点。要捍卫这些观点需要有勇气”。说得委婉一些，这是在科学技术革命时代陈旧过时的党的工作模式。把“多年以来已经遭到破坏的集体领导原则”摆到了第一位。

比亚乌科夫斯基认为，最重要的事是找到下述问题的答案：“为什么社会主义民主这个从根本上说来是好的制度，经过一段时期积极有效的作用之后会变得徒具形式、甚至僵化？为什么在困难的时刻，当出现紧张形势时，它会这么没有用处？”比亚乌科夫斯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心问题是批评，但是如果对每一步都事先由代表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党委会里商量好，而党委会对这种做法又毫不忌讳”，并且变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那么又该由谁来批评谁呢？现在非常必要的是在全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要“有一种十分坦率、自由表达意见以及能绝对自由地开展党内批评的空气，……讨论时的发言不应由上级加以规定”。执行干部政策时应该不致使人产生这样的看法，即“党证是加速获得提拔的手段”。还应该非常注意执行发展党员的政策。“绝不能用发展党员的数字作为衡量党组织工作的标尺”。关于干部政策中实行轮换制的问题，比亚乌科夫斯基认为，在地方上党的机关和组织中是采用轮换制的，因此他要求省级和中央级也采用这个制度。与工人阶级进行协商和对话的制度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他提醒大家，迄今“这一类做法只是在党的领导或党的机关做出决定之后，由它们单方面宣讲为什么作这些决定”。他还要求“消灭我们管理制度和经济中荒唐可笑的现象，制止完全脱离生活、不根据企业特点而只知依靠命令和禁令从上而下对企业进行管理”的做法。他认为另一件重要事情是“改进党内的情况通报”以及严格执行“对党的机关进行党内监督的制度”。

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主席米尔恰雷克一开始发言就说，人民和党期望全会做出决定，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令人痛心的可悲的事件。“能否做到这样的保证呢？”她回答说，只要我们能“觉察到并揭露那些使政治生活发生偏差、在领导党的工作中产生独断专行的环节”，我相信这个保证是能做到的。她的下一个问题是：“一些过去受到信任和受到尊重的人却不得不带着个人悲剧离开了党。怎样才能保证使党内不再发生这样的事呢？”她认为，对（领导人的）权威要有正确的理解，对他们的爱戴和尊敬要有个界限，要防止歌功颂德和称赞他永远正确，因为那种颂扬必然要坏事，会造成社会危害。米尔恰雷克认为，“尽管谁都不喜欢批评”，但与人为善的和建设性的批评可以成为防止偏差的有效手段。她还批评了中央全会的进程。谈到六中全会时她说，实际上是开了两个党中央会议：一个是在会议大厅里冠冕堂皇的正式会议，一个是在休息厅里的私下议论。

科兹德拉也提出了关于保障的问题。他问道：“如何保证在将来不发生悲剧性的震动？如何保证使最正确的发展方案能顺乎自然地产生并取得胜利？应该创造怎样的条件使党和人民能用自然和简单明了的方法、没有痛苦、不引起骚乱和震动地产生新的领袖人物和各级领导管理部门的新领导人？如何保证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权利不受侵犯？如何保证波兰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科兹德拉认为提交给全会的文件中，“有不少措施将保证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不致出现蜕变”，但同时他又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迄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无疑这是两天讨论中较切中要害的意见之一。

在提交的书面发言中，中央委员、党中央计划和财政部长勃利诺夫斯基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明确规定在什么范围内党对

于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可给予指示和监督，以及这种指示和监督的作用和性质，以便使党的机关将来不能在这些单位里进行任何包办代替”。

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弗赖莱克说，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求，党应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党的作用。我们党不是，也不应该继续再是波兰工业监督委员会这一类机构。我们是政党，因此不应该象近几年党中央的大多数会议那样去管螺丝帽和数字，而应该管人，管人们的思想情绪”。应该恢复列宁主义所理解的党作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政治先锋队的作用。中央委员、彼德科夫特里布纳尔斯基市采矿机械厂的党委书记古希季认为，“应该改变讨论的风格。应该取消讨论中的总结报告部分，尤其是夸耀成就的部分”。

海布达认为，“象保护眼睛那样保护集体领导原则，加强集体对个人活动的监督，这是能够创造所谓安全阀的基本因素”。维护和加强集体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他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创造自由交流思想和批评意见的合适气氛。他必须有耐心，能克制，他必须知道并且善于耐心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哪怕这些意见可能不全对”。

斯·科瓦尔契克认为，为了避免今后发生冲突，“对于工人参加管理工厂的作用和形式应该进行彻底的审查”，工人参加管理应该加强，因为“工人的政治觉悟逐步不断提高，它同工人阶级参加管理企业的形式不相适应。这一矛盾近年来已有所加剧。斯·科瓦尔契克注意到，工人自治代表会议和工人委员会的作用经常限于形式上接受上面已确定的指示。中央委员、奥波莱省委第一书记密希凯维奇赞成实行干部轮换制。

中央委员、“和平”钢厂的钳工谢曼诺夫斯基补充了科瓦尔

契克的论点，并把它加以提高。他说，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把十几个象我这样的“拿铁锤的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是否象对待最高机构的成员那样来和我们商量过问题呢？是否一目了然地，尤为重要的是真实地向我们介绍过情况呢？……”

中央候补委员、弗罗茨瓦夫工业大学校长波伦布斯基在探讨怎样才能使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时说：“这里有两个问题：（一）具有一定美德和素质的人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确运转，然而毫无缺点的完人是没有的；（二）如果与领导人一道出主意作决定的人能够正确地工作，就可能使这些缺点不致于表现出来”。为此他建议，改进工作要从“正确组织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和活动”入手。应该为中央委员们创造条件，使他们有可能也有义务就日常生活中一些问题向政治局报告情况和提出意见，应该保证所有出席中央全会的委员们都能真正参加讨论，应该改进党内通报制度，加强并扩大党内批评。“要使批评起到自己的作用，党内就不应该有不能批评的人”。中央候补委员斯泰凡斯基也谈到了党起作用的问题。他要求党摆脱行政事务而加强监督作用。

维尔布兰在书面发言中就保证问题谈了许多。首先他表示，“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偏差，尤其是它已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一个事实，说明有必要采取更深入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应该由未来的党代表大会来决定”。对于“最近很时髦”的轮换制思想，他有所保留，他表示他很重视从机构上解决问题。维尔布兰强调，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是与工人阶级协商，集体做决定和党内生活的民主原则。“除了这些基本问题外，不受任何规范约束的政治生活习惯也有着重大意义。从很久以来（至少从我参加运动时起），这些习惯在我国就不是最好的”。我指的是这一类事，诸如在做

决定时恰当地理解专家的作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学会真正运用灵活原则，以及恢复辞职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应有的作用。“如果政治家不赞同向他提出的政治路线，或者当他感到他完不成面临的任务时，辞职应该是他退出现有职位的一条体面的路子”。

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然达罗夫斯基要求大家考虑，“在我们的工作中，哪些要加以改变和改进，在党及其一切环节起作用的机制方面，什么必须具有新内容使之成为真正的革新”。谈到中央全会讨论中提出的某些要求时，然达罗夫斯基支持与工人阶级及社会进行“创造性协商”的政策。他认为讨论是“改进我们工作真正的动力源泉，它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占据应有的位置”。如果没有“独立思考”，就不会有讨论。应该要求活动家们不仅“要善于听取意见，而且要善于与人对话和辩论，善于用政治论据进行说服，而不是以组织手段进行压服……”。讨论是与批评紧密相连的，但“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在做决定时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也是不可缺少的。

从以上所摘引的发言和意见中可以看出，参加全会的人努力想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将来不发生类似的冲突，应该朝哪个方面努力。对这问题的回答是一般性的，除了不多的几个例外，这些回答指出的与其说是行动方向，不如说是思想方向。参加全会的人主要关心的不是未来，而是两个月以前发生的事件以及当前的形势。

讨论结束之后，盖莱克发表了纲领性讲话。他讲的第一点是十二月危机的起因。他提醒大家，格但斯克造船工人的行动开始时是平静的，但是领导上没有“与工人进行诚挚的谈话，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来消除紧张……沿海地区事件的悲剧首先在于没有采取有效的政治措施来消除紧张……”。盖莱克认为，企图用

武力来解决与工人阶级的冲突，是“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这只能导致流血，造成人民政权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并为反动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开辟活动场所。

盖莱克声称，十二月局势的悲剧在于，人们没有理解事件的性质，尤其是没理解它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较长时间以来，对于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的不满，对于领导党和国家事务的方法的不满一直在增长和扩大。“这种不满转变成了对党政领导的信任危机。因此十二月危机首先可以称之为信任危机”。盖莱克列举了以下几条产生危机的原因：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之间，社会所必要的比例关系越来越遭到破坏；一九六五至一九七〇年实际工资的增长很小；忽视了住宅的需要；大砍保健方面的投资等等。

投资政策也不正确。首先是耗费资金多而见效慢的投资项目与便宜而见效较快的投资项目之间的比例遭到了破坏。此外，投资项目也完成得太慢，虽经“多次批评，但一般说来没有什么效果”。领导和管理经济的方法对于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也产生了影响。六十年代曾“在这方面提出过不少设想”，但“问题在于，对这些问题只做了些零星研究，一些单个的设想与改革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协调的体系。结果在经营方法上进行的改革没有什么效果，而其中有一些反而引起了混乱”。

“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缺乏长远的设想”，这一点对于近年来整个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产生了特别不好的影响。经济政策因而是临时制定的，最近期间更往往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缺乏长期纲领也使得社会感到看不见前景，并相信我们是落后了，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波兰”。

在谈完十二月事件爆发的原因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

书记说："同志们，我们的党在历史上经历过好几次悲剧和危机。今天我们又在批评坏的领导方法及其执行人。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清算，首先是考虑到未来……我们的党必须找到一些办法来保证领导方法不出偏差，保证不出现独断专横的倾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类经过考验的保证首先是：遵守党章规定的原则和准则，道义和政治气氛，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自由，敢于进行批评，正确选择干部，干部的思想政治品质、业务水平以及道德和心灵美"。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在列举当前任务时首先说，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中，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是保证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在这个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盖莱克举了一些已经作出的决定，诸如提高最低退休金和养老金，冻结零售价格（基本食品价格），并表示要在消费工业中增加新的投资，要改进与手工业的发展有关的服务业，还要制定出"更为简单明了"的工资制度，要全面地通盘地研究住宅问题，并要扩建托儿所和幼儿园。他在评论这些任务时声称："我们坦率地说，不可能在最近期间期望过多，尤其是不能提出不现实的要求，这种要求除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紧张和混乱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盖莱克认为，制定国家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长期战略的总方向必须是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以及走科学技术革命的道路。在长期发展计划中，农村问题必须占有重要位置。还必须研究在农村尽可能地逐步实行普遍的社会保险制。"我们想在波兰加速发展广义的摩托化"。国家的空间开发是个大问题。我们迅速向前进的基本条件是"在提高经济和整个国家效能方面制定并实行成熟的改革……"。盖莱克说，我们必

须“搞出这样一套制度，它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技术进步，适合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人们提供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条件，扩大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的作用。我们需要从制度上采取措施并充分估计这样一个事实，即有效的管理是一股伟大的进步力量”。

在制定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时，关键问题是“正确解决青年一代的问题”。青年必须了解社会主义的远景以及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经济迅速进步的条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央第一书记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必须创造必要的保证，使得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和所有善良的人们能更广泛更深入地积极参加到社会生活的所有组织和机构中来”。

盖莱克肯定“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部分”之后，转而谈到党内情况和发展党内民主问题。他提醒大家，党是团结、动员和鼓励人民的所有力量去达到既定目标的主要中心。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有能力作出具有关键意义的决定。“但问题在于，这些决定要真正具有关键的性质”。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生活的不同领域里的专业干部具有发挥主动性和独立作决定的更大余地”，而在党内，在党的最高领导中则能集中力量做“全盘性的决定，这些决定要尽可能广泛地考虑专家们的分析和意见”。中央第一书记表示要实行这样一个原则，即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定期全面讨论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状况。

盖莱克谈了党内民主的几个方面之后说，“我们不应该从奇妙的公式中去寻找将来不会重犯错误的保证以及给我们未来打保票，而应该深刻地纠正错误，将纲领加以改进和加以完善，在生活各个领域制订好的纲领；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科学和文化

中，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团结，并同敌视这些利益的势力作斗争，巩固党的领导作用，改进党的工作方法，加强国家及其领导的威信”。

盖莱克在结束讲话时呼吁：“明天和后天我们将继续前进。我们可以也应该尽一切力量发扬改正错误的精神，这种精神已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诞生。人们希望按新方式更顺利更合理地工作，并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目前有条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团结来解决人民的基本问题。假如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将发挥出巨大的、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力量。这是党面临的一项伟大任务……”。

在全会的最后阶段，中央第一书记宣读了哥穆尔卡致全会成员们的信。他写道，由于健康原因，他不能来参加全会，但他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委员会的文件（指《十二月事件的评价及其结论》）与事实真相不符，歪曲了十二月危机一周的情况。信的作者首先集中描写关于使用军队和开枪的决定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作出的。哥穆尔卡一再表示深信，过二、三个月当他恢复健康后，他将“能够到中央委员会来当面陈述意见”。他说：“恐怕谁也不会认为我是想要保住自己在中央委员会的位置。但是目前我不想放弃中央委员的职务，因为否则我就会失去辩护的可能性”。这封信的宣读与其说是引起了一场讨论，倒不如说是招来了一系列的声明。发表声明的有：西伦凯维兹，希维塔瓦，洛加—索文斯基，雅鲁泽尔斯基，霍哈，莫查尔，皮耶查克，科乔韦克和科尔钦斯基。这些声明可以称之为有关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沿海地区事件的军事方面的声明。发表这些声明的人证明，关于开枪的决定是哥穆尔卡亲自作出的。从上面提及的信件内容看，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有所不同。鲁明斯基建议，“现在就”取消哥穆

尔卡的中央委员资格，并将他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

上述这些声明有使讨论重新展开的危险，这样就会使全会的会议时间延长。领导上认为国内的政治形势不容许这样做，因此政治局建议全会就此闭幕。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完全赞同政治局文件和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同志讲话中对十二月事件的评价和所确定的党的任务。全会认为提前召开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必要的。

全会就有关组织问题的第二项议程通过了几个决议。第一个是关于哥穆尔卡的，决议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对十二月事件的起因和经过作出了评价，也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前任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同志在造成事件的起因及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出了评价。中央委员会承认哥穆尔卡同志过去为党和国家建立的功勋，但同时也认为，近年来他在领导党的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削弱了党与社会的联系，使经济发展中的差错增加，最终引起了公开的政治危机，而在危机过程中又采用了不正确的方法——这一切使哥穆尔卡同志不可能继续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考虑到哥穆尔卡同志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没有出席七中全会和本次全会，中央委员会决定暂停哥穆尔卡同志的中央委员权利"。

哥穆尔卡再没有参加以后任何一次全会。十二月事件的主角就这样被剥夺了向他领导了十四年的中央委员会陈述自己理由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与党内民主难以相容的事实。*

其它两个决议是关于克利什科和雅什楚克的。决议称，克利

---

* 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开过一个月之后，哥穆尔卡在一封长信中就这次全会对他提出的指责作出了回答，这封给党的领导的信长达一百多页打字纸，至今没有发表。

什科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工作时，由于在干部政策和思想战线上所犯的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在沿海地区十二月事件期间表现出缺乏现实感，他处理事情不负责任，致使与三联市工人阶级的矛盾激化。全会决定将他清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对雅什楚克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关于他的决议称，雅什楚克作为政治局委员和负责经济政策的中央书记，他以不能容许的专断方式直接干预了政府和经济部门的活动，强行通过了一系列错误的经济决策，这些决策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事件爆发的根源。

中央委员会同意瓦拉舍克辞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的职务，科乔韦克辞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职务以及洛加一索文斯基辞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科乔韦克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作为十二月事件期间在格但斯克沿海地区的政治局委员中的一员，在我所担负的这部分政治责任的范围内，我未能防止事态十分复杂和严重的发展。

由于感到自己所负的责任（这一点在事件刚发生之后我就表示过），现在我请求中央委员会同意我辞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职务"。*

---

* 巴尔齐科夫斯基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格但斯克党和经济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尽管听起来令人不舒服，但还是应该指出，有一件事对科乔韦克同志后来的政治命运产生了影响，那就是一九七〇年七中全会之前讨论人事安排时，他采取的立场与全会通过的不一样。他曾表示怀疑盖莱克同志能否干得了中央第一书记。人们怀疑他想争当总理。应该说，人们记住了科乔韦克的这个立场。后来他们又竭力保持对科乔韦克同志作用的不正确意见，并把他与十二月事件一直连在一起，以便使他处于逆境"。《海岸之声报》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全会把中央候补委员、斯柴尔采—奥波尔斯基县“少先队员”农具工厂工人延哲伊，格但斯克北方造船厂电工组长维希尼奥夫斯基，波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乌尔班诺维奇中将，以及党中央轻工业、商业和建设部部长库行斯基补选为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这次会议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历史上已经占有重要的一席，这是由两天会议的议程决定的。这次全会对于导致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在波兰沿海地区发生事件的那种做法进行了批判性的清算。一九八〇年是这次事件的十周年！偶然性使得另一次清算性全会，即在波兹南“黑色的星期四”发生四个月之后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举行的全会也称为八中全会。但是鼓励历史学家们去认真分析相距十四年的这两次会议的不应该是这种巧合，而应该是这两次中央全会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它的参加者们对现实及其问题的看法。

从这个原则出发，本书作者不厌其烦地大段摘引提交全会批准的文件以及会上的发言。作者相信，由于采取这种方法，读者将获得当时国内和党内政治形势的更完整的画面。

在研究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过程时，可以毫无困难地看到某些值得一提的特点。尽管十二月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但对于参加全会的人，这次事件仍具有强烈的影响。许多人的发言都重复一个问题：“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的？”这反映了参加八中全会的人的精神状态。虽然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解答很多，但应该说其中的许多解答都是肤浅的。这不禁使人感到那些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理论思想水平不高。在全会的发言中，人们力图找到建立保障制度的方案，以期有效地制止将来重新出现矛

盾，以免最终引起政权同社会，党同工人阶级之间爆发冲突。在这种时候，上面提到的想法就更有根据了。这些方案十分苍白无力，没有深入到政治制度的结构内部。最经常提到的无非是遵守集体领导和干部政策中采取轮换原则之类的要求。在讨论中，不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发言，有不少都带有“部门”色彩。对于全会的主要议题，这些发言者只用一般性的话三言两语一带而过，然后就转而谈论自己部门的情况。在这些发言中，没有人对哥穆尔卡及其最亲密的同事们的政策进行详尽深入的分析评价。

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已公布的文件加以研究，首先就会得出以下结论：这个重要集会的参加者们有意无意地把社会主义建设范畴内许多重要的问题推到将来去解决。可能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人事变动和关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方案中打算进行的调整方向，已经可以足够回答十二月事件摆到日程上来的问题。还可以作其他几种解释。也许参加全会的人还不断地处于沿海地区事件的强大压力下，以致他们在心理上和思想上都还没有准备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道路进行较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八中全会结束了人民波兰历史上非常动荡和引人入胜的一个时期。由于我们上面写过的各种原因，十二月事件对党和社会的震动要比波兹南事件大得多。情况表明，要使党的干部和党员以及积极参加十二月事件的那部分工人阶级在精神上恢复平衡，那是一项非常艰难和复杂的任务。

当八中全会闭幕时，波兰局势还远没有稳定。在国内的不同地区还有些零星的罢工，许多工厂还没完全开工。在人事安排上，首都耗费了不少精力。当时谣传很多，从华沙传到了全国。

尽管社会以极为满意的心情欢迎十二月冲突的政治解决以及

关于变革社会经济政策方向的首批声明，但不难看出社会上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上组成的领导班子有一定的保留。在一部分干部中也可以看出这种保留态度。

八中全会上提出的行动纲领无疑有利于重建对党和人民政权的信任，但是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波兰社会才可以说达到了非常渴望的平衡、安定和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信任。

这已经是历史的下一篇章了，应该由最新历史的编年史家来进行研究。*

一九七八年写于华沙

---

* 至少从一九七六年就已开始增长的社会和经济紧张在一九八〇年夏天以罢工运动的形式表露出来了。这次运动揭开了人民波兰历史上最深刻的政治危机。与一九七〇年不同的是，工人阶级和人民政权之间的主要冲突是用政治手段解决的。由于在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厂际罢工委员会之间缔结的协议，成立了什切青造船工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时就要求成立的独立自治工会。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中进行了深刻的人事变动。一九八〇年九月五日星期五晚上召开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六中全会，会上免去了盖莱克的第一书记职务。和他的前任差不多，他在危机形势中下台了。甚至连他下台的情况也和哥穆尔卡的一模一样——生病，没有参加更换第一书记的中央全会，住医院，发表病情公报，以及没有参加清算七十年代政策的六中全会的第二阶段（一九八〇年十月四、五日）会议。

新任第一书记是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他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宣称，“民主并不是政权对社会做出的姿态，而是社会主义伟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要”。

一九七六年的拉多姆

〔波兰〕马里安·杜尔斯基

一、议会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上午十时，波兰议会开始开会。

根据既定日程，议题有两项：关于上一年度经济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外交部长奥尔绍夫斯基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通报。这两个大问题议会只安排在上午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就第一个问题，除报告人外有六人发言，议会通过了对政府的信任案。就第二个问题，有七人发言，也通过了同意访问结果的决议。

但是，同已定的计划相反，议事日程还未结束，部长会议主席雅罗谢维奇建议增加第三项议程："部长会议关于对零售价格结构作出某些修改和对社会补贴原则的建议"，议会表示同意。

星期四下午，总理发表讲话，电视进行转播。讲话介绍了"在贯彻执行国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战略中迄今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居民实际收入和价格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食品价

* 马里安·杜尔斯基，波兰新闻工作者，《政治》周刊编辑部编辑。

格和工业品价格之间的关系不利于消费结构的必要的变化。表示，价格改革的出发点是，给予劳动人民以全部等价的现金补偿。据讲话中提出的补贴表，预定给收入最少的人以百分之二十的补贴，给收入最高的人的补贴不超过百分之十。按绝对数来看，收入在一千五百兹罗提以下的给补贴三百兹罗提，收入为五千或六千以上的给补贴超过五百兹罗提。调价情况是，肉价平均上涨百分之六十九，黄油上涨百分之五十，食糖上涨百分之一百。

总理的长篇讲话占据了《人民论坛报》两个版面。没进行讨论。只有一个议员巴比乌赫"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议员团和非党议员的授权"对政府的建议表示积极的评价，接着议会表示支持政府的建议，指示同工厂职工、机关和乡镇代表进行磋商，并把磋商情况在议会会议上提出报告。

二、二十四小时之后

几乎恰恰是二十四小时之后，总理再次出现在电视银屏上。他垂头丧气，灰溜溜地向整个波兰宣布，撤回关于改变价格的政府草案。他说，"我们向议会和整个社会提出的办法草案，只是一个建议，而不是最后决定。我们只能根据讨论的过程和结果，根据劳动人民对待这些问题和对待这一草案的态度来作决定。"

普遍的感觉是，磋商仅仅是掩饰决定的一片障目的树叶。决定早已作出，昨天，即星期四，总理就已建议在最近的星期日开始执行。不错，是预定用星期五这一天进行"磋商"，但是新的标价卡片早已印好，社会上都知道这一事实。社会上认为，磋商只是一件小小的装饰品，是创造民主假象的官僚主义的行动。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致认为，政治领导提出价格调整的倡议为时过晚了。这一倡议，本应在一九七四年年中，在经济和人

民物质生活的曲线还在上升的时候提出来，可是他们却在市场供应情况严重恶化，工资和劳动组织问题复杂化，十二月事件后改善社会生活条件的第一个推动力已经过去了的时候才提了出来。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损坏机器和设备，大火灾和铁路事故不断发生。在表面现象的后边，在道义和政治一致性的后边，可以看到社会情绪向消极方面的变化。

很早以来，社会上已经预感到物价将上涨；正象一些社会学家指出的那样，社会也准备同意上涨。但对价格如此剧烈的变化和不为社会所接受的补贴原则是毫无准备的。

三、情绪的估计

让我们看一看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组织部在计划改变价格的前两天关于人们情绪的内部通报吧！

六月二十二日，"人们对即将举行的议会会议内容的兴趣增加了，估计可能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解决价格问题的建议。希望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能进行广泛的社会磋商，希望给予恰当的补贴。一般认为，提价的商品面不会太广，提的幅度不会太高。"

六月二十三日，"对即将举行的议会会议内容仍然感兴趣。估计在会上将提出改变价格的建议。在工厂的积极分子和职工中的讨论表明，人们期待在作出改变价格的决定之前，能进行开诚布公的广泛的社会磋商。有些地方担心，提价是否会首先牺牲工人和最低收入者的利益。因此期待得到补贴。经常提到的可能涨价的商品有肉及其制成品，家俱和小汽车。人们还说煤气费、电费和其他服务费用也要上涨。"

六月二十五日的通报，反映出人们情绪的变化。"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急躁的忧虑生活前景的气氛中进行的。一些工厂出现了

妇女集体痛哭的情况，另一些工厂出现了中断工作的情况。也出现了放弃党证和工会证的情况。有这样一些说法：'这是一个如此破产的波兰'，'哪里有正义'，'我们靠农奴制的面包来生活'。个别工人认为，只有施加坚决的压力（也就是罢工）才能正确地解决价格问题。人们不相信磋商的结果会带来什么变化，认为一切都已经事先决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讨论中的调门越来越高，有一些咄咄逼人的讲话。出现了敌对性的标语。大家期待广播和电视会对今天的事件表态。”

如果可以说的话，这就是波兰的一般反应。除此之外，可以看到痛苦和愤怒，以及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乌尔苏斯、普沃茨克，特别是在拉多姆爆发的紧张。

四、抗议的行动

毫无疑问，拉多姆的抗议行动是从“瓦尔太尔将军”五金厂开始的。早晨刚过七点钟，第六车间的职工中断工作，一部分人开始到其他车间鼓动罢工。工人们开始聚集在工厂的广场上，不论是广播还是一位厂长的讲话都阻止不了人们的集会，也阻止不了人们走出工厂的大门。估计从八点钟到九点钟之间，有一千多人离开了“瓦尔太尔将军”工厂，其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进入邻近的工厂，鼓吹中断工作和走上街头。

游行队伍向着波兰统一工人党拉多姆省委所在地行进。喊叫着口号：“不要涨价”，“我们是饥饿者”，“我们要自由，要面包”。十点钟左右，大约有二千多人集聚在省委大楼前，他们的活动是自发性的，没有推选出什么头头（哪怕是同省委谈判的头头），也没有表现出有组织的活动。

在省委大楼前的人数不断增加。省委第一书记耶日·普罗科

皮亚克企图向他们发表讲话，但被打断了。他们要求取消涨价。当一部分人拥进省委大楼和其中一些人开始损坏建筑设施（特别是食堂和厨房）时，许多政工人员根据中央的指示从省委大楼撤离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华沙和什切青的警察部队正在奔赴拉多姆的途中。十四点三十分，第一批警察已进入行动。

五、事件的分析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五年后党对当时事件的分析的片断：

“工厂职工中某一部分人放弃工作具有自发的性质，是反对日益艰难的生活条件和反对提高物价的真正的工人的抗议。也是对突然袭击和虚假的磋商，对政府提出的不公正的补贴办法（给收入最低的人以最少的补贴）的一种反应。在人群集聚的第一阶段，在行动的自发性和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对上述问题作任何求实的讨论都是不可能的。

从十点到十四点三十分，人群的组成不断出现变化。可以说，十点时在省委大楼前集聚起来的人大多数是拉多姆各工厂的男女职工。他们进行自发的无组织的示威，要求取消涨价。但是，那个时候，由于集会的环境和目的而不断加温的激动情绪占了上风，有一些人和小集团在鼓动集会者采取使形势尖锐化的行动。

过了二、三个小时后，很大一部分先来的人离开集会场所回工厂和回家了。在下午，偶尔有些人来到省委大楼前的人群中，他们消极地观察事件的进程，过了一会也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同时在人群中也出现了一些活动积极的人，还有许多由年轻男人形成的新的小集团参加进来。他们利用形势，大喊大叫，接着采取了具有犯罪性质的破坏活动，直至在城市中心纵火和破坏。

真正的工人抗议变成了犯罪闹事，对此这些小集团中最活跃的肇事者应负有责任，这基本上是由非工人分子引起的和进行的。

波兰统一工人党拉多姆省委领导和工作人员从一早开始就采取了一切可能的行动，以便控制出现的局势。对集会的人群采取了心平气和与讲求方式的态度，表示出善意和对话的愿望。但这些均未带来任何效果。省委的活动扭转不了不利的情绪，因为要撤销涨价的决定，这不是省委职权范围内的事。

当人群开始破坏活动时，省委书记们撤离了省委大楼。

这时在省委大楼内外还没有警察。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领导认为还能够控制和缓和冲突的局势。没有调动维持治安力量，也没有置身于警察的保护之下。一直到十四点三十分也没有采取任何反对省委大楼内外人群的行动。只是在火烧大楼之后，警察部队开始了行动……

根据内务部长的指示，民警和警察部队均未携带武器，只有警棍、头盔、盾牌和催泪弹。下了明确的指示，只能进行自卫活动，只有在形势需要时才可以采取使用必要手段的驱散人群的行动。这种行动在十四点三十分开始了。”

六、牺牲

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人员伤亡事件。当警察部队正向省委的方向调动，一群人试图封锁道路，向警察那边推动停在省委大楼前的装载着水泥板的拖车。随着拖车速度的加快，扬·瓦本茨基和塔·赞巴茨基从车钩上下跳时被车轮压死。

六月二十五日的拉多姆事件记载了多起抢砸商店的情况，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同样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还有许多人想要保护社会财产。一九七六年七月《政治》周刊在题为《哭泣而捍

卫》一文中报道过这方面的情况。周刊的特派记者描绘了拉多姆这种较量的景象。假如读者对这篇报道的署名（阿尔弗莱德·沃西）感到惊奇，那末可以告诉大家，这不是真名实姓。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同事，由于报道的内容被修改了，他放弃签署自己的名字。因此我不相信今天作出的评价是否完全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今天的评价说：

“警方人员的干预没有超过可允许的界限和方法，但是考虑到一部分冲突参加者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在挑衅的情况下警方人员进行了长达十一小时的行动，不排除他们狠狠地殴打了事件的某些参加者。

也不排除对无辜者的损害。尽管警方人员的任何行动都不是指向事件的偶然参加者，但街头冲突的范围可能使他们的行动涉及到一些偶然地处于出事地点而未表现出积极参与事件的意愿的人……”

六月二十五日午夜，城市中的秩序恢复了。拉多姆人对这种秩序的感觉又是如何呢？

七、电话会议

调整价格的试图没有成功。未能说服工人阶级同意价格上涨的幅度和补贴的原则，在十几个省份中发生了十分激烈的抗议，罢工和举行了集会。在三个地方发生街头冲突，其中最激烈的是在拉多姆。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即调整价格行动开始的一天之后，国家的政治领导意识到，如果继续推行涨价措施，将会给普遍的社会秩序带来何等的危险！当天晚上，雅罗谢维奇总理宣布撤销涨价。一切情况表明，迅速改变决定的勇气来自盖莱克。

改变了决定，应该向省一级领导骨干作出解释，并立即向他

们提出一个政治宣传运动的计划——一个闪电般的计划。我一点也不怀疑，之所以必须迅速作出这一决断，还因为下星期二将在柏林举行早已宣布的有领导人参加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迄今的分析均未涉及这个问题）。

这样，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召开了省委第一书记电话工作会议。华沙方面参加的谈话人有：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中央书记巴比乌赫和希德拉克。

盖莱克对过去的一天作了评价。他注意到十个省中的一些工厂对磋商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在某些省中讨论是极其暴躁的，同时工厂还停止了工作。在拉多姆所有的工厂都有人参加了街头示威，其形式是国家尊严所不能允许的。上述事件的结局是，必须动用警察部队，以恢复平静。在乌尔苏斯，全体职工罢工了，其中一部分人在附近的火车站拦截火车，破坏和燃烧路轨，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因素。考虑到乌尔苏斯地处华沙郊区，“我们有意识地没采取警察行动，尽管后来还是动用了警察”。在普沃茨克，傍晚有人试图组织示威，“显然由于警察的动作迅速，示威活动被驱散了。”

下面他谈了改变决定的根据：

“考虑到整个局势，我决定（这也同讲过的话相符合）这是一次磋商，今后是否作出调价的决定，要看磋商的结果。我向政治局建议，由总理发表讲话并指出推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制定整个的方案。我们以为，这是最正确的解决办法。因此，如果我们在还不能说服所有的人之前，就用强力去贯彻执行，那将是不正确的。这里我不是指要说服那些流氓分子、敌对分子，我是指发生罢工的工厂中那些正直和软弱的人们，他们或者受到了压力，或者不了解问题的实质。”

那么，在最近几小时和最近几天要作些什么事情呢？“应从昨天的事件中得出结论，这不是失败，但也不能说这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把昨天变成我们的胜利。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明天和星期一在各省举行群众性集会，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有十万人或更多的人参加的集会。这必须是由善良的人们组成的集会，必须是有非党人士参加的集会。在集会上同志们可以根据准备好的材料讲我们的决定和建议的正确性，你们可以讲，你们不支持流氓活动的方式方法，不支持把小集团的意志强加给工人阶级，强加给大多数人民的方式方法。”

接着他讲了一段别具特色的话。这段话可以说是在辞职的威胁下逼迫别人表示支持。这段话以及后来的讲话肯定了我的猜测，就是说在国内设计的宣传运动同即将召开的柏林会议是相互关联的，在柏林会议上盖莱克将起主要的作用。

他说，“如果你们不这样做，那就迫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你们最了解我们作出这项决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你们知道，同波兰，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人民幸福的思想照耀着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允许国内最落后的人们、冒险分子和教唆分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人……，此外我们还必须武装我们的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党要加强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办不到这一点，那末我们在世界上，在国际运动中取得的巨大威望必将付诸东流。人们将说我们是吵闹不休的民族，为了自身的小利而牺牲祖国的大利。在国内，反动派将感到巨大的快乐，流氓和不守纪律的人将拍手称快。我不想细说了，请你们想一想，并在明天和星期一举行强大的集会，支持这一重大的主张，支持对国家的民主领导，谴责一切不负责任的使国家倒退的闹事行为”……。

八、特别教育

拉多姆事件已从整体上分离出来，对它采取了特别的行动方式，要求在这里举行的群众大会要有邻省的积极分子参加。盖莱克说：

“应该把拉多姆居民召集在一起，并把我们的评价告诉他们。他们是怎样教育子女的，他们是怎样危害波兰的！简而言之，要让拉多姆人感到整个波兰都对他们意见纷纷，整个波兰要长久地记住他们干的事。我想，如果没有这种谴责，如果没有我讲到的强有力的支持，我们就达不到目的，就不能把这件事变为我们的胜利。……”

巴比乌赫指出社会教育预期的后果是：

“……在参加罢工行动的职工中，健康的部分首先要自己站出来，声讨挑衅者、策划者和教唆者。如果工厂内部没有足够的力量，那末就从外部派党的积极分子去支援，以便利用昨天的事件清除所有的病患。事件向我们表明，人民的态度是好的，全党的态度是健康的，例外是少数。现在要对那些不称职的党员进行清算，清洗我们的队伍，使其秩序井然。现阶段的问题是，要把昨天的事件变成对第一书记、对党、对中央、对政府和对总理的支持。”

从电话会议的进程和此后由中央组织部发给地方的提纲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应该“要求从工厂中开除不负责任分子”，“必须造成一种人人指责他们是有罪的黑羊的气氛”，对那些参加罢工和闹事最积极的人“还要在下周公开地当众宣布开除出厂，明确指出他们被解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破坏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工人尊严的根本原则”。集会的口号是：“盖莱克同志，我们同你

在一起”。

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一举行了这样的集会。报纸对四十八个省的集会作了报道。时间并不久远，我们记忆犹新，这些集会，例如在“十年”体育场举行的首都集会，是匆匆忙忙在压力气氛中导演出来的。

在拉多姆的集会，计划晚两天举行。这是一次赎罪的集会，谴责的集会。有几个邻省代表团参加，藉以表明拉多姆社会第一是孤立的，第二是不成熟的，因此它需要外来的援助。特别骇人的气氛伴随着拉多姆集会，……

集会是在“拉多姆人”俱乐部的体育场上举行的，悬挂在主席台上的横幅表明了集会的主导思想：“用行动改正我们的错误和过失”，“那些人使我们感到耻辱”，“盖莱克同志，我们竭尽所能重新获得你的信任”。

集会的进程和使用的论证表明，在集会的组织者中了解波兰正在发生的社会进程的人为数不多。在一九五六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待遇优厚的“采盖尔斯基”工厂的职工成为抗议的倡导者；同样，在一九八〇年实用主义者在想，为什么工资收入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造船工人最坚决地要求改革，这种顽固的思想方法也在拉多姆表现出来。在集会上有人说，想象不到一九七六年工资增长比上一年高出百分之二十的“瓦尔太尔将军”工厂的职工竟首先闹事！想象不到第六车间成为抗议的倡导者，而那里的平均工资已经超过了四千兹罗提！

拉多姆集会是波兰唯一没有通过神圣的决议的集会。有人说，“拉多姆城还没有这样的资格，……国家不期待我们的言词，不期待赔礼道歉，而期待我们为良好声誉而进行劳动的愿望，……”

剥夺通过决议的权力，是惩罚拉多姆社会的一种形式。但这种惩罚还不是最严厉的。

九、 迫 害

（这里作者介绍了当时在拉多姆对六百七十六人进行拘捕和审判的情况，介绍了对九百三十九人实行解雇，对许多人实行降职降薪的情况，介绍了对拉多姆实行经济惩罚的情况，如试图减少对拉多姆的商品供应等。）

十、通向一九八〇年八月的桥梁

……一九七六年六月暴露了波兰国家和社会结构在活动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九七六年六月揭开了社会生活的幕帷，暴露了政权和社会关系中的演戏作风。一九七六年六月肯定了把党和政府混为一体所带来的损害，肯定了剥夺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的自主性和责任性所带来的损害。一九七六年六月对党和人民政权是一次最后的严重警告。遗憾的是，除了决定立即撤销错误的草案外，党没有在活动的方法，执政的方法，与社会相处的方法，特别是与工人阶级相处的方法等方面作出结论，以致于一九八〇年夏爆发了危机。

并不是一切都是非正义的！社会的耻辱感和工人尊严的损害，一九七六年六月政权的专横和某些部门的粗暴行为，并不能掩盖也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发生的极其重要和难于置评的现象，即领导人下定决心，不准重演一九七〇年的十二月悲剧！我相信这应归功于盖莱克。我不怀疑，一九七六年六月当局的决定（尽管在当时和以后有许多不彻底的地方）在思想方法方面，在不采取武力行动的方法方面结下的果实。一九八〇年八月我们感觉到

了它的积极结果。我不怀疑，在将来的时候，历史学家会对一九七六年六月的“过渡”作用作出足够的评价。

（译自一九八一年《政治》周刊第二十六、二十七期，有删节）